

美国研究

季刊

1987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1卷

3月25日出版

创刊号

中国的美国研究	资中筠(4)
论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	陈宝森(10)
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	王缉思(19)
评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发展	张也白(32)
美苏在战略武器上的斗争	吴展(36)
自然资源保护与西奥多·罗斯福	顾学稼(44)
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施咸荣(51)
艾德蒙·威尔逊书信	王佐良(60)
“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李道揆(65)
编后	(72)

作者简介：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问题专家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张也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美苏关系问题专家

吴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顾学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施咸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佐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李道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邵宏志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87

Vol. 1, No. 1

CONTENTS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Zi Zhongyun (4)

An account of the century-old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unprecedented flourish in this field since 1979 and the purposes for Chinese to study the United States as seen by the author are explored.

ON THE MACRO POLICY OF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n Baosen (10)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necessit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its special pattern, rationale, mechanisms and practices, and the role of public finance and Federal Reserve.

AN APPRAISAL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1945-1955 AND ITS AFTERMATH

Wang Jisi (19)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jointly determined the course of US China policy 1945-1955 and that have produced far-reaching effects on late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evaluat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underlying the Americans' behavior in dealing with China.

SOME COM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S-SOVIET RELATIONS IN THE 80's

Zhang Yebai (32)

The US-Soviet relations will retain the pattern of dialogue in the midst of rivalry for years to come. Detente will still be limited and confront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dominant.

THE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u Zhan (36)

Analysing the status of US-Soviet strategic arms race and strategic offense-defense relation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 deep-cutting of nuclear arms, rather than their total destruction, will be possible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CONSERVATION IN THE PRESIDENCY OF THEODORE ROOSEVELT

Gu Xuejia (44)

US natural resources were seriously squandered in the 19th century. Conservation efforts of the time had little effect. T. Roosevelt's struggle for conservation greatly advanced its cause early this century.

SOME 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ODAY

Shi Xianrong (51)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perimental realism in W. Kennedy's *IRONWEED*, the new realism of feminist women writers, the future of Southern Literature and two different trends of literary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ON EDMUND WILSON'S LETTERS

Wang Zuoliang (60)

Edmund Wilson's historic role in literature, his wide-ranged knowledge and literary talent are shown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his letters.

“A DRUM MAJOR FOR JUSTICE”: THE 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

Li Daokui (65)

The author describes and appraises King's life, his quest for American blacks' freedom and equality with whites, his role in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antiwar activities.

EDITOR'S NOTE

(72)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CONTRIBUTORS

Zi Zhongyun, a specialist in US diplomacy and Sino-US relations, is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en Baosen, is Senior Fellow at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and Vice President of US Economy Association in China.

Wang Jisi, is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University.

Zhang Yebai, a specialist in US-Soviet relations, is Head of US Foreign Policy Division,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Wu Zhan, is Senior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Gu Xuejia,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ichuan University.

Shi Xianrong, is Senior Fellow at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and Standing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ang Zuoliang, is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and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Li Daokui, is Senior Fellow at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and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的美国研究

【题注】本文所提到的美国研究主要指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一般不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文中提到国内的研究机构只是举例,难以求全。另外,1949年以后在我国台湾所进行的研究也未包括在内。【注尾】

资中筠

中国和美国,各处地球东西,隔洋遥对。早期具有这一地理知识的中国人曾为诗形容称:“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1)诗虽不佳,却是写实。而两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等,可谓相去万里。但是在近代史上,美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各方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两个民族迥异的特点,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相互探索和研究。就中国方面而言,尽管100多年以前,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了解美国产生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系统的、学术性的美国研究得以真正深入、全面地发展,还是近10年来的事。

19世纪中叶到目前的情况,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来叙述。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年

据历史学家们考证,中国人初到美国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但是知识分子赴美,并写下文字记述,则是在1844年《望厦条约》之后。迄今所知,第一部著作首推1847年赴美工作的福建人林 写的《西海纪游草》。这是一本诗集,附有长篇骈体文的序,最早刻本的年代为1849年。随后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再述奇》)、容闳的《西

学东渐记》……等等。这些早期的关于旅美见闻的述评今天看来当然是相当肤浅,而且有不少谬误、甚至可笑之论。但是它们在当时都起了打开眼界的作用。作者领悟到自己过去是“坐井观天”,现在则是“以蠡测海”;读者则感叹“踟躇于一室之中,老死于户牖之下,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2)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不限于猎奇式地记述异国风土人情,而且也涉及政治、社会情况,并且指点江山,评论得失,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中国作对比。不论作者身份如何,原来思想如何保守,亲身到美国(当然也包括欧洲)看过之后,总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别人之长,对自己有所启发。至于从清末维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乃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革新之道,对美国的考察就更深入,目的性更加明确。这期间,一些报刊杂志在介绍美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被首次翻译发表在1901年出版的《国民报》第1期上。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介绍美国方面曾作出贡献的众多杂志中,《东方杂志》可称一枝独秀。它创办于1904年,到1949年迁至台湾的几十年中,刊登了大量介绍美国的文章,包括政体、政党、经济、财政、社会、工业、农业、外交、军事、文化以及人物传记等各个方面。题目小的从《美国制棉籽油法》,大的到《英美法革命后建国事业之比较》,范围极广。那时还有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过介绍美国的文章,如《庸言》、《夏声》等,不过寿命都比较短。总的说来,包括《东方杂志》在内,这些介绍都是零散的,而不是系统的。

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报刊杂志刊登美国情况的文章激增,不过大多数内容是紧密配合时事的,较少基础性研究。《世界知识》是其中在数量和影响上较突出的一种。以翻译西洋报刊为主的《西风》杂志,关于美国的文章占的比重远超过其他国家,也可以算是着力介绍美国的一本刊物。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决不仅限于通过报刊文章了解美国。大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美国在华创办的学校以及兴办的各种事业、乃至独占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的密切来往,都使中国人对美国增加了理性和感性认识。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专门的对美国研究。事实上,从抗战之前到战后,对美国的研究仅限于少数学者从事分散的、个别的工作,而且是附属于个别专业,如世界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例如胡适对杜威实证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并在自己的治学方法中深受其影响,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至于专门从事研究美国的机构更是不存在的。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受过美国文化的熏陶,甚至接受了不少美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专门从事美国研究,可称为美国问题专家的却寥寥无几。对美国的认识和介绍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更为闭塞。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是重视的,但是资料来源有限,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个别地方出版过反映美国的丛刊。例如,晋绥解放区太岳新华书店1947至1949年,曾编辑出版《美国问题研究》丛刊,内容包括美国经济危机、对外政策、黑人问题等论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在北平出版过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中国内战的特殊情况,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一部分人亲美、崇美,一部分人强烈反美,而且越到后期,反美情绪越加强烈和普遍。因此,这个时期对美国的研究高度政治化。中国国民党方面从利用美国内部矛盾、争取美援出发,对某些问题可以说钻得很深,摸得很透,但是谈不上学术研究。在共产党以及左派知识界,则着重揭露和谴责美国,进而分析其帝国主义本质。例如这个时期出版的伦德伯格(F. E. Lundberg)著《美国六十大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 1937*)、乔治·塞尔德斯(George Seldes)著《豪门美国》(*One Thousand Americans, 1947*)等,对以后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和研究产生了相当长期的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乒乓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了配合开展外交工作和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开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是其中一部分,它的发展和消长一方面与中国的整个国际研究事业相一致,一方面又与中美关系的特殊情况有关联。同其他方面的国际研究一样,美国研究主要是作为涉外工作的一部分进行的,附属在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会、青年、妇女、和平等群众团体的国际部门。在高等院校中这方面工作比较单薄,60年代之前没有专门研究美国的机构,有关美国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课程中。1956年,在外交部赞助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3)。这是最早的、规模较大的国际研究机构,集中了一批专家,美国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当时重点是研究美国经济。研究成果多数为内部调研报告,公开文章发表在该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另外《世界知识》杂志还继续刊载有关介绍美国的通俗性文章。

1949年10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美关系真相》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以后陆续出版了少量的著作和译著。1950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俄文翻译的《战后美国经济剖视》,近百万字,是最早的大型译著。50年代后半期比前半期在数量上和领域的广度上有显著发展。不过译著的数量大大超过著作,而且一部分是从俄文和日文转译而来。建国初期,有一批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时期提供美国情况的骨干力量,同时还受到来华长住的美国朋友的帮助。

进入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对世界的兴趣不断增长。特别是“两大阵营”的概念开始打破,中国与第三世界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开展。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同时,中国国内已经从三年经济困难的谷底走出来,各方面恢复和发展比较顺利,可以有余力多关心国际事务。于是在1963年底,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并由国务院发了文件。在此以后,美国问题研究与其他方面的国际研究一道,有了长足的、迅速的发展。1964年及以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如外国文学、世界经济、世界历史等研究所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的研究室或组。一些大学,如武汉、南开等,在经济、历史、文学、哲学等好几个系里都设立专门研究美国的研究室,武汉大学专门成立了美加经济研究所。其他如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也分别设立研究美国文学、经济、地理、教育研究室。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分工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当然包括美国。从此,美国分科研究开始组织队伍,加强研究力量。图书资料开始积累,为此目的的外汇拨款也列入国家财政计划。原来各政府部门所属的有关研究所的工作有所调整,并继续得到加强。

但是,好景不长,在1966年爆发的长达10年的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中,美国研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一样,遭到破坏、陷于瘫痪,相当一部分图书资料散失,或停止购进,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被迫放弃了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前几年中建立起来的机构、组织的队伍,以及已经积累的一些资料和开展的少量的工作,为以后这方面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有这个基础和白手起家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与美国一直处于隔绝和敌对状况。由于隔绝,资料来源有限,更谈不到感性认识,因此观察问题往往隔靴搔痒;由于敌对,研究的内容多数从揭露、批判着眼。另外,自50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研究受苏联的影响较大,许多教科书和资料都是从苏联转译来的,而且反映了苏联早期的观点。60年代,苏联与美国搞缓和,对美国提法有变化,而中国则主要担心美苏联合反华,反对“美苏勾结主宰世界”。凡此种种,使当时对美国的研究有教条主义倾向,难得客观、全面,也不大可能有好整以暇的、冷静的观察。例如,往往容易片面夸大美国的经济危机、财

团对决策的操纵、工人运动的声势以及左派的力量,等等。但是,应该说,作为中国最高决策依据的估计,比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要客观一些。愈是在高层愈是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高潮中,作出“乒乓外交”的决策。

三、开始解冻阶段

由于从1971年开始的中美关系的突变,中国对美国研究的恢复先于其他遭“文革”破坏的领域。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在极小的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美国内政、外交、特别是建国以来中美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参加的人员和议题的范围都极狭小,并且在极端保密中进行。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中国对美国研究的一个转折。从那时起,美国不再是一个纯反面的对象。中性的、以至正面的有关美国情况的报道开始在报刊出现。有关国际问题的内部刊物中,关于美国的内容陡增。尼克松访华前后,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等过去因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持不同意见,而遭迫害和排挤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地被邀访华,引起了人们对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关系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新的兴趣。尼克松访华后,各界陆续来华访问的美国人日益增加。经过了几十年的隔绝和敌对之后,中国人又有机会直接接触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重新认识美国。那时,凡有美国人在中国作报告,必然座无虚席,报告内容也不胫而走。举一个例子:长期在中国,热心帮助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美国农业专家和作家韩丁,曾作过一个报告,内容谈到他一人经营相当于七八百中国亩的地,同时还有大量时间旅行和写作。这件事对习惯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人确实大开眼界。他的报告印发范围极广,一时之间不仅在北京,而且外地许多单位的负责人都在谈论韩丁的农场。更加令中国人惊奇的是,韩丁有这么多地,却还常常入不敷出,还要负债,靠夫妇二人的其他收入来维持生活。这与中国人对“大地主”的整个概念完全不符。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一般干部,包括居于领导岗位的人物,对美国的了解多么少。就了解美国而言,那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启蒙教育。伴随着这种新鲜感而来的是对美国各个方面的新的、强烈的求知欲。

此时,“文革”前已有的研究机构部分地恢复了工作,有的大学建立了新的研究美国的组、室等。有一些与这方面工作有关的专业人员从“干校”调回。但是当时还没有具备开展真正深入而客观地研究美国的条件。就国内而言,“文革”所造成的内部动乱、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思想禁锢、闭关锁国状况并未结束。国外的资料、信息只有少数特许的机构和人员才能接触到。在观点上也仍受到各种束缚,更谈不到百家争鸣。就中美关系而言,当时尚未恢复正常,而是处于极端微妙的状态,多少年来相互敌对和成见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除。更有甚者,尽管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本人的决策,但是当时窃居高位的人时常要加以反对,或借题发挥,为别有用心者的政治目的服务。以至于出现过像“蜗牛事件”这样贻笑天下的荒唐事件(4)。在这种情况下,自难开展大规模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专门为了处理中美关系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调研工作,仍在极小范围内进行,笼罩在周围的那层神秘色彩仍未消除。

四、新时期及其特色

大约从1979年初起,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主要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松开了精神上的紧箍咒,全国人民思想空前解放,学术领域的禁区一个个被突破,同时,全面开放政策使人们眼界大开,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信息资料。这是促进学术繁荣

的共同因素。而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正式建交,又是促进美国研究发展的特殊因素。从那时以来的七八年中,中美之间气氛的改变、两国交流的蓬勃发展、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赴美学习和考察,给美国研究带来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期间,不但过去原有的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而且新的各种研究组织不断涌现出来。大体上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老机构加强了研究美国的科、室;一种是一些大专院校在文科的系和专业中恢复、加强或新设立该学科的美国教研组或研究室,如美国经济、美国历史、美国文学等等。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把美国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客观要求。于是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美国的研究机构。而且研究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这一事实,标志着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此后,又有一些综合性的美国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中主要的有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1984年)、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美国研究中心(1986年)等。此外,四川大学也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1979年之后中国还相继成立了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文学研究会。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仅从数量上说,非以前任何时期可以同日而语,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散见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杂志、学报等。关于书籍,以下表格(5)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年代	著作	译著	总计
1949—1959	134	408	542
1960—1965	40	390	430
1971—1986	116	580	726

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新时期的美国研究具有新的特点:

(一)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前所述,这个时期美国研究的繁荣发展,是同整个学术的全面繁荣和思想活跃分不开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得以贯彻的结果。因此愈来愈多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能逐步摆脱僵化的教条的束缚,对纷纭复杂的研究对象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并且言必有据,逐步克服断章取义的恶习。像过去那种把一切归为非“友谊”即“侵略”、非“进步”即“反动”,是不足取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这一点大体上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这种气氛下,不同观点的争鸣也得到开展。例如,对于“里根经济学”的得失利弊、美苏力量对比、旧的美国财团的划分是否还能成立,以及历史上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能会长期争论下去。有关美国历史、经济、外交、军事战略、文学等各种学术讨论会颇为频繁,大大促进了各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交流、学者之间的相互切磋,无疑对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和深化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二)新的、丰富的资料来源。新时期的美国研究是在全面开放,中国人面向世界的新高潮中进行的。绝大多数研究美国的人员,都有机会到美国作短期访问,或长期考察、学习。一则可以得益于极为发达和使用方便的美国图书、档案资料设备,积累宝贵的素材;二则可以从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乃至交锋中,开扩视野,拓展思路,得到新的启发;三则可以从实地观察和切身体会中印证书本知识和理论。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依靠闭门读书,或至多是第二手的,或过时的感性知识的状况。

如果说以上第(一)条是主观因素,那么第(二)条就是客观因素。两者相结合,使中国的美国研究在短短七八年中突飞猛进。

(三)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广度超过以往。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题材涉及面之广,为前所未有的。改变了过去多侧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状况,而及于社会、历史、文学、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等更是新的领域。更主要的是研究的兴趣日益向深层发展,不满足于知其然,而要究其所以然。例如研究美国外交,不仅限于叙

述其某一时期的政策“是什么”，而是深究其历史根源、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及其消长，等等。另外，就美国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制度、某一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研作日益增加，这又与过去主要从宏观角度论述有所不同。当然不是说，当前宏观的研究被忽视了，相反，诸如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样的大题目就是一个热门题目。

(四)学者队伍的壮大和成长。这几年中，研究美国的专业人员队伍壮大的速度是空前的。一部分是过去从事一般国际问题研究或涉外工作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美国上来；一部分是各专业学科的学者在本专业中把美国作为研究专题；还有政府机关或企业部门结合本单位业务加强研究美国的力量。一个新的现象是，非官方的、出于自发的兴趣而从事美国研究的人数日益增加，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这里面层次当然有深浅之别，质量也参差不齐。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还有中、青年队伍的蓬勃成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双方学者的交流中，一个令人遗憾的突出现象是，中方年龄普遍高于美方很多。当时，美国有的基金会在世界各国招考年龄在35岁以下的高级研究人员，对中国则不得不照顾特殊情况而放宽5至10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中。例如，198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青年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史(1945-1955)学术讨论会，作为会议主角的中方学者平均年龄略低于美方。这在五年以前是难以想望的。目前还有大批青年正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学习或研究。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以丰硕的成果成为美国研究领域中的生力军。

当然，总的说来，中国对美国的综合研究还是处于初创阶段，尚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档案不开放、图书资料不健全、使用不便、各单位协作和通气不足等等，都使中国学者与美国同行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在主观方面，专业人员的素质仍有待提高，青、老学者各有弱点。有些研作仍失之肤浅，并且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或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现象依然存在。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有许多问题尚需提高到理论上认识。此外，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五、美国研究之我见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发展美国研究的意义何在？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为四化服务”，或作“智囊”。当然，这种说法适用于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于美国研究为然。如果不是作狭隘的、短视的、急功近利的理解的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仍不能完全概括。我认为，美国研究的意义可以分几个层次：

(一)在中国全面开放的今天，对全世界都应加深了解，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过去或为敌，或为友，与中国有过特殊的关系，今后还要长期打交道。这中间可能有愉快的合作，也可能有痛苦的摩擦。互相了解愈深，则愈能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无论是外交、贸易、文化交流莫不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在研究目的中最浅近的一个层次。

(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世界局势有独特的影响。方今世界上作为单独的国家只有美、苏能左右战争与和平，地球上几乎每个地区都可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离开了对美国的力量、意愿、战略、策略以及短期或长期利益所在的估计，就无以观察整个国际局势。对美国肤浅的、简单片面的了解往往会导致对整个国际局势的错误估计。而要真正了解美国的对外关系，又必须了解造成这种关系的诸多内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美国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三)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发展道路以及价值观念等，无不与中国成鲜明对照。在中国今天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美国已经证明流弊很多的经验固不可取，即使在美国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多数也未必能照搬到中国。但是有没有这个参考系，有没有这个借鉴，对中国人了解自己，提高对世界的认识，

研究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却是大不相同的。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打开胸怀,吸收新鲜的养料。“坐井观天”当然不行;像林 那个时代那样“以蠡测海”,也已远远不够了。现在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条件寻根究底,观其全豹。至于必须知所取舍、善于消化,这是当然的,但这个命题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而不是一知半解的研究来得到解决。

(四)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这种研究在中国是新的,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在理解上也很不相同。但是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问的一部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个人浅见。如能成立,那么对研究的意义就不宜作“立竿见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所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益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这应当不算陈义过高。

注释:

(1)清人林《西海纪游草》一书刊登的署名“浯屿梅瘦云”读后题诗。引自钟叔河著:《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2)王广业题《西海纪游草》序文,同上书第58页。林鍼、志刚、张德彝等著作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

(3)“国际关系研究所”即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身。

(4)1973年中国电子工业部代表团访美,美接待单位赠每人一个玻璃蜗牛作纪念。有人向江青告发,说美借此讽刺中国发展慢如蜗牛爬行,而接受者被指控丧失民族立场。江青借此掀起轩然大波,实则反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政府部门。

(5)表上数字1978年以前的根据《全国总书目》,1979年之后根据《全国新书目》统计而来。范围是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历史地理。

论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

陈宝森

宏观调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宏观调节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实现社会总供应与总需求的平衡稳定经济,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为目的。

在垄断资本出现以前,自由资本主义不需要宏观调节。宏观经济状况是资本主义各个独立资本运动的总和与结果。的确,经济周期和危机从19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萨伊鼓吹“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理论早已为现实所推翻。不过那时的经济危机还没有严重到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程度,它本身就是以强制力量恢复供求平衡的一种机制,复苏会跟着危机自行到来。

在垄断资本取得支配地位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激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垄断资本突破了经济的地区性和局部范围,使生产成为真正社会化的大生产,它要求在社会范围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因此它也就要求在社会范围进行分工、合作、计划与协调,否则社会再生产就难以按比例、均衡地运行。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以下的原因,均衡的社会再生产很容易遭到破坏,而且很难自己走向复苏。第一,各个垄断资本集团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的生产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它不会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自发地走向社会范围的分工、协作、计划与协调;第二,在垄断部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自由竞争状态下的价格机制。价格运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与供求关系脱节,因此垄断资本越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调节功能就越被削弱;第三,由于以上原因,垄断资本就会在社会范围造成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流通阻滞和分配不均,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使经济危机更加深刻,更加持久,更具有破坏性。要想依靠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渡过危机,已很难不带来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况下垄断资本要维持其生存,使自己的经济基础不致崩溃,就不得不求助于它的上层建筑——国家,要它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经济机制之外,增加宏观调节的功能。

从历史上看,美国从20世纪初即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宏观调节,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实行。30年代大危机以后的新政时期,加紧了对宏观调节的各种试验。因此,可以说是战争和危机对建立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宏观调节机制,起了触媒作用。

垄断资本就其总体说要求宏观调节,但对垄断资本的个别部分说,它们常常会同政府的宏观调节政策发生利害冲突。这里存在着资本家阶级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问题。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垄断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对待宏观调节也有不同的态度。一般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赞成宏观调节。资产阶级保守派反对宏观调节。当权者在顺境中不太重视宏观调节,在困难和危机中又不得不求助于宏观调节。历届政府,从罗斯福到里根,五位民主党总统在不同程度上都倡导、支持和实行宏观调节政策,四位共和党总统在意识形态上则为自由放任唱赞歌,但在实践上又都自觉不自觉地实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节。这种两面性以里根政府表现得最为突出。里根是靠标榜新保守主义而入主白宫的。他对政府干预深恶痛绝,公开声称“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直到1986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还在告诫人们说:“金融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短期微调的功效,很少为事实所证明。在原理上,自主决定的,对正在露头的经济情况进行短期微调,对决策者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方法。然而在实践上,经济政策的时间滞后以及对经济动态缺乏可靠的信息,常常意味着应时的经济政策,反而使经济不稳定。有时对经济实行微调的行动可能很不适当;这种政策要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通常并不减少经济成就的风险。”然而正是里根政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在实践上就一反原来对大赤字、高利率、高汇率的自由放任政策。先是与盟国协调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又在1986年四次降低联邦储备的贴现率,迫使利率下降。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扭转巨额贸易逆差,为前景不妙的美国经济输血。这就说明不管美国的当权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宏观现实已迫使他们无法放弃宏观调节这个对垄断资本必不可少的武器。

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宏观调节,然而如何进行宏观调节则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而颇有差异。战后西欧不少国家和日本,倾向于在指导性计划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美国则倾向于单纯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节。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是在罗斯福新政后期奠定下来的。它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实践。

早期新政曾经做过某些计划化的实验。第一次百日新政时期的“智囊”人物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倡导者。罗斯福也曾经认为计划化是“未来的道路”,“使计划化成为这个国家全国政策的一部分可能已为时不远”。这些言论并不是罗斯福的个人偏好,它反映了在大危机严重局势下,许多人包括某些企业家想从计划化中找到摆脱危机出路的愿望。

罗斯福在他的总统任期,确曾为实行计划化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是实行全国产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建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是建立全国计划局,后来改为全国资源计划局。在强化计划领导方面是超越内阁建立全国应变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了中央统计局,负责政府统计资料的标准化。上述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试验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的实行。

实行《全国产业复兴法》是希望通过政府企业主和工会的合作,提高职工的购买力,使工业生产和价格计划化,以防止生产过剩,促进经济复苏。但是由于企业主掌握了制订公平竞争法典的领导权,加上摊子铺得太大,企图同时在包括扫帚和假发等生产在内的500种产业中实行计划化,因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职工和消费者埋怨工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企业主埋怨政府办事拖拉,偏袒雇员,因而彼此都不满意。正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这一计划的试验也就不了了之。

经过产业复兴法的挫折之后,罗斯福在第二次百日新政中不得不实行策略上的退却,把矛头转而指向垄断资本,试图用税收调节解决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从1935年到1937年,罗斯福曾使用过从信贷刺激到税收调节等多种措施,但对促进经济复苏都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罗斯福的“智囊”中还有主张实行财政刺激的公共开支派。凯恩斯也曾多次写信给罗斯福,并亲到白宫向罗斯福宣传他的赤字财政主张。但是这位总统并不相信赤字财政的效能,并力求扭转1933年至1937年由于经济萧条而不可避免的财政亏空。1937年初,政府急剧削减开支,企图平衡预算,使初见复苏的经济又突然转向衰退。经过半年的犹疑,罗斯福决心作一次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试验,有意识地打了一个预算赤字,果然不久经济又重新回升。不管这里是否有其他因素的巧合,这件事的确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罗斯福“智囊”中的公共开支派因而扩大了影响。这是美国政府自觉运用财政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的开端。

和实行计划化相比,运用财政杠杆调节经济的阻力要小得多。计划化为达到某战略目标必须对国民经济统筹安排,调整生产,分配结构,还要对经济发展区别轻重缓急、先后主次,这必然会触及某些权势集团的眼前利益。可是当政府用借款办法增加开支、刺激经济时,它并不使任何人感到遭受损失,因此它只会获得朋友而不会树立敌人。企业主支持它,纳税人也不会反对它。改良主义者可以奉行这种政策,保守派也不一定和它势不两立。这是单纯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容易在美国扎根的一个原因。

但是没有计划指导的杠杆调节的优点和它的缺点是并存的。它的根本缺陷是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经济周期,而且不能满足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以后需要解决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如人力资源、人口控制、城乡发展、交通运输、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等。这些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本来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需要在统一的计划下加以协调,使之得到系统的解决。没有计划指导,处理这些问题就只能零敲碎打,为各种权势集团的狭隘利益所左右。

肯尼迪对这种现状是不满的,因而企图在计划化方面有所前进。他赞赏西欧政府,认为他

们对“技术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并且能“协调国民经济的各种成份，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他要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Walter Heller)报告欧洲的计划方法，通过赫勒和其他人，他学到了法国的“指导性”计划。那里的政府把经济目标向重点企业提出，但是没有东欧流行的那种严密的中央控制。据施莱辛格回忆，肯尼迪发现所有这些都是管理现代经济十分合理的方法，他在理性上事先就倾向于把分权制的决策，和全国经济目标结合起来的观点。但是肯尼迪短促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愿望没有能结出果实。

约翰逊总统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影响，曾经把麦克纳马拉治理国防部的成功经验，计划-程序编制-预算制度(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在21家重要政府机构中加以推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战略目标，计算成本和效益，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用于实现目标的计划，扩大执行计划的选择性。约翰逊认为这种计划化办法能够加强中央权力，改进官僚机构，1965年8月宣布把这种计划制度在整个政府中推行。但是约翰逊好大喜功的作风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使这种努力没有真正扎下根来并随着他的去职而流产。

尼克松是一位具有矛盾性格的总统，他的保守主义哲学思想和他要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使他更趋向于实用主义。因而在他的首届任期也曾有过实行计划化的冲动。在这方面给他以重要影响的是莫伊尼汉。莫伊尼汉认为社会政策必须采取系统论的方法去解决。“每件事都和每件事相联系”，他把这一点列为决策者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总结出“伟大社会”的基本错误，是使400个影响都市区域的、互不相关的计划分散开来，而没有彼此协调和远景展望。他的系统论观点影响了尼克松。1969年1月尼克松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建立城市事务委员会由莫伊尼汉领导，任务是“设计一种全国城市政策”。命令说：“我们至今没有一种和谐的、前后一贯的积极政策，表达联邦政府希望看到什么，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尼克松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全国发展政策。莫伊尼汉在对这一意图做解释时说，尼克松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自由派时代分散的、多头的社会计划，引向统一的政策，按系统论加以设计和应用。他在1970年谈论政策与系统论的关系时说：“政策的观念是从承认社会制度是一个系统的认识产生的……在一个系统中，每一件事都和另一些事相关联，如果一个部分改变了，其他部分都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总体效果而不是局部效果。”在和莫伊尼汉几次谈话之后尼克松就决心创立一个全国目标研究参谋部(National Goals Research Staff)。1970年7月该组织提出了“走向平衡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某些地区向特大城市发展和其他地区人口不足的趋势是可以扭转的”，“一种协调的全国战略”“必须设想出来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回避了计划的名词，实际上是要把美国经济向计划化的方向推进一步。不过尼克松的实用主义注定他在向计划化迈进中的摇摆，随着在他第二任期中政治上的坎坷和莫伊尼汉的去职，为了得到共和党保守派政治上的支持，尼克松在计划化的问题上退却了。推动计划化的主动权转到了国会方面。1972年5月参议员汉弗莱起草了一项立法，要求国家承担起全国发展计划的责任并建立机构加以执行，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美国宏观调节的计划化倾向虽然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却在暗中悄悄发展，它反映了美国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对计划化的客观要求。事实上美国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在战后几十年中已经朝着计划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麦克劳希尔公司在40年代调查时，只有20%的公司能提出四年的投资计划，到60年代再做调查时，已经有90%能这样做。在经济基础进行的这场静悄悄的变革不能不对领导者产生影响。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不仅从“智囊”机构中吸取了计划化的思想，而且也从大公司转入政界的经理阶层如麦克纳马拉、阿什、康纳利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计划化的新观念。这些现代的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律师、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工程师，在60年代后期已经浸润了计划化的精神气质。他们一旦参政，必然企图运用系统论、运筹学等方法把宏观调节向计划化的方向推进。这不仅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符合巩固垄断资本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的。

但美国的现实是存在许多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其中虽然不乏开明人士,但大多孜孜为利,目光短浅,因而形成了一股反计划、反干预的强大保守力量。在不存在战争或重大危机的和平环境,很难把这些权势集团纳入计划轨道。罗斯福建立计划局的努力曾被《纽约时报》批评为对计划的偶像崇拜。《美国新闻》曾断言建立计划局将使国家破产。在罗斯福之后,这种观点往往通过共和党总统的纲领反映出来。70年代许多保守主义者的代言人如怀尔达夫斯基、威尔逊、克利斯托尔也都从事反计划、反干预的宣传,他们提醒人们说,人类是无知的和容易感情冲动的,政府是无能的,社会对人类头脑和管理能力来说过于复杂,未来是没有尽头的泥泞道路,从而否定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这些论调在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实验遭到挫折时就显得特别耸人听闻。在这种保守力量的牵制下,像西欧、日本那样的计划化则为美国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在美国除去战争时代,始终没有由中央政府做过全面计划,只有为某些利益集团或部门为控制其自身活动领域而制订的局部计划。它只为保护局部利益服务,却没有同更大的全国目标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激烈的世界经济角逐中美国的一大弱点。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是两种力量互相抵消的结果。一方面在美国有一种向计划化迈进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从宏观调节向自由放任后退的力量。两者都为美国的现实所不许可,斗争的结果达到了暂时的平衡,使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得以持续下来。

财政杠杆与宏观调节

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以财政杠杆为主要调节手段。美国在30年代尤其重视财政杠杆在反周期波动中的调节作用。

通常人们认为凯恩斯是美国赤字财政政策的鼻祖,其实早在20年代美国即已产生赤字财政理论。它的倡导者是福斯特(Forster)。他在一本反衰退的书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当企业情况不妙的时候要政府多开支”。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福斯特以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表达方法重复了他的主张。他认为,“在政府领导下,使一次大萧条进入复苏……在困难的时候公债应当增加,好转时公债应当偿还”。这是补偿财政理论的雏型。它受到罗斯福手下以埃克尔斯为首的公共开支派的赞赏。

凯恩斯的“通论”以就业和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以及用公共开支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把赤字财政政策理论化了,为冲破传统的平衡预算论奠定了基础。然而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真正流行是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这时受凯恩斯理论培育的一代青年已经走上掌握实权的岗位。肯尼迪就是在这一代经济学家的熏陶下成为美国第一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总统的。

凯恩斯学派认为财政杠杆反经济周期的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自动稳定器;另一类是斟酌情况而实行的自主调节政策。

自动稳定器是指美国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发生的反周期效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是随经济的兴衰而上落的。在经济繁荣期此类税收增加,赤字缩小,所起的是反膨胀的效应。在经济停滞期,税收减少,赤字扩大,所起的是刺激需求的反衰退效应。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相似的作用。在繁荣期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开支减少,社会需求压缩,有利于防止经济过热。在衰退时此类开支增加,社会需求扩大,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还有许多开支虽然不会随经济周期而变化,但其不变性也成了在衰退出现时的稳定因素,所有社会保障项目,如老年保险、医疗照顾、医疗补助,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援助都有这种功能。人们认为这种自动稳定器是随政府干预的扩大而逐步形成的。在大危机以前这种稳定器还不存在,而它的形成对缓和危机的震幅是有作用的。

自主调节政策试图创造的是一种外在机制,它的功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总供给

与总需求不能自行平衡时,使它恢复平衡。它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南,研究在私人投资不足和私人投资过度两种情况下,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所应实行的补偿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高级形式就是编制所谓充分就业预算。它采取如下的方法:在私人投资不足时,要依据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水平(一种说法是4%)与实际失业水平之差,计算出达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所需要的补投资,这也就是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这个开支的大小取决于投资乘数,而投资乘数又是根据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出来的。相反,在私人投资过度时,则必须使用相同的方法减少财政开支,以克服求过于供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除使用扩大或紧缩财政支出的方法促进供求平衡之外,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还可以把税收政策和开支政策结合起来运用,以达到同样目的。这是因为根据投资乘数、消费倾向等参数计算,如果按同等金额在增税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那么增税所造成的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水平的下降,将小于增加开支所导致的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实行补偿财政政策确定应增加或应减少的收入金额之后,就可以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的政治经济需要,采取增税和增加开支并举;多增税少增开支;只增税不增开支;减税增支;减税减支或增税减支的不同自主调节政策。

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还认为可以把这种自主调节政策扩大到同金融政策相互配合。比如财政方面必须实行紧缩政策,维持高税率和低开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使宽松的金融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吸引私人投资,弥补私人 and 政府开支的不足。在另外的历史背景下,如果金融方面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就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这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还可以使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配合,降低财政收入,增加开支,以消除紧缩货币信贷对投资的消极影响。

财政杠杆所创造的两类外在调节机制在实践中的效果,是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

就自动稳定器说,一般认为它对缓和战后经济危机的震幅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正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大的问题是随着自动稳定器中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日益增长,政府背上了一个日趋沉重的支出包袱,约束了政府在运用自主调节政策时的自由。

至于自主调节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则可以举出成功与失败的不同例证。

1938年罗斯福的预算赤字曾经对促进复苏起过作用;二次大战期间的巨额预算赤字曾经使不景气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1964年的减税曾经带来了经济的有力扩张,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但是,1948年的减税并没有导致经济扩张而是带来了衰退。朝鲜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是与预算结余同时发生的,可是当预算结余变为赤字时通货膨胀反而减弱了势头。伴随着较大预算结余而发生的1954年衰退,比伴随着较小预算结余而发生的1957-1958年衰退要来得温和。这些事实又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符合财政调节的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运用财政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其效果是极不稳定的。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财政杠杆本身作用的有限性。在肯定联邦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同时,必须看到垄断资本的经济运转还受到其他许多难以预见因素的影响。其次,宏观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杠杆调节必须依靠经济预测,而在不准确的预测基础上进行的杠杆调节,不仅不起积极作用还可以帮倒忙。在这一点上,里根政府对宏观调节的批判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行规律,会促使政府执行的积极干预政策走向自己的反面。凯恩斯主义理论本来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目的,但是垄断资本对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不断扩大“安全网”,对外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而实行军事扩张,却使其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这是导致70年代滞胀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的重要内在根源。改变这种局面不仅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就是里根经济学也并没有找到有效办法。

金融杠杆与宏观调节

对美国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另一重要渠道,是通过货币信贷活动影响国民经济,这是联邦储备系统的职责。联邦储备掌握发行货币的大权,同时还握有三种可以直接影响货币总供应量,间接影响银行信贷活动的手段。它们是法定准备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储备通过上述金融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法定准备率是指银行对存款型负债所必须持有的资产比率。根据1980年立法,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设置法定准备金。它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一种是存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存款。规定这两种资产具有准备金资格是为了对货币总量便于控制。联邦储备所投放的准备金,经过若干次信贷活动可以创造出比原来大许多倍的货币供应量。投入流通的准备金和它所创造的最大限度的货币供应量两者的比率,称为货币乘数。它受法定准备率的制约,等于法定准备率的倒数。这就是说,如果法定准备率为10%,货币乘数就是10。联邦储备投放1万美元的准备金,它的最大限度是可以增加10万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因此法定准备率的提高或降低就会扩大或紧缩货币供应量。

贴现率是联邦储备对商业银行贷款所收取的利率。任何金融机构如果准备率达不到法定标准,都可以向联邦储备申请短期贷款。这一准备金的来源通常称为“贴现窗口”。借款单位可把顾客给他的票据或联邦储备银行可以接受的其他抵押品进行重贴现。

当联邦储备想抽紧银根时它可以提高法定准备率。在此情况下银行之间短期拆借的所谓联邦基金的供应会紧缩,金融机构将被迫转向联邦储备的“贴现窗口”。如果贴现率同时提高就会使金融机构觉得这样做无利可图,他们将被迫紧缩贷款和投资。在企业活动疲软的时候,联邦储备可以用低贴现率向金融机构提供准备金,使他们感到扩大贷款和投资有利可图,从而扩大信贷活动。

联邦储备有权改变法定准备率和贴现率,这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活动确有调节作用。不过这些杠杆的运用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过于灵活,而金融和经济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必须有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手段。购买和销售美国政府债券就是联邦储备能经常作用于金融市场的手段。这就是公开市场业务。

联邦储备用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准备金的机制是这样的:当联邦储备购买政府债券时,银行发现自己的准备金增加了,在法定准备金之外出现了超额准备金。为了把超额准备金变为谋利资产,他们就急于把超额准备金贷放出去,这样就增加了贷款或投资的供应。当联邦储备出售证券给金融机构时,相反的事情就会发生。一般说当联邦储备需要增加货币供应时,它就购买政府债券;当它要减少货币供应时,就出售政府债券。因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成了联邦储备中一个最有权威的决策机构。

在金融领域可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杠杆有上述几种。如何运用这几种杠杆去调节国民经济,在二次大战后是有争论的。这种争论和理论上的指导有关。总的说可以分为三种战略。

一种是严格控制准备金总供应量的战略。货币主义者主张实行这种战略,即把准备金总供应量定死而把利率放活。按照这种战略,当经济情况变化对贷款需求超过或不足计划规定的准备金供应量时,就要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假定经济高涨,对贷款的需求增加,银行为了取得更多利润愿意扩大贷款,为此就要追加准备金。有些银行将转向联邦基金市场告贷,从而加剧市场资金需求的竞争,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其他短期利率受到影响也将上升。有些银行将转向联邦储备的贴现窗口贷款。这种贷款增加之后,联邦储备必须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债券,从银行系统吸收一个相当数量的准备金,这就将使联邦基金市场更加紧张,并把利率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最后利率将高到足以减少贷款量和对准备金需求的程度,直到抵

消最初贷款需求的增长。银行系统总的准备金供应量则始终维持原来水平。

第二种是严格控制利率的战略。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中期以前采用的基本上是这种战略。其论据是稳定的低利率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战略下,重点不是控制准备金供应量而是稳定联邦基金利率,并且通过这个关键的利率保持其他短期利率的稳定。这就是把利率定死,把货币供应量放活的战略。这样做,联邦储备在经济高涨、信贷需求增加、联邦基金利率上涨时,必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相反的情况下,它必须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债券以紧缩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执行这种战略的结果,将是利率的稳定和准备金供应量的不稳定。

第三种是控制准备金增长目标区的战略。这是1979年10月以后,联邦储备所实际执行的一种战略。在防联邦储备每周每月的操作中,力求稳定准备金供应量,同时允许它有一个变动幅度。这种战略的含义是介于上述两种战略之间的中间道路。

当贷款需求增加时,正如控制货币总供应量的战略那样,将使寻求准备金的银行争着向联邦基金市场告贷,这将抬高联邦基金利率。随着这种利率的上升有些银行将转向贴现窗口。然而和第一种战略的作法相反,联邦储备将不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去抵消贷款,结果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在控制货币增长目标区的战略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将随着贷款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种利率的增加将比在第一种战略下所增加的为少,而货币供应的增加则比第二种战略下上升的幅度为低。在贷款需求下降时,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将下降,但是利率的下降将比第一种战略下为少,而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则将比第二种战略为低。

几种战略比较,联邦储备认为目标区战略比控制利率战略优越,因为它允许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比较严密的控制。在控制利率的战略下货币供应量趋于加强周期波动。这就是说在商业周期的高涨阶段,贷款需求膨胀时利率有上升趋势,要维持低平利率就要增加货币供应,货币供应的增长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膨胀。同样,在商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当贷款需求下降时利率有下降趋势,为了维持稳定的利率就要紧缩货币供应。货币供应量的紧缩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收缩,这样的战略显然不能对经济起调节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是增加它的不稳定性。

同时,联邦储备认为目标区战略比总量控制战略优越,因为它可以避免不适当的短期利率波动。

然而从三至六个月的较长时期着眼,联邦储备认为,总量控制战略和目标区战略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目标区战略下,如果观察到一种货币供应量向高于它的指定区域持续移动的趋势时,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逐步向下调整,使之进入原定的目标区。如果观察到货币供应量向低于它指定区域持续移动的趋势时,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逐步向上调整,把它推到指定的轨道中去。

然而联邦储备的经济学家们坦率承认,在现实世界里要精确地对金融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使它像在火车轨道上那样运行是不可能的。联邦储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要受到技术上的限制,也要受到许多变化不定因素的限制。

自1979年10月联邦储备宣布实行目标区战略以来,经过七年的实践,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说明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所形成的购买力与生产的增长必须保持适当比率,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与马克思的货币规律理论相一致的。但是把美国宏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看,当前的根本问题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极端不协调。财政的超级赤字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严重超分配,它目前是靠外资的流入勉强支撑的。如果失去这个条件,其结果将不是物价高涨就是利率飞升。所以财政的超级赤字将始终是对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目前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除外资支撑的条件以外,还从石油价格暴跌和初级产品价格疲软得到很大好处。这些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必将使美国宏观经济失去平衡,陷于混乱。这

也是为什么里根政府决心对赤字实行紧缩政策的原因。它的困难仍然在于美国对外争夺军事霸权和对内求得人心安定所形成的过度需求与财力不足的矛盾。

几点评论

第一,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社会化之后,实行计划化的客观要求和反计划化的趋势相互妥协的折衷产物。诚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即使是西欧、日本的计划模式对熨平经济周期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就促进经济发展来说,后者比前者还是略胜一筹。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战后西欧、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美国的原因。肯尼迪是最早注意到这一事实的美国总统。但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特别强大,使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模式不仅不能有所前进,反而时刻面临着倒退的威胁。另一方面,国际上日趋激烈的经济角逐,又促使美国的有识之士在为推进计划化而奔走呼吁。两种思想的较量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尼克松第二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坦(Herbert Stein)曾经说过,计划思想有自己的周期正是这种反复较量的反映。

第二,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在促进社会再生产均衡发展上,比资本主义的所谓计划经济和杠杆调节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在我国不存在只追求各自利润,而否定整体利益、独霸一方的利益集团。国家、企业和工农知识分子在整体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能够遵循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方针,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以及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计划商品经济中,财政金融杠杆在调节经济方面有重要位置。它的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技术政策,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使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起来,通过财政、信贷的平衡,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促进经济的发展。30多年来,由于我们对计划商品经济认识有偏差,使它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认识经济规律、实行计划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实行经济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商品经济的优越性。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在此过程我们需要研究西方宏观调节的经验,借鉴其可取之处。

第三,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不是为了制造不平衡,而是用财政上的不平衡求得经济上的平衡。这在资本主义供过于求、资本闲置的条件下,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但是赤字要有限度,借债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教训就在于忽视了,或者说无法控制这种量的界限。我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的家底薄,加上公有制的分配制度,一般不存在资金过剩的问题,所以美国式的赤字财政政策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但这并不是说我国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适当举债,这里的前提还是要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至于把财政亏空货币化的做法则应避免,因为它的结果只能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通货膨胀。有一种说法似乎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是把西方发展经济的教训当作经验的错误理解。认真研究一下美国的通货膨胀史就知道,这种道路是不可取的,蕴藏着极大风险的。

第四,要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的配合极端重要。在美国,有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谁在宏观调节中更为重要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所受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就是过分强调维持低平利率而不重视控制货币发行量。80年代里根经济学深陷泥泞是财政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即片面强调减税能带动收入的自行增长,低估了赤字失控的危险。这两种失误都与理论指导的片面性有关。两种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其共性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失去平衡和经济的停滞。不同之处,一个表现为通货膨胀,一个表现为由高赤字的连锁反应所带来的高贸易逆差。

这就说明宏观调节不可能单靠一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取得成功。这一点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道理是相同的。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不仅要求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各自平衡,而且要求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而这一点在美国则还是一个众说纷纭、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恰好说明掌握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

王缉思

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之中,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犹疑不决,政策声明的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的激烈争论,美国官员提出的五花八门的政策建议和情报分析,再加上有关中国的大肆渲染的新闻报道,使美国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暴露得尤其充分,向中美两国的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提供了许多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

从表面上看,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同1945年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人在1945年声称他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而1955年却执行了一项遏制、孤立、打击中国的政策。两个目标都是明确提出的,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引起争议。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美国企图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心愿的“强大中国”的梦想,标志着多年来美国企图主宰中国命运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旨在削弱中国的政策持续了20多年,直到美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本文评述二次大战后头10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着眼于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对后来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的后果。试图从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同中国的利害冲突、美国国内政治这三个角度分析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政策的外在变化和内在连续性,及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反映的基本思想观念。这些因素和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今天,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与苏联因素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上升到顶峰。1945年以前,美国势力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阻挠,也受到英国、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列强的牵制。然而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军队进驻了整个太平洋,在中国和朝鲜找到了立足点。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看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前景,即整个太平洋都可以变为某种形式的夏威夷”(1)。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就制订了占领亚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计划,并准备在日本战败之初将其付诸实现。(2)正是这些战时计划为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定下了基调。据此,日本将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监护之下,而战时的盟友中国将变成一个美国操纵下的“强国”。

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互相妥协而产生的重建世界秩序的全盘方案,它划分了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范围。此后,苏联满足于保持它在雅尔塔获得的有关东亚的

权利。美国外交家凯南说这个时期的苏联政策是“在苏联以外的亚洲大陆上承担尽可能小的义务、争取尽可能大的权利的灵活而有伸缩性的政策”（3），不无道理。罗斯福和他派往中国的特使赫尔利曾指望得到苏联合作，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在避免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这一点上，美苏两国的立场是接近的。1945年8月，正当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的时候，斯大林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电文大意是：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4）这是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国际背景。

随着美苏在欧洲的冷战加剧，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强国”的愿望变成了有针对性的战略构想。马歇尔使华是同美苏冷战相关联的。使华的目的与其说是“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建立权威”（5），不如说是扩大美国自己在中国的权势，抵消苏联影响。至于苏联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中国政治，是否积极援助中共，都不是美国战略考虑中的首要因素。美国抓住中国不放，是基于在“遏制苏联扩张”旗号下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更加明确地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是它的全球战略的必然结果。正如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基本目标，在于推动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来领导一个独立、统一，与美国保持亲善，并能在远东阻止可能出现的苏联侵略的中国。从中国的混乱情形看来，短期内切实可行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6）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对中苏关系的基本估计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7）但是，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使美国人开始希望中苏之间也能出现嫌隙。1949年12月，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建议，美国“应当利用中共同苏联以及中国国内的斯大林分子同其他力量之间的一切分歧”

（8）。从12月16日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长达八周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此期间最有希望在中苏之间制造不和。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约翰·戴维斯预言，苏联对中国的“勒索”，加上中国自身的经济困难，有可能造成中共“领导层的分裂和政变图谋”（9）。此时美国政府的重要公开声明，都避免直接攻击中共，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中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大失所望。美国官员排除了中国出现“铁托主义倾向”的可能性。

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立场和政策，没有给美国同新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留下余地。应当说，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中苏结成紧密同盟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所作所为促成的。艾奇逊在“中国问题白皮书”里的一些言论，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那篇所谓新中国是“斯拉夫满洲国”的讲话，据说都是意在煽动中国人反抗苏联的民族主义情绪。（10）但是美国官员这类关于新中国是“莫斯科仆从”的谩骂，效果却适得其反。分裂中苏关系的其他设想，如美国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开展贸易，则根本没有付诸实践。

到1950年初，出现了中苏结盟、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朝鲜北方革命政权巩固等新的事态发展，美国政府重新估计亚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在亚洲存在着“由斯大林操纵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念。亚洲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促使杜鲁门政府将其亚洲政策更紧密地同美苏在欧洲的对峙联系在一起。1950年4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把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化，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不加区别地说成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进一步加深，加强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美国政府曾一度打算不硬行阻挠中共攻占台湾，可是到了1950年夏天，对这一政策也在重新考虑。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决策者就已勾画出一幅新的亚洲蓝图，企图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正是与这一新战略相符合的。（11）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立刻把在朝鲜发生的军事冲突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承认它是朝鲜内战。

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官员仍然很难看出中国利益同苏联利益的区别。他们认为，

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而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斯大林逝世的间接后果。但是,随着中国在亚洲政治地位的提高,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逐渐从苏联转向了中国。然而美国决策者又意识到,决不能把新中国说成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力量,因为如果承认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破坏了它在外交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依据。由艾奇逊在1949年提出的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新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它宣称由它统治的领土,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12),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地变成了一条,即新中国是否被认为独立于苏联。出于维护“不承认政策”的需要,美国一直在制造舆论,指责新中国领导人把“异族统治”强加给“受到威吓的中国民众”。

尽管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关于中国对亚洲安全构成“威胁”的喧嚣声不断,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中,欧洲仍比亚洲更为重要。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扩军备战的重点是加强美国本土和西欧的军事力量。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美国赋予它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因为在亚洲没有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区性军事集团。美国希望通过1951年签订对日和约将其正在形成中的东亚地区性战略构想确定下来,首先是扶植潜在的经济大国日本以遏制中国。但是在50年代初期,东亚其他的亲美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政治危机。美国对该地区的不稳定局面和中国影响的扩大感到不安。1954年9月在马尼拉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组织在美国卵翼下的企图。美国计划在东南亚地区也设立一条防线,与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已划定的界线一道,建立起抵制中国影响的三个前沿阵地。

美国战略家并不满足于在亚太地区已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军事条约和只包括两个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他们想使该地区的战略据点形成网络,构成更完整的反共包围圈。在美国同菲律宾、南朝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三个军事条约的序言中,都提到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而美国要想完成这一战略计划,必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就试图以抵制苏联影响为名,向印度支那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加紧对印支的干涉,又是为了把该地区建成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推进的堡垒。此时,“多米诺骨牌”的思想已经萌芽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一些美国战略家提出的观点,即印度支那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控制亚洲的攻势”中的一条战线。1951年杜勒斯警告说,共产党的“阴谋”是要“在从朝鲜经中国到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以及西至西藏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三国边界的广大地区赢得战争,制造混乱”(13)。朝鲜战争期间,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朝鲜(14)。因此,美国不断增加对法国的援助。1954年春天,法军在奠边府溃败之前,美国已承担了法国在越南战争费用的80%。

虽然艾森豪威尔承认“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红色中国公开卷入了印度支那的冲突”(15),他一度同意了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的计划,准备派遣美军到印度支那(16),空袭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线,甚至“从水陆两方面对中国沿海的某个岛屿如海南岛发动进攻”(17)。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他威胁说,“将中国军队调往印度支那可能意味着对中国本土的战争”(18)。

同美国当初决定加紧干涉中国内政时对苏联因素的估计相类似,美国决策者的印支战略并非建立在苏联或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印支事务的判断上。更重要的出发点是,他们断定越南革命的胜利将使苏联和中国获利,而对美国则意味着遏制中国政策的破产。

美国在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问题上有所克制,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有些美国官员担心,动用美军支援法军作战很可能迫使中国出兵援助越南。第二,美国进行朝鲜战争在美国国内不得人心,人们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第三,英国劝美国不要把西方拖入另一场亚

洲战争,美国政府也担心冒险行动会在盟国和世界舆论中引起不利反响。

在这种形势下,考虑到美国对印度支那战略重要性的估计和美国领导集团中不断增长的依靠武力外交的倾向,以及与其针锋相对的中国领导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完全有理由推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美之间可能在中国南疆附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只是在确定将要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美国才勉强接受了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除了印支的潜在危机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0年代中期认为东亚总的战略格局是对美国有利的,希望通过加强同地区盟国的关系和巩固亚洲反共政权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使这种战略格局固定下来。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时,杜勒斯不无得意地称之为“亚洲的门罗主义”(19)。在此之前,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承认,美国的目标是保持“美国在远东的统治地位”(20)。

50年代中期美苏在东亚的关系,同40年代中期有某种相似之处:双方心照不宣地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苏联仍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它对东欧的控制,在东亚地区则同美国一样,希望暂时维持现状。同40年代中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相比,50年代的中苏关系更为密切,但两国的战略利益仍有明显差异。这一点在1954至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就有所表现。1955年1月,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21)。中国通过解放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向全世界表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此后又积极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在客观意义上是中国对美苏关于维持东亚现状的谅解的一种挑战。这两个历史事件,以及随后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使中国外交的自主性更加明朗。从此,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更加脱离了美苏关系的运行轨道。1955年7月四大国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开始趋向缓和,而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一直没有转变。

在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上,杜勒斯和艾奇逊一样(而不同于国务院的腊斯克、罗伯逊和军方的雷福德等人),私下里也认识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他相信,促使中苏分裂的最有效途径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减轻这种压力”(22)。对新中国的这种高压政策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23),反映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美国政策与中国民族利益的冲突

如果说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主义和美苏竞争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就是其对华政策的结果。美国只要不放弃它在远东谋求霸权地位的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深深卷入中国政治是其全球外交政策的产物,但前者对后者又形成反馈,促使美国领导集团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以至影响到整个美国外交。

战后初期,美国希望中国作为亲美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这是同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设想紧密相关的:中国要担当这样的角色,应该建成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是按照美国的定义。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在中国内战最终爆发之前,不少美国官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两大政党也应该以美国的政府形式互相制衡,但由美国人高高在上担任仲裁人;美国应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再通过国民党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一个美国人认为将向民主化发展的两党政治体制。

尽管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但是在前文所述的战略考虑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驱使之下,在中国内战中援蒋反共。阻止中共夺取政权的权宜之计葬送了一些美国人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理想目标。随着美国官员以欧美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政

治的幻想破灭,他们退而求其次,致力于国民党内部的“改革”;这一努力无望时,他们的最后一着是换马,劝蒋下台。对于中国共产党,美国官员从未设想过有内部改革的前景。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除通过国民党打击中共之外,无法向中共施加政治影响,也就无法将其政治主张强加给中共领导人。此外,在40年代后期,关于中共只是“土地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的看法已经没有市场,中共作为“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已经确立。美国官员只希望以各种方式阻止中共力量发展壮大,并企图鼓励所谓“铁托分子与斯大林分子之间发生分裂”。

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努力归于失败后,美国国务院在一段时间内确曾希望与新中国政府建立某种正常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认真考虑过在国民党政府灭亡之前就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在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应承认新中国的争论中,没有什么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继续把国民党政权当作“中国政府”与之打交道时,新中国会不会接受美国的“外交承认”?美国官员似乎都相信,一旦美国开恩,伸出“承认”之手,中共就会迫不及待地同美国建交。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官员是看到同北京建交的好处的。他们希望通过同新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保留在大陆的立足点,逐渐恢复美国影响,离间中苏关系。但是他们一贯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决心。从1949年黄华在南京表示同意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一事及同年出现的其他一些事件和谣传中,美国决策者得出错误的印象,以为中共或其部分领导人是从弱者的地位出发有求于美国,因此美国应继续施加压力逼中共软化对美态度。同时,美国官员估计新中国在经济上将无法收拾旧中国的烂摊子,迟早会转向西方求援;(24)他们设想,如果美国伙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采取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中国又不能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中国革命政权即使不垮台,也会被迫转变内外政策。

美国这项政策的代价是它的影响被相当彻底地清除出中国大陆。从此之后,美国官员同中共方面在内战时期最低限度的接触都中断了,美国对新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意图的判断更加缺乏客观依据。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的意图曾经是:在避免与中国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武装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即所谓“既使人消除疑虑,又显示决心和力量的政策”(25)。杜鲁门政府通过公开声明和第三国向中国保证美国无意以武力侵犯中国。但是中国领导人无法相信美国的保证:从赫尔利、马歇尔使华到美国违背杜鲁门1950年1月的诺言而武装封锁台湾海峡,美国的政策声明经常出尔反尔,已无信誉可言。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印度转达的关于美军停止向北推进的承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全是欺骗(26)。美国既没有使中国相信它的保证,更没有慑服中国。

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双方意志和力量的较量过程表明,美国决策者总以为中国领导人会以他们那样的思维方式来推理、判断、决策。对于中国发出的明确无误的警告,不是看成“虚张声势”,就是以为能用武力威胁来吓倒。导致美国错误判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空中优势过于自信,迷信美国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能结束,美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轰炸是主要原因(27)。但是,朝鲜战争的结果恰恰证明,中国在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有能力并且敢于击败优势装备的美国军队。著名学者邹谠指出,朝鲜战争“标志着战时罗斯福总统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政策部分地、带讽刺意味地得到了实施”(28)。

在一定意义上,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对抗澄清并体现了那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实质。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亚洲扩张的愿望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要求之间的矛盾,由于有日本这一共同敌人而被掩盖着。40年代后期,这种民族矛盾表现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由于号称代表中国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由于美国反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矛盾的实质仍未充分显露。直到中美军队在朝鲜遭遇前夕,杜鲁门政府还在竭力宣传苏联而非美国是继日本之后威胁中国独立的国家,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29)。但是,中共夺

取全国政权后,它所代表的中国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同美国遏制新中国的战略计划已经发展成对抗性矛盾。中国的民族觉醒和革命精神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和武力扩张的倾向也相对处于巅峰状态。两国各自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和利益冲突,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表现为大规模的意志和力量的较量。这样一场斗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只是在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上有其偶然性。

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创伤,但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行动,使台湾问题从此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旷日持久的政治争端。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已在策划将台湾割裂出中国(30)。那些处心积虑这样做的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找到了染指台湾的借口和时机。

无论从中国方面看还是从美国方面看,台湾问题都包括政治和领土主权两个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意味着革命尚未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美国武装封锁台湾海峡,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就将在政治上和领土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统一的方式可以同国民党谈判,但美国人提出的台湾领土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来说,台湾具有政治重要性,因为国民党的前途同美国国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护台湾当局又是美国“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意志象征。另一方面,台湾的战略地位对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战略据点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当利用蒋介石为美国政治目的服务和出于战略观点而继续占据台湾这双重考虑发生某种不协调时,战略考虑往往占上风。50年代的美国决策者认为,既保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又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最便于协调上述政治考虑和战略考虑。尽管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一直蓄意谋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土分裂永久化。

但在1954年和1955年,美国政府意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无意突出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它宁愿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含糊的立场,这样既不把蒋介石政权逼进死胡同,又给美国未来的对台政策留下选择余地。如上文所述,这个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意图是巩固阵地,维持现状,因此它希望中国领导人和台湾当局都接受中国分裂的既成事实。正如艾森豪威尔私下所表示的:“就福摩萨问题而言,我真希望它简单得只要划一条线,说一声‘就此止步’。”(31)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国家分裂的现状是不能接受的。1954年9月,党中央突出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认为此时若还不提出此项任务,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32)。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八个月以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主动建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经过一阵犹豫之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降了调子,同意同中国会谈。他们确实希望同中国领导人达成某种妥协,但实际条件是中国所无法接受的,其中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中国默认美国的“两个中国”方案。这也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无法接受的。

1945年到1955年中美关系的特点之一,是蒋介石一再利用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手腕往往比他的美国支持者略胜一筹。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国民党当局抓住美国害怕它垮台的心理,虽然没能使美国公开承担保卫金门马祖的义务,却获得了美国的后勤支援和对国民党军队盘踞沿海岛屿的公开支持。双方之间类似的勾心斗角以后多次重演,表现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相互利用、又担心被对方利用的微妙关系。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当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作用降低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再次突出其重要性,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复杂、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不论从美国方面来说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国内政治一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

战后美国对外关系中没有一个问题像对华政策那样,与美国国内政治如此密不可分。美国学者认为,“对官僚政治的认识使(对华政策)分析家能够解决通过其他方法无法解答的难题,充分地提出深刻、微妙得多的解释”(33)。理解美国政治的多元性和决策过程,确实是分析中美关系的许多纷繁现象的关键。

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大辩论”的前奏始于1945年。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同在使馆工作以及担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美国职业外交官发生了争论。罗斯福总统当时支持了赫尔利的立场,有关政策方针的争论也因此中断。尽管后来赫尔利关于其下属“叛逆”、“亲共”的指控没有多少人相信,持不同意见、了解中国政情的美国外交官还是全部被调离中国。

共和党对民主党对华政策的批评则始于1946年底,几个月之后才扩大化。国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开始时,国民党的军事地位似乎不大令美国人担心。1947年3月和6月,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公布,二者都表现了美国政府在对外承担义务方面先欧后亚的倾向,这是主张优先考虑亚太地区的共和党人所批评的。

魏德迈使华调查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政府必须马上进行全面改革,一定要采取步骤改善中国经济。到1947年底,国民党面临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美国国会又一次发生了中国问题大辩论。共和党人要求采取重大措施帮助蒋介石保住中国东北。1948年春,杜鲁门政府在“援华法案”问题上表示愿同国会妥协,是为了防止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白热化,妨碍杜鲁门竞选连任。

在应当耗费巨大资源“遏制苏联扩张”这一总战略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是统一的,而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是这个总战略的一部分。关于对华政策的两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应该给“援华”问题以什么样的优先考虑;旨在挽救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能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1947年至1948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丝毫没有改变美国政策的大方向。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对华政策顾问坚持不肯投入太多的力量,又想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辩论的影响在于,中国问题开始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决策者更难以调整政策,或暂时从中国问题脱身。

“院外援华集团”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联合体。其中的个人和团体都强烈反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又都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除此之外,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国会和共和党身上。1949年,当杜鲁门政府表示可能与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权划清界限时,亲蒋反共的情绪便同共和党人削弱杜鲁门政府的政治企图合流。“白皮书”一发表就被“院外援华集团”抓住,说成是政府“掩盖自己出卖自由中国罪责的白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军方和国会内部反对派的压力,使杜鲁门政府愈加不可能选择一项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例如,国务院曾对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可能性作过试探,但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人大叫大嚷地反对。1949年底到1950年初,艾奇逊不愿暴露美国对台湾的控制意图,以免出现一个“由美国制造的领土收复问题”,但是美国军方却无意掩饰自己觊觎台湾的战略意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防部长约翰逊,还有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朝鲜战争前夕就已经对从台湾“脱身”的想法提出异议。

美国国内的所谓“红色恐怖”,即对“共产党在政府机关中的渗透活动”的恐慌,也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起着消极作用。继赫尔利对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指控之后,在1948年和1949年,发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共产党间谍活动”的案件。随着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革命胜利等一系列事件,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反共宣传与日俱增。在这种政治气氛

中,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猖獗起来。参议员麦卡锡带头掀起“搜捕共产党”的运动。他的论点是: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国外的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国内隐藏着的共产党和叛国分子。虽然杜鲁门政府也是麦卡锡分子攻击的目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活动,在国内的“联邦忠诚计划”,却起着对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杜鲁门同麦卡锡的区别,在于杜鲁门呼吁全体美国人支持他的反共对外政策,以证明对国家的忠诚。1950年4月杜鲁门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国外的共产帝国主义,那里才是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重心所在。真正的危险在于共产主义可能推翻其他自由国家,由此壮大自己,准备向我们发起最后的进攻。”(34)

几年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变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字眼,但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行动(有人称之为“对外的麦卡锡主义”)却习惯性地被赞扬为“圣战”。一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谈到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恶果时指出:“麦卡锡对被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的迫害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南泥淖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35)

朝鲜战场上的中美对抗,大大提高了中国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如麦卡锡分子在“国内共产主义颠覆”问题上打击了杜鲁门政府一样,麦克阿瑟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问题上优先考虑亚洲的主张也给杜鲁门的政策造成了干扰。麦克阿瑟攻击中国是“亚洲一股新的统治力量,它为了自己的目的与苏俄结盟,但它本身的观念和手段就构成了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36)他坚决主张美国把朝鲜的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北以至内地。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战略方针上争论的焦点,仍在于“共产主义危险”主要来自何方。在美国外交决策人物中,多数人不赞成麦克阿瑟的主张,他们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构成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1951年,布莱德雷针对麦克阿瑟的战略说:“红色中国不是一个寻求统治世界的强国。坦率地说……这种战略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37)

虽然麦克阿瑟的主张未被采纳,重欧轻亚的外交侧重点也没有改变,但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加剧中美紧张关系的行动,却没有在美国外交界和政界引起多大争论。这种情况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失势有一定关系。有关中国的较为客观的观点在麦卡锡时期就受到严重压制,而对中国问题专家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杜勒斯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倾向都驱使他自觉地迎合国会里的共和党右派。结果在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只要是对官方对华政策表示过不满的中国问题专家,全部遭到清洗。连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工作过的二十来名美国记者也都销声匿迹。美国公众不再能读到有关中国大陆的较为客观的直接报道,更多读到的是对新中国的攻击和歪曲报道。

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后美国的反华宣传和活动变本加厉,与政府主要外交决策人物的思想倾向彼此比较接近有关。关于对华政策,政府内部不存在类似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内部那样明显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一些政府要员,其中包括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并不完全赞同艾森豪威尔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现状的想法,而要求政府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图推翻新中国政府。在1954—1955年台湾海峡危机达到高潮时,他们的意见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否决(38)。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他和杜勒斯实际上都害怕美国因走错一步而陷入一场新的战争。艾森豪威尔在向新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从金门马祖撤军这两条道路之间走钢丝。大多数国会议员与政府立场一致,把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承诺同守卫金门马祖区别开来。参众两院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进行辩论和表决的结果,都说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支持。

与40年代后期相比,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享有的权力从朝鲜战争开始逐渐增加,在整个50年代(乃至60年代),总统在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决策中,一般都不难取得国会的支持。

随着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上升,它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敏感而易受人煽动利用的问题,因此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都由最高层领导处理。在冷战时期,军方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熟悉中国问题的政府官员影响的减弱。这些消长趋势,构成了50年代中期和以后多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背景的主要特点。

四、美国有关中国的观念形态

中美两国社会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方处在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带着自己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对方,逐渐形成了关于对方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到国际环境、本国相对实力、本国和对方的社会内部变革等种种变动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基本看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时,必须剖析制订和执行政策的美国人以至整个美国社会有关中国的观念形态及其时代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美国实力的急剧膨胀,为其战后在亚洲的扩张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在40年代以前,美国未曾幻想过在远东建立“大美国治下的和平”,因为它缺乏达到这一目标的力量。但到了1945年,所有的大国中,只有美国未受重创,反而因参战而取得空前的实力地位。以此为背景,美国在处理一切外交事务时都表现出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在战后的年代里,“美国领导世界”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1953年艾森豪威尔声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3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顺利推进,是对这种“美国万能”观念的挑战。美国控制、“改造”中国的目标同它的手段和实际影响力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对自身能力的迷信使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中国内政采取不干涉态度。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辩论的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干涉中国事务,而在于干涉的手段和规模。在那些年当中,如果哪个美国人承认中共的胜利不可避免,美国无力“拯救自由中国”,就会有人说他对美国缺乏忠诚和信心。正是因为“白皮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控制力有限,才给共和党人攻击杜鲁门政府提供了更多弹药。“院外援华集团”和麦卡锡分子充分利用美国人认为自己国家无所不能的观念,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的逻辑是:从其拥有的手段来说,美国不可能无力改变中国的命运;它在中国的失败,只能归咎于政府领导的无能,或者比这更糟糕,是因为政府里有大批“共产党同情者”。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美国有力量,因而也应当有相应的意志和决心,去主宰中国的前途。如果领导人不充分“正当”地使用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各个角落都取得绝对优势,在当时就会被说成有悖美国式的进取精神。1950年4月制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反映了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咄咄逼人地运用美国权力的心理状态。以后麦克阿瑟要求对中国扩大战争的叫嚣,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露骨的核威胁,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武力恫吓,无一不是美国领导人在炫耀自己的“斗志”,表现了他们对本国实力的崇拜。这代表着早已溶化在美国人思想中的美国拯救世界的“命定观”与新近获得的美国实力相结合之后,美国所特有的狂妄。

基于“美国万能”的观念和“领导世界”的意识,美国官员认为自己“具有充当中国救世主的独一无二的资格”(40)。陶醉于商业野心和传教梦想的美国人曾对他们在中国自封的使命怀着特殊的自豪感。自“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人更把自己在中国的形象看得近乎完美无缺。在政治上,美国官员觉得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可以指向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但不应指向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反殖民主义传统”和“民主传统”,对中国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他们真正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中极少数中上层人物,却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在经

济上,很多美国人真心相信唯有富有的美国能够接济贫困的中国,中国人应当认识到自己只能依赖美国援助来发展社会经济。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我们的需要大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

自命为中国“救世主”的美国人,自然不感到需要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眼中,世界上只存在两种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要么效仿苏联,要么效仿美国。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国情、民心和制度格格不入”(41),而美国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却恰恰相反。费正清曾写道:“我们视为珍宝的理想是我们(美国)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事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二者照旧是不相容的。”(42)这种话并不是许多美国人能理解并接受的。

负责美国对华关系的人缺乏对中国民族权益的起码尊重,而总是带着傲慢和自封的“正义感”。例如,杜鲁门不承认中国军队赴朝参战是自卫行动,声称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或受骗而为俄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的目标服务”,美国的军事干涉倒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43)。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在中国看起来十分荒谬,却代表着美国领导人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对中国的所做所为不但代表美国利益,同时也能代表中国的长远利益,而中国的民族利益却与苏联利益水火不相容。与杜鲁门这种以中国的恩人自居的态度相对比,麦克阿瑟的大棒政策在中国人民看来更能暴露帝国主义本性。周恩来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44)

美国不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另一思想根源,是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45)麦克阿瑟就说过,“东方人的心理特点是尊敬并服从敢说敢干的、坚定有力的领导”(46),即美国的高压。带着种族优越感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可能有正确认识。他们惯于从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冲击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把中国的任何社会进步都归功于西方影响。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在中国的特权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只能把这种民族觉醒归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费正清所说:“一场民族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47)

不论是美国政治中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不承认激烈的社会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毛泽东所批判的这种唯心史观支配下,他们对共产党主张的暴力革命抱本能的反感;相对来说,对国民党的政治观及其统治下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容易产生同情。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48)

“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背景下含义可以有天壤之别。在长期遭受贫困、动乱和民族屈辱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共产党所指引的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视苏联为死敌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是“苏联扩张”的代名词。此外,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广泛信仰宗教,这也使关于共产主义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根本威胁的反共宣传具有煽动性。

在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时(例如在对苏关系中),意识形态的考虑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有时是可以区分的。但是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他们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同意识形态总是一致的。他们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政治问题,势必曲解中共的外交意图。谢伟思曾认为:“毛处理对外关系时基本上是不带意识形态的。”(49)但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类似见解从未引起过美国决策者的重视。1949年以后,用前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来说,美国“不是根据中国的行为来断定她富于侵略性,而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国家而相信她富于侵略性”(50)。

五、结 论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 10 年中,新的世界力量格局和占主导地位的两大意识形态将世界政治截然分为两极。势力占极大优势的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冷战,使相对较弱的政治力量在外交舞台上的灵活性十分有限。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四个主角——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联和美国——基本上都将世界政治看成两大阵营阵线分明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纵观十年,有五个历史事实对后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美国在 1945—1949 年期间偏袒国民党,招致了自己在华利益的重大损失,并在客观上促成中苏结盟,而中苏联盟反过来又加深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在这一阶段,中美民族利益的冲突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对抗和美苏在亚洲的对峙突然发展为中美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美国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和控制台湾海峡的决策时,战略动机起了主要作用。第三,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美国国内的政治空气毒化了美国对华政策,但总的说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主要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第四,50 年代初,美国将其遏制政策推广到全球范围,主要手段是结成反共联盟、对外援助和倚重武力。它在新中国周围建起了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包围圈。第五,50 年代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对峙与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有连带关系,但并非二者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对华政策陷入长期困境,就是因为纠缠在包含各种复杂因素的棘手的台湾问题上。

经过 10 年演变,1955 年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到五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从相对意义上讲处于顶峰状态;(二)美苏冷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四)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犹存;(五)中国在政治和领土上未能达到完全统一。此外,中美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文化交流,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观念形态没有改变,也起重要的制约作用。上述因素中前四个因素的逐渐演变,加上中国实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认真探讨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伏发展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并使之建立在相互理解、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

注释:

(1) 弗兰兹·舍曼(Franz Schurmann):《世界权力的逻辑》(*The Logic of World Power*),潘特恩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66 页。

(2) 入江昭(Akira Iriye):“亚洲存在过冷战吗?”(“Was there a Cold War in East Asia?”),见约翰·查伊(John Chay)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问题和前景》(*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西方观点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4 页。

(3) 转引自哈罗德·欣顿(Harold C. Hinton):《三个半强国》(*Three and a Half Powers*),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2 页。

(4)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1 页。

(5) 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见《中国问题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11 页。

(6)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文件集》),1948 年第 8 卷,第 45 页。

(7) 《文件集》,1947 年第 7 卷,第 287 页。

(8) 转引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编《1949 年和 1950 年的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和解与承认问题》(*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 in 1949 and 1950: the Question of Rapprochement and Recognition*),1973 年版,第 5 页。

- (9) 《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05—306页。
- (10) 多罗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主编《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 (11) 入江昭:“作为历史的当代史:1941年以来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Contemporary History As History: American Expansion into the Pacific Since 1941”),见《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5月号,第202页。
- (12) 南希·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尘埃中的格局: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之争》(*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 (13) 美国《国务院简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24卷,1951年版,第484页。
- (14) 拉塞尔·布海特(Russell D. Buhite):《1945—1954年亚洲的美苏关系》(*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 (15)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受命变革:1953—1956年》(*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达布迪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340页。
- (16) 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J. Barnet):《干涉与革命》(*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帕拉丁出版社1968年版,第195页。
- (17) 同注(15)。
- (18) 转引自《中国:1945年以来的美国政策》(*China: U.S. Policy Since 1945*),1979年国会季刊,第101页。
- (19) 同上,第104页。
- (20) 转引自爱德蒙德·克拉布(O. Edmund Clubb):“1950—1955年美国政策中的福摩萨和沿海岛屿”(“Formosa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American Policy, 1950—1955”),见《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4期,1959年12月出版,第520页。
- (21) 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1922—1972年的世界与中国》(*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艾里米休恩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 (22) 转引自约翰·加蒂斯(John Lewis Gaddis):《遏制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罗伯逊认为中苏没有出现意见分歧的可能,见塞·利·苏兹贝格:《七大洲风云四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 (23) 哈里·杜鲁门:《回忆录》(*Memoirs*),达布迪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2卷,第403页。
- (24) 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M. Blum):《划分界线:美国在东亚遏制政策的起源》(*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诺顿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1—52页。
- (25) 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中国跨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页。
- (26)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 (27) 亚利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41页。
- (28) 邹谠(Tang Tsou):《1941—1950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89页。
- (29) 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Blum)《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麦格罗-霍尔出版社1966年版,第113页。
- (30) 见资中筠:“历史的考验”,《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

- (31) 艾森豪威尔致魏德迈,1955年2月28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中央档案第28箱。
- (32)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1984年第24期,第23页。
- (33) 沃伦·科恩:“1945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5”),见科恩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领域》(*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 (34) 转引自路易斯·普里弗伊(Lewis McCarroll Purifoy):《杜鲁门的对华政策:1947—1951年的麦卡锡主义和狂热的外交》(*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1947—1951*),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版,第172页。
- (35) 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历史和回忆》(*History and Memory*),诺顿出版公司1965年版,第230页。
- (36) 转引自约翰·斯帕尼尔(John W. Spanier):《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诺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230页。
- (37) 转引自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内史》(*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约发诺维奇出版社1967年版,第289页。
- (38) 邹谠:《关于金门的纷争》(*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犹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1959年版,第26页;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1949—1969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托马斯·克罗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57—158页。
- (39) 转引自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1894—1954年》(*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 1894—1954*),哈帕-罗出版社1963年版,第271页。
- (40) 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1972年2月7日的发言。见美国参议院:《今天和昨天的中国与美国——外交委员会听证会》(*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Yesterday --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1972年版,第24页。
- (41) 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评述》(*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约翰·威利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 (42)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15页。
- (43) 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的讲话,见《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杜鲁门,1950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50*),1961年出版,第724—725页。
- (4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 (45) 美国学者对此的认识,参见威廉·斯图伊克(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通向对抗之路: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 (46) 转引自约翰·斯帕尼尔(John W. Spanier):《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诺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74页。
- (47) 费正清的序言,见詹姆斯·汤姆森、彼德·斯坦利和约翰·皮雷(James C. Thomson, Jr., Peter W. Stanley and John Curtis Perry):《感情丰富的帝国主义者:美国在东亚的经历》(*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哈帕-罗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 (48) 罗伯特·阿特:“美国外交政策”(Robert J. Art, “America's Foreign Policy”),见洛伊·马克利迪斯主编《世界政治中的外交政策》(Roy C. Marcrdi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23页。
- (49) 约翰·谢伟思(John S. Service):《亚美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版,第183页。

(50) 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权力的傲慢》(*Arrogance of Power*),兰德姆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评八十年代美苏关系的发展

张也白

二次大战以来,美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战后至60年代末是“冷战”时期。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缓和”时期。80年代,美苏关系出现激烈的对抗局面。在美国,人们称之为“第二次冷战”或“新的冷战”时期。

80年代美苏重新激烈对抗并非偶然。实际上,早在70年代中期,美苏“缓和”即开始走下坡路。苏联乘越战后美国力量衰落和实行全球收缩之机,一面加速发展军事力量,一面加紧在第三世界扩张,从而侵犯美国的切身利益。应当说,在“缓和”年代,美苏关系即已包含了合作与对抗两方面。70年代后期,苏联对外扩张变本加厉,美苏对抗的一面进一步发展起来。到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进入激烈对抗时期。

80年代以来,美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1980年至1984年间,是美苏关系激烈对抗和僵冷的阶段。

针对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美国提出“卡特主义”,重新实行对苏遏制,并开始大幅度增加军费,大力加强军事力量。与此同时,卡特政府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行制裁,包括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停止对苏粮食出口,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美苏关系由此发生重大转折,70年代的“缓和”宣告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对抗与冲突重占支配地位的新阶段。

里根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首先大力振兴经济。几年来,美国缩小了常规军事力量同苏联的差距。里根政府坚持在西欧如期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在战略武器竞赛方面,加快了步伐,不仅生产MX导弹,还大力发展空间武器,执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第一任内,美苏对抗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浓厚起来,双方言词战升级,冷战气氛加剧。苏联针对美国的政策采取以硬对硬,拒绝作任何松动与让步。8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深刻的领导危机。领导人的频繁更迭使两国关系更加捉摸不定。这一时期,双方迫于内外压力,也曾作过愿意改善关系的表示。但由于发生了像苏联击落南朝鲜客机,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等突发事件,使得某些改善关系的势头刚一萌芽即难以继续。北约在西欧如期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使两国关系更为冷淡。苏联为此于1983年11月中断了同美国的武器谈判。至1984年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两国关系几乎降到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美苏间的激烈对抗与日趋僵冷使国际形势蒙上一层阴影,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忧虑。

从里根第二任期始,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起,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既对抗又对话的新阶段。

1984年9月,里根在他第一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同葛罗米柯的会晤,曾使美苏关系出现一丝缓和的迹象。尽管这次会晤带有为里根竞选连任服务的色彩,但仍然表明美国正开始调整对苏政策,同时说明苏联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在里根连任的形势趋于明朗之时,至1984年底,两国关系出现新的转机。双方决定重开武器谈判,从而给紧张不安的世界舆论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1985年3月,美苏恢复了日内瓦武器谈判,5月,两国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到11月实现了两国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尽管在裁军问题上未达成任何协议,但确使僵冷了多年的美苏关系有所缓解。双方确定两国首脑将继续互访,同时两国间的各种谈判将制度化地进行。此外,两国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也有所解冻。去年,两国关系虽曾几度陷于紧张,但双方保持了对话的势头,并再次实现了首脑会晤。看来,美苏对话的进程将继续下去。

美苏关系这种新的变化自然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主要原因是双方均有某种缓和两国关系的需要。

从美国方面看,四年来美苏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使美国在对苏谈判中处于优势。但是,美国经济在连续几年的增长后又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军费难以维持大幅度增长的势头。在这方面,国会的掣肘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谋求缓和美苏关系以减轻军备负担。美国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迫于盟国的压力。里根第一任内由于对谈判消极,曾使美欧关系紧张。因此,美国把同苏联谈判,当作应付盟国的批评、维护北约团结的必要手段。里根属共和党右翼,但是几年的实践使他的外交政策开始趋于现实与灵活。在处理对苏关系时,逐步向温和路线靠拢。

从苏联方面看,在勃列日涅夫晚年苏联开始进入一个困难时期。经济增长呈放慢趋势。领导人年龄老化又使苏联面临政治危机。国际上,美国加强抗苏实力使苏联对外扩张受挫。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沉重包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境地。80年代,苏联面临新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面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世界新的科技革命以及中国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等几方面的挑战。这一切使苏联迫切感到需要改革。实际上,在安德罗波夫时代,苏联即有此种要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加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他把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国内,加速经济发展,着手进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在对美政策上作了相应的调整,改变了以往过于僵硬刻板的做法,增加了灵活性。

当然,两国关系的缓解是有限度的。无论在军备控制还是在地区争夺上,双方仍然激烈地对抗。两国间由来已久的相互不信任与敌对情绪,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关系又不得不经常受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去年发生的美苏间谍战,曾使两国关系一度陷于紧张,险些坏了首脑会晤的大事。总之,里根政府虽调整了它的对苏政策,但并未改变其对苏强硬立场,其基本方针仍然是从各方面对苏联保持“高压”,以便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戈尔巴乔夫确有缓和苏美关系的愿望,其外交政策也较前现实与灵活,但并未放弃同美国争霸的战略目标,也不愿以牺牲其既得利益为代价。两国间的对抗仍在继续。但同前几年的僵冷与一味对抗形势相比,确有变化,可以说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既对抗又对话的新阶段。

80年代美苏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一些不同于70年代的特点。

首先,80年代美苏力量对比的趋势转向有利于美国。

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发展较快,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缩小。进入70年代后半期,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是它的军事力量仍不断发展。苏联历来的做法是不论经济上有多大困难,也要竭尽全力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70年代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比以往相对衰落,苏联力量相对上升。力量对比的趋势对美国不利。

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和大幅度扩军,使其实力得到恢复。而苏联则终因经济困难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力量对比趋势开始有利于美国。众所周知,苏联实力的基础主要是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或政治力量。苏联经济影响极为有限。它在对外贸易、技术转让、对外投资

资、对外经济援助等方面的实力,同美国相去甚远。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即便“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国家,也日益倾向于探索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因此,美苏以综合国力同70年代相比,苏联肯定是衰落了。

当然,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苏两国在60年代后期形成的力量均势已被打破。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但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总的形势仍然是均势。

其次,80年代美苏争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从70年代的战略守势转向80年代的战略攻势,采取主动进逼的姿态,而苏联则被迫收敛其扩张行径,处于某种被动防御的地位。

8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遇到了战后不可多得的“好年景”。里根实行了重建美国军事实力的方针。由于越战与水门事件“后遗症”基本消除,公众舆论的主流已从要求收缩美国海外力量转为“支持承担”新的“国际义务”。形势有利于里根推行对苏强硬路线。美国在同苏争夺中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里根主义”的提出。“里根主义”突破了美国传统的“遏制”观念。它不仅要求遏制苏联的扩张,而且要“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推回其本土”。与以往的遏制政策相比,“里根主义”具有明显的进攻性。

苏联在进入80年代之际,开始感到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已明显落后。为继续同美国争夺,它急需一段喘息时间。近年来,苏联的注意力已更多转向国内。其战略思想已从夺取军事优势转变为保住军事均势。在全球战略上改变了咄咄逼人的姿态,采取有限度的收缩政策,尽力保住70年代扩张的地盘。值得玩味的是:过去,美国支持的政府,常常遭到苏联支持的游击队的挑战。而今,情况正在改变,美国支持的游击队正向苏联支持的政府发出挑战。

但是,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不能概括为“美攻苏守”。80年代的战略态势,确具有美国比以往更多地主动进逼和苏联略有收敛的特点,但总的态势仍然是互有攻守,美国比70年代是强硬了,但仍有限度。例如,“里根主义”的实施就是有困难的。苏联也并非软弱,而是有限收缩,柔中有刚。苏联不会在美苏争夺中牺牲它的根本利益。

第三,80年代美苏争夺的范围更广,层次更复杂,双方都着眼于更长远的目标。

7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夺取军事力量的优势和在第三世界扩大势力范围。这种争夺着重在军事方面。而进入80年代,由于美苏在战略态势上的僵持局面难以改变,因此,美苏争夺必然要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从多种层次争夺优势。其主要标志是双方都在执行“战略防御计划”。这个计划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具有深远的意义。

美国的对苏战略,是要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带动经济科技的发展,使美国的经济、科技与军事更加先进,以谋求对苏联的全面优势。但由于“战略防御计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尚无可能成为现实可行的东西,因此美国的着眼点除了具有在当前抓住苏联的弱点不放、不让它喘息、进而在经济上拖垮苏联的意图外,还具有更为长远的目标,即着眼于同苏联争夺21世纪的优势。

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内外政策均作了调整,以便加速经济发展,同美国较量。苏联积极实现空间武器计划,而且起步比美国早。它竭力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是因为自己的空间技术落后,也是为了掩盖自己搞“星球大战”的用心。

第四,80年代美苏斗争的重点正由欧洲逐步移向亚洲。

目前,欧洲仍然是美苏全球战略的重点,是美苏争夺的主战场。苏联军事力量的2/3在欧洲部分。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以欧洲为重点。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欧洲是美苏两国的最大利益所在。但是,现在美苏在欧洲却处于僵持状态。欧洲的势力范围早已划定,谁也不敢轻易突破。双方在欧洲回旋的余地无几。因此,斗争重点必然要向其他地区转移。

近年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已使它成为当前世界上经济最富于活力的地区。这对超级大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80年代,美国国内人口加速西移,政治与经济重心开

始转向太平洋。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表现出格外重视亚洲的倾向。共和党右翼的传统是历来重视亚洲。里根提出的“美国未来在于太平洋”的口号,同70年代“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尼克松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也是美国决心重返亚洲的信号。80年代,苏联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日增。目前苏联在经济上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政治上的地位也无法同美国相比。但是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却有了迅速增长,目前大体上已同美国处于均势。去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正在进一步调整它的亚洲战略,打算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说,美苏两国的注意力已日益移向亚洲,从而使亚洲成为两国新的争夺场所。

第五,80年代制止战争的力量进一步增长,美苏对抗不得受制于更多的因素,和平的前景比过去更为良好。

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充满着各种矛盾与对抗,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美苏间在战后长期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有时几乎走到爆发核战争的边缘。然而,战后40多年里,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因为,美苏两国在战后多数时期处于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尤其是双方核武器发展所形成的“恐怖平衡”,使任何一方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战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又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进入80年代,制止战争的因素又有进一步增长。西欧独立倾向继续发展。它除了要求美苏认真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外,还对美国的许多政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东欧国家改革倾向的发展,使它们进一步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东西欧之间要求发展相互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成为美苏冲突的重大障碍。中国因执行现代化方针而日益强大。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它进一步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发展民族经济、维护独立主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使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的争夺处境艰难。形势的发展,使世界人民比过去更有希望获得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

但是,当我们看到和平的良好前景时,不应忽视其脆弱性。最有资格打大仗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仍然武装对峙,激烈争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

在80年代最后三年以及更远,美苏关系将走向何处?

一般估计,美苏力量对比将继续有利于美国。苏共二十七次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注意力已集中于振兴经济,但要恢复70年代中期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似无可能。苏联的改革,因官僚制度层层束缚,阻力很大。经济改革又必须辅以政治改革。在这方面,苏联不会走得太远。而美国凭借其科技优势,通过执行“战略防御计划”,有可能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巩固当前力量对比中的有利形势。但是,美苏力量对比总的均势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双方在军事上的均势难以打破。尽管苏联面临种种困难,对其经济活力仍不可低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雄心勃勃,改组了领导层,并着手制订一套新的方针政策。因此不能排除苏联经济出现某种新的增长势头。而美国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仍无法避免,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今后美苏力量对比将大体持平,略有利于美国。双方实力基本上将同步增长。苏联也在搞“战略防御计划”。它不会听任美国夺取军事优势,哪怕勒紧裤带也要在军事上保持同美国平起平坐。

在战略态势上,今后仍将是双方互有攻守的趋势。美国提出“里根主义”,急于在地区争夺中取得重大进展,但“里根主义”目标庞大,实施手段有限,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加之苏联又决不会相让,即使实行有限度收缩,至少也要保住既得地盘。双方在第三世界仍将你争我夺,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但估计美国的攻势可能会多些,处境稍主动;苏联的守势多些,处境较被动。看来,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美国对苏联保持“高压”,逼苏让步的形势。尽管如此,由于美苏两家均有困难,双方的攻势都将是有限度的,谁也不可能发动全面持续的攻势,取得重大进展。

随着美苏争夺重点日益移向亚洲,今后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对抗,将相对地较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苏联亚洲政策已作重大调整,其核心是以加强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活动来配合其军事力量,通过改善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向美国发动“迂回进攻”,改善它在亚太地区的处境,增强它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苏联亚洲政策的调整,对美苏在亚太地区的对抗形势可能产生新的影响。今后,美苏在亚太地区对抗的主要方式将是在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同时,加强政治、经济、外交策略的综合运用。美国仅仅从军事上遏制苏联将难以取得成效。但是,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对立,并不处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状态。亚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仍可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当前,世界形势总的趋势是和平因素的不断增长和大国间紧张关系逐步缓和。今后美苏关系将继续保持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美苏双方仍然都有缓和的需要。苏联国内任务繁重,经济面临的困难非短期所能解决。估计苏联需要一个10至15年的喘息时间,以便到21世纪再同美国较量。因此,苏联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注重实际,在对美关系中可能持更为灵活的态度,作较多的让步。美国虽处于有利地位,但目前经济增长放慢,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军费不可能如80年代前期那样大幅度增加。“星球大战”计划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不久前披露的美国与伊朗武器交易丑闻,可能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实施带来消极影响。1988年又是大选年,加上盟国的压力以及里根本人的政治利益,都要求美国缓和它同苏联的关系。去年,美苏首脑冰岛会晤虽告破裂,但两国在中程导弹和战略武器上的立场有所接近,且双方均留有余地,并未关死继续会晤的大门。美苏对话的进程将继续下去。估计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有可能在军备控制上达成某些协议。但美苏缓和仍将是有限度的。武器谈判仍然是长期讨价还价之势。美苏双方都不准备作出单方面的重大让步,以免牺牲各自的安全利益。即使达成某些协议,也无法从根本上缓和军备竞赛,更不可能回到70年代的“缓和”。此外,两国关系的缓解,又会不时受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总之,美苏对抗将继续下去。紧张和对抗将继续是两国关系的主导方面。双方仍将激烈地争夺,但在手法与策略上都会较前灵活,以取得主动。两国关系将时紧时松。双方将在对抗中求对话,在紧张中求松动。

美苏在战略武器上的斗争

吴 展

一、核武器的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把两颗小小的原子弹投到日本,使广岛和长崎的40万人口死伤近半。40余年来,这种武器给世界造成了深远复杂的巨大影响。人们认识了它的厉害,奔走呼吁,提出种种建议,竭力避免灾难的重演。甚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在为控制核武器而往复谈判。但是这一切努力,迄今未能消除它对人类文明和生存的威胁。人们无法抛弃核爆炸知识,不能学《天方夜谭》中渔夫的样子,把放出瓶子的妖魔再哄骗进瓶子里去。

战后,美苏关系成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其中问题之一就是核武器。美国有了原子弹,苏联不甘落后,果然到1949年也成功了。几年后,双方都造出了威力更大的氢弹,即热核武

器。从此，你追我赶，形成了核竞赛。英、法和中国随后也掌握了核武器，不过他们的家伙比起美苏来，终究是小巫见大巫。

投在日本的原子弹的核当量（1）仅一两万吨，氢弹则有几十万到几百万吨，最大的曾达到几千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消耗的炸药，总共不到 600 万吨！目前美苏各有大小核弹（炸弹和弹头等）2.5 万至 2.8 万个，总计核当量各约为七八十亿吨。（2）

一个百万吨级的氢弹在大城市上爆炸，可立即使数十万人伤亡，并将数千吨放射性碎屑和灰尘抛上天空，再落回地面，使 2000 多平方公里土地遭放射性污染，危及生命。如一国的多数城市受到核攻击，则它们难以相互支援，幸存的人又将面临饥饿和疾病。结果慢慢死去的人数，将比当场炸死的人多得多。

最近还出现一种“核冬天”的理论。美苏若共爆炸 50 亿吨当量的核弹，其所掀起的尘埃和烟雾中的大量细小粒子，上升高空，漂浮全球，阻隔阳光，使地面温度下降 30℃—50℃。降温可持续半年至一年，产生世界生态危机，使生物多数死亡，粮食绝收，甚至人类面临灭绝。有人说，实际降温仅 10℃—20℃，只能算“核秋天”。然而即使如此，全世界也会因而出现粮食大减产。

威力如此之大的核武器起着不一般的作用。它既威胁和平，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和平，因为美苏都畏惧核战争后果而不敢动手。它似乎能保障一国的安全，却引起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因为谁都无法免遭核战争的摧毁。它样子吓人，但又常常吓不住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武器是不可轻易使用的。

二、战略进攻武器

战略武器有进攻的，也有防御的。战略进攻武器有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中的潜射弹道导弹（3），都是远程的核武器，其作用是打击敌大后方，摧毁战争潜力。用于战场近距作战的战术进攻武器，有的也是核武器，本文不赘述。

战略轰炸机航程可达 1 万公里，不过速度慢，需飞 10 小时。它们最近装备了巡航导弹（4），可在防空火力之外实施攻击。将来还有贴地面飞行的飞机和雷达难以察觉的隐身飞机。洲际弹道导弹的速度很快，半小时可飞 1 万公里。这种武器都藏匿在坚固的地下井中，以保安全。现在，美苏都采用了多弹头分导技术，分别击中不同目标的弹头，偏差仅 200—300 米。由于地下井已不保险，两国又在研制公路或铁路机动型导弹。部署在核潜艇中的潜射弹道导弹利于隐蔽，但命中精度不高。经努力，美国的潜射导弹精度已接近打击地下井的要求。苏联则进展较慢。

50 至 60 年代，两国的战略武器曾不断增多，但以后竞赛重点转向质量，数量变化不大。如以弹头计，则数量显著增加，但总核当量也大为减少。随着命中精度提高，大当量弹头已无必要了。

前述核弹数是总数，如只计算战略进攻武器，则每方只有 1 万至 1.2 万个。打核大战需要多少核弹？美苏都有值得攻击的目标三四千处，包括 1000 多个导弹地下井，数百座城市，以及大量工厂、油田、水坝、电站、桥梁、交通枢纽等。如对每个目标打一个核弹，不过用去总量的几分之一，已足够基本毁灭美国或苏联了。说现有核武器能毁灭世界数十次，未免夸大，但说能消灭美苏各几次，则非无稽之谈。人们把核武器超过需要的情况称为“超杀”。

表一：美苏的战略进攻武器和中程导弹

	战略轰炸机		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		中程导弹	
	架数	核弹数	导弹数	弹头数	导弹数	弹头数	导弹数	弹头数
美国	341	4000	1020	2200	648	5800	320	320
苏联	450	2000	1398	6800	960	2400	541	1423

注：核弹数非常粗略，中程导弹数包括 100 枚待拆除的老式导弹。

表二： 美苏核武器当量的分布(亿吨)

核武器	美 国		苏 联	
	国别			
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		15.2	43.3	
洲际弹道导弹			12.2	36.2 (重型占 31.8)
战略轰炸机		26.5	17.5	
中程和战术导弹、核炮弹、 一般核炸弹等		23.7	19.2	
总计		65.4	80.0	

表二绘出了美苏两国核当量的大致分布。从中可以看出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当量占总当量的 45%，占战略进攻武器当量的 60%，而这种导弹的近九成又是重型的多弹头导弹。所以它们是苏联的王牌，使美国相当畏惧。反过来苏联也害怕美国的战略进攻武器，因为其质量和命中精度是苏联一时望尘莫及的。

三、战略防御武器

自古以来，有攻就有防。战略防御武器是战略进攻武器的对立面，不过前者将是常规的，而非核武器（5）。

战后初期的战略防御主要是对付轰炸机。美国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建立了庞大的防空体系，包括大量警戒雷达、歼击机、防空导弹和几套半自动防空指挥系统，共花费了 10 年时间和数百亿美元，后来却觉得用处不大，因为它对付不了弹道导弹，反而易遭它们的攻击。露在地面的雷达和半自动防空指挥系统如被摧毁，全部防空体系即将瘫痪。另一方面，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力量较弱，不值得大力对付。因此，从 50 年代后期起，美国对防空体系的兴趣逐渐低落，其经费也不断下降，最后停滞在一个低水平上。

苏联同美国相反，对防空的兴趣一直很浓厚，自 50 年代起逐年增加防空投资。现在苏联已建立起庞大的防空系统。为突破苏联的防空，美国部署了洲际弹道导弹、空地导弹、电子干扰技术等。到 1965 年，美国认为苏联的防空已不足虑，于是把突防的投资大大减少。进入 80 年代后，美国感到有必要再次作出努力，来对付加强了苏联防空，于是开始部署巡航导弹和新型轰炸机，使突防的投资又急剧上升。

战略防御的第二件事是对付弹道导弹。美苏从 50 年代末起即研究反导弹武器。他们用了 10 多年工夫，才初步解决从地面发射拦截导弹击毁来袭弹头的问题。美国于 70 年代初建立起一个保卫洲际导弹发射场的反导弹系统。苏联也建立了一个保卫首都莫斯科的反导弹系统。但是，反导弹仍未过关，因为新出现了许多突防措施。例如：来袭导弹能够释放多个弹头和大量假目标，使雷达难于应付，此外暴露于地面的雷达也易遭弹头攻击。因此，美国旋即把那个系统拆除，但苏联却保留莫斯科反导弹系统至今。

然而双方并未停步。美国继续研究了 10 年，获得较大进展。除了改善从地面发射拦截导弹的终端防御外，美国还研究了空间反导弹技术，即在空间部署许多武器站，装载激光、粒子束、电磁轨道炮、拦截导弹等武器，组成两三层防线，并利用卫星提供的信息，攻击袭来弹头。其优点在于能够在敌导弹一从大气层下冒出来即进行拦截（这时弹头和假目标还未被释放，是最有利的时机），并能绕开雷达的某些难题。里根总统于 1986 年 3 月发表演说，号召进行反导弹新技术的研究，并称之为“战略防御倡议”，即 SDI。所谓“星球大战”，指其中的空间武器（6）。SDI 现处于研究阶段，着重研究单项技术，还不能组成有效的武器系统。美国打算到 1990 年完成可行性研究。终端防御是老技术的发展，比较成熟，故有可能在本世纪部署。

然而,空间反导弹武器却有大量技术难题,除了从空间发射拦截导弹有点可能外,其他绝非本世纪内能够解决的。所以其部署恐怕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地面反导弹系统虽能较早实现,不过它作用不大,美国未必会部署。

苏联则不但对其莫斯科反导弹系统不断改进,也研究了空间武器,其路数同美国相似。

反导弹技术虽还不成熟,但它包含多种尖端技术,大都能用于其他领域。例如,高级计算机、集成电路、红外线、激光、精密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和新型材料,既能用于改进常规武器,也可以推广到民用。虽然转入民用不如直接投资于民用,但一资多用还是有益的。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家一般不愿向风险大的技术投资,故政府投资于军用技术,再转民用,很受企业界欢迎。英国、西德、日本等参加美国的SDI的原因即在于此。不参加怕技术落后。苏联则得不到这种好处,因为它的制度不利于军用转民用。

空间反导弹武器虽是防御性的非核武器,但其部署使空间军事化,破坏了和平利用外空的国际准则,必将使军备竞赛升级,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因而在全世界遭到了怀疑和反对。

四、攻与防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个讲矛与盾哪个更厉害的故事,其结论是差不多。但是就核武器来讲,攻远比防占优势,因为核武器的威力太大,而防永远达不到百分之百,只要漏进一两个核弹,一座大城市就要遭殃。若要保卫地下井中的导弹,倒是有一定效果,因为只要部分地下井未被破坏,就可进行反击,使对方承受不了。所以反导弹保卫城市不行,但可以增大战略进攻武器的生存能力。

(一)核威慑

二次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战略都是核威慑,就是以核威力来慑服对方。因此双方都尽力夺取核优势,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核武器竞赛。其结果是美苏间的长期核均势。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不敢发动核战争,因为打起来必然同归于尽。40余年来,世界大战始终未发生,核威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核武器并非影响战争的唯一因素,人心向背、经济利害、国际关系、备战情况等都起一定作用。战后初期,美国独家掌握核武器,执行着“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却未发动核战争,就是证明。

60年代,苏联的核武器数量逐渐赶上美国,于是美国把核战略改为“相互确保摧毁”。其大意是,你如发动核战争,必先打我核武器,以防报复(第一次打击);而我核武器剩下的数量仍足以给你的城市造成无法忍受的损失(第二次打击),你就不敢进攻。

由于双方核武器达到了“超杀”能力,核战争越来越没法打了。但军方总是要考虑打的,于是美国又在“相互确保摧毁”中引入了“灵活反应”的概念。就是把核战争分成若干级。最低一级仅打击对方的核力量的一部分,然后根据情况升级,直至最高一级——全面核打击。如果对方在某一级认输了,就不必再升级。就是说如果威慑无效,就逐步实施核打击,目的是尽量避免全面核战争,但要让对方明白,在生死存亡关头,美国不惜打核战争,因此对方不能为所欲为。这种做法是不可靠的,因为一旦开始,就很难刹车。

用核威慑来保障和平与安全,虽有一定的效果,却只获得了“恐怖的和平”,人类仍然生活在毁灭的威胁之中。这种和平是不稳定的,核战争仍然有可能发生。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反导弹的战略防御。不幸的是,这种防御一直是失败的,而且近期内成功的希望也甚渺茫。

上面讲过,反导弹系统能对洲际弹道导弹起某种保卫作用,因而有助于加强核威慑能力,但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是有疑问的。就在里根发表“星球大战”演说的同一年,他委派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领导一个包括一些最优秀专家的委员会,来研究美国战略力量的现代化问题,其中涉及地下井是否易受打击的问题。委员会的结论是,轰炸机、导弹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仍然安全,因为三种武器的条件各有不同,不会在同一瞬间受到打击。如一种武器受打击,另两种可以反击,所以不存在易受打击的问题。既然如此,美国又何必大破费来专门保护洲际弹道导弹呢?恐怕 SDI 只有用来保卫城市和资源,才有价值。

(二) SDI 是攻击地面的武器吗?

任何武器都有攻防两面。即使一块盾牌也可用来砸对手的脑袋。空间武器的主要用途是打来袭弹头。乍看起来,它处于制高点,似乎可以攻击地面,甚至于能控制全球的战场。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核弹头在外层空间飞行,无空气阻隔,而且本身也脆弱易毁。即使这样,目前空间武器的能量和其他技术性能仍达不到摧毁弹头的要求。

空间武器攻击地面时,受大气的影响很大,因此难于实现预期的目的。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统称射束武器。就激光武器来说,即使天气晴朗,光束也将衰减和偏移。如遇云雾,激光就透不过去。粒子束武器的粒子若带电,则会因同性电相斥而扩散;若不带电就会在碰撞空气分子后立即带电,并迅速扩散。结果,激光和粒子束通过大气后,其破坏能量都大为降低;同时,地面目标多半比弹头坚固,故所需破坏能量必须提高。一减一增,就使用于打弹头的武器打不了地面。要打地面,就得增加能量,从而提高成本。

另一类空间武器是动能武器,包括电磁轨道炮发射的弹丸和空间发射的拦截导弹。它们依靠本身带有的红外线跟踪器,寻觅导弹及弹头的热源,以命中目标。然而在进入大气层后,它们必然因与大气摩擦而在表皮产生高温,无法寻觅外部热源。同时由于受空气动力影响,它们的弹道也必然有较大变化,从而使命中偏差显著增大。所以这种办法也不可行。

上述武器攻击地面的结果,不过是在目标上打个洞,最多引起火灾,比起核武器来,威力差远了。核武器不需直接命中,而且摧毁面积很大。把核武器部署在空间虽然效果好,但比战略进攻武器并无优点,况且身居明处,极易遭到攻击,人们何必花费巨款去舍近求远呢?有人争论说,让 SDI 起双重作用总可以吧!问题是,攻击地面必须增加 SDI 的投资,其结果充其量只能起攻击地面的辅助作用。同时,空间站装载的燃料和弹药有限,把它们消耗在地面上,SDI 就无法承担反导弹的任务了。总之,用 SDI 打击地面不是一个好主意。

(三) 苏联对 SDI 的反应

苏联对美国的 SDI 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虽然也在研究空间武器,而且在用卫星反卫星的系统上已获得初步成果,却极不愿在“星球大战”方面争夺优势。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只及美国的一半弱,要部署同美国一样多的战略武器,其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必然比美国高一倍,况且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所以苏联在这场竞赛中倍感吃力。现在,苏联的经济情况不妙,生产增长率逐年下降。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甚至同美国争个平手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取胜呢?因此他们近期的工作重点是尽快改善经济状况,而军备竞赛,特别是最费钱的空间武器,就成了肩膀上的沉重负担,必须尽快减轻。

美国也同意裁减战略进攻武器,并且特别希望减少苏联的重型多弹头导弹,但是坚持不肯停止对 SDI 的研究。因为美国想利用对手的弱点,使他在大炮和黄油的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针对美国的态度,苏联扬言要采取对策。就是在战略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作出反应。在战略进攻武器上,他们能做什么呢?无非是增加数量和改进质量。增加数量是最笨的,但补偿被击毁的核弹头,从而保持原有的进攻力,也是最吓唬人的办法。

按 SDI 的设计,要部署三层拦截线,其中每一层能击毁来袭弹头的 90%,三层总共能消灭 99.9%。如果是这样,苏联就必须把弹头增加 1000 倍,才能保持进攻力。这当然是办不到的,而美国恐怕也一时难以实现那样高的拦截效率。如果把效率降低到每层 50%,那么弹头打了三次对折后,剩下 12.5%。应当说,经过努力,这样的效率是做得到的。若还做不到,美国恐怕就不会部署。但是苏联要保持进攻力的话,就必须把弹头数增至现有数的八倍,这自然也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单纯依靠拚数量的对策是不可取的。大量增加核武器不仅在经济上难

于负担,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苏联大概不会出此一下策。

美国提出过一种理论,说反导弹必然促使对方增加导弹的数量,不限制反导弹就无法限制导弹,并说服苏联接受它,作为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根据。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在美国拆除了已建成的反导弹系统后,苏联仍保留其莫斯科反导弹系统,并不断加以改进。对此,美国并未增加其导弹数量,哪怕尚未达到双方协议的限额。轰炸机的情况也类似。尽管苏联不断增强其防空系统,美国并不用增加飞机数目的方法,而主要依靠改善进攻武器的突防能力,来抵销苏联的防御。

现在我们已转到第二种对策,即改进质量,或加强突防能力。对策可能有这样一些:缩短发动机工作时间,以减少弹头释放前遭拦截的可能性;使导弹和弹头自身旋转,从而激光不能持续射在一点;外覆涂层,降低激光等的杀伤力;研制迷惑雷达及光学或红外线探测器的假目标;在空间部署太空雷,以击毁SDI武器站,等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反卫星武器来直接攻击“星球大战”系统。由于空间武器站常年处于明处,所以比地下井或导弹潜艇更易遭到攻击。这也可以算得突防措施之一,因为只要部分空间武器站被消灭,进攻导弹就能够乘虚而入了。

改善进攻导弹的质量,提高突防能力,看来是对付SDI的最有效、最合算的措施。尽管美国也会采取反措施,使苏联的措施不能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苏联大概会以走这条路为主。我们不能排除苏联增加进攻导弹数量的可能性,但即使增加也不会很多。

苏联在防御方面会怎样反应呢?美国只有在SDI达到较高效能(包括对付苏联的突防)后才会部署。但一旦部署,苏联若仅满足于改善进攻能力,而不搞防御系统,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随时可不受阻地发动核攻击,而苏联的反击却必遭SDI火力的拦截。美国既能攻又能守,而苏联则只能攻不能守。所以,只要美国坚持SDI,苏联就不得不在防御系统上奉陪。不这样做,苏联必将处于劣势。这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不能学美国不重视防空系统的样,不去建设反导弹系统。导弹威胁对苏联来说,并非次要问题。虽然他们曾宣传要用突防措施来对付SDI,其费用比SDI低几倍,但笔者不相信他们会因此放弃反导弹系统。不然,又何必对SDI感到那样紧张?

五、战略武器谈判

1972年美苏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冻结战略导弹数量的临时协议和限制反导弹条约;1979年又签订了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规定了这种武器的总限量、多弹头导弹加巡航导弹轰炸机限量、重型多弹头导弹限量。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国会未核准这项条约,但双方事实上予以遵守。(7)以上仅是冻结实有数量。后来谈到裁减,就困难重重。其症结是,美国要求大量裁减重型多弹头导弹,苏联要求停止SDI,以及中程导弹问题。

去年以来,苏联几次让步,同意把战略进攻武器削减50%,但以停止SDI为条件。美国则坚持SDI,说他现在搞的是研究,而限制反导弹条约所禁止的是研制、试验和部署,并无矛盾。后来苏联同意在实验室内搞研究,美国却一定要到空间去试验。

中程导弹不是战略武器,但影响谈判。苏联部署了441枚能打欧亚全境的三弹头SS-20导弹,引起西欧恐慌。美国无此武器,英法有一点,但质少量少。因此西欧要求美国代表他们与苏联谈判拆除SS-20,不成就让美国在西欧部署同类导弹。苏联先不同意拆除,后同意减少到与英法中程导弹相等。由于英法反对把他们的武器同美苏武器挂钩,谈判陷于僵局,美国开始部署。苏联一怒之下一度退出全部谈判,后又同意不挂钩,但必须停止SDI。

最近苏联又让步,中程导弹可不以SDI为条件,同意五年内消除欧洲的270枚SS-20,苏联可在亚洲领土上,美国可在本国保留100个中程导弹弹头。这样,尽管西欧对美国撤走中程导弹还有疑虑(因为还怕苏联居优势的近程导弹),美苏在具体条件上尚有争执,但双方在—

定时期内达成中程导弹协议是可能的。

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还有较大的困难。尽管双方都有妥协的愿望,但达成协议并非易事。苏联亟欲减轻军费负担,加速经济建设,并特别想严格限制空间武器这个耗资巨大的项目,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提出一连串引人注目的核裁军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全世界的和平愿望,所以颇令美国被动。但是美国看准了苏联的痛处,非用 SDI 来压对手作最大的让步不可,何况美国军界和企业界也不愿停止这种研究。

尽管 SDI 的部署还不能在近期实现,但对它的研究却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此不可能停下来。美国总统里根目前正被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而且任期所余无几,因此难有重大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美国妥协,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再让下去,恐怕会遭到军方和强硬派的激烈反对,因此回旋余地也不甚大。看来双方未必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六、谈判前景的展望

全面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管核威慑有多大的作用,但只要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仍然大量存在,人类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激烈地争夺全球优势,并为此而进行着核武器竞赛。在他们都有需要的情况下,这种武器是消灭不了的。从历史看,一种武器,只要有人需要,那么除非被更好的武器取代,从来都消灭不了。弓、箭、刀、矛之所以被淘汰,是因为发明了威力更大的枪炮。12世纪时,罗马教皇英诺森认为新发明的弩的杀伤力太强,不人道,因此发布敕令,宣布它“为上帝所厌恶”,并禁止使用。但是教皇的权威制止不了弩的推广。武器不能靠主观愿望来消灭,不过它的数量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多些或少些。

几年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限制与裁减也许能实现。

(一)战略进攻武器削减 50%是可能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方面,美苏双方,特别是苏联,都希望在一定条件下减轻军费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的战略进攻武器都已达到“超杀”水平,都能毁灭对方若干次,就是说多余了,再增加数量,实无益处,若减下一半,也毫不影响毁灭对手的能力。由此看来,裁减就不是不能设想的了。

(二)中程导弹大部分拆除。SS—20 在美苏核对抗中本来作用不大。它只能威胁西欧和亚洲国家,却打不到美国。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对苏联相当不利。美若用此武器攻苏,苏只能用战略进攻武器反击美,而这样做必将引起 美以同样的手段报复,所以决心不容易下。看来,苏联可能会同意以不要中程导弹为上策,反正他还有居优势的常规力量和大量近程核导弹,对付西欧不成问题。这也是西欧国家之所以先要美国同苏联谈判拆除 SS—20,而如真的拆除又不太愿意的原因了。近程导弹可从东欧打击西欧,而西欧及美国驻西欧的同类武器却打不到苏联,其战术轰炸机也难逾越苏联的防空。所谓拆除中程导弹主要是指部署在欧洲的。至于亚洲部分的 SS—20,苏联必然会千方百计保留一些,以便作为一张牌来对日本和中国施加压力。

(三)SDI 的矛盾在于如何解释反导弹条约。研究、研制和试验是发展新武器的三个阶段。研究是弄清新技术的可行性,为此必需进行实验室内的、外场的以至空间的试验。研制是设计和试制武器的原型样机和试验样机。这一过程自然也包含各种实验。第三阶段是试验,即将试制出的武器系统全部运入靶场,进行接近实战的打靶试验。三个阶段互有交叉,但基本上可以区分。反导弹条约虽未禁止研究,却未把试验问题说清楚。

如准许在研究中做某些空间的试验,问题可迎刃而解。研究性试验用的设备一般是借用已有的东西,加点改进,而研制性试验则使用专门设计的新设备。两者的差异不难用现代化核查手段来判明。但是,有些新技术,例如激光,并无现成的东西可用,一上来就得做新的,不过

它们的性能不应接近武器的要求,否则就成为原型样机了。因此可以写出条文来规定新设备的限度。尽管美苏在矛盾中会对条文作不同解释,有些研制性试验会被说成研究性试验,但只要能把全系统试验和部署卡住,基本目的就达到了。

空间武器的确会损害空间的和平利用,但它不太可能在二三十年内部署,并不构成近期的威胁。(8)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新武器技术,除非被证明不可行,必然会无法阻挡地发展下去。苏联并非不想搞空间武器,只是怕卷入花钱极多的竞赛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双方协议在10年左右期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各种研究性试验(包括空间的),而不进入研制阶段,这应当是行得通的。实际上苏联的谈判代表团前任团长卡尔波夫已非正式表示过,研究可不限于在实验室的墙内进行。目前围绕SDI产生的吵吵嚷嚷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舆论哄抬起来的。大家都对SDI的作用和现实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一段时间(也许几年)后,大家可能冷静下来。美国方面会发觉SDI不现实,从而不增加甚至减少投资。苏联方面也会因亟欲降低军费,而进一步妥协。至于地面发射拦截导弹的反导弹系统,则可根据《条约》规定去研制和部署。对此,双方并无争议。

(四)反对核战争的运动,对核裁军起着推动作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核武器和核战争遭到全世界人民几乎一致的反对。人们奋起保卫和平,要求美苏两国率先大量裁减核军备。参加这一运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有千差万别的动机和目的,因此不可能采取协调而有力的行动。然而,他们的斗争毕竟对超级大国施加了巨大的裁军压力。

以上四项推断给核裁军的前景涂上了乐观的色彩,但绝不意味着美苏协议可以一蹴而就。逻辑学中有所谓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上述推断如果都不错,也只能说是具备了一些必要条件。要满足大规模核裁军的充分条件,还必须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一)在美苏拚命争夺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大规模裁减核武器和限制空间武器的具体妥协办法。

(二)缓解美苏各自国内利益集团在核裁军上的矛盾,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的阻力。

(三)协调美苏与各自盟国在裁军问题上的歧见,特别是西欧各国怕美国中程导弹拆除后,出现苏优势战术核武器及常规兵力威胁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花费时间的,所以,即使目前存在着一些有利于核裁军的条件,谈判也不会马上成功。目前双方始终不把事情做绝,总给谈判留有余地。看来,美苏在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达成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协议是有可能的。

达成这种协议当然不意味着核武器会随即退出历史舞台。美苏将来的核武器可能比现在的少得多,但其质量也会强得多。弹头总数也许会增加,但总当量反而会减少。原因之一是命中精度提高后,当量可以降低。原因之二是小弹头的爆炸效率低于大弹头,一个大弹头换成总重量相同的几个小弹头,其总当量随着减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核威慑仍将在核战略中起主要作用,战略防御只能屈居辅助地位。

历史究竟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 指爆炸力相当于多少吨 TNT 而言。

(2) 此处及表一、二中的核弹和核当量数字是依据一些参考书中的数据推算得出的。

(3) 弹道是指导弹发动机熄火后,弹头像炮弹那样,按抛物线飞行。

(4) 巡航导弹依靠弹翼的升力在大气中水平飞行,其射程近3000公里。

(5) 美国已淘汰早期在防空和反导弹系统中用的核武器,苏联可能还有一点。

(6) 空间武器主要用于反导弹,但也可以用于反卫星。苏联在早期曾研究过将核武器部署在空间轨道上,以攻击地面,即部分轨道武器,但这一方案后来被放弃。

(7)最近美国部署第131架巡航导弹轰炸机,超过了上述第2项限量。美国总统里根公开宣布,美国不再遵守《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因为苏联已破坏了这项条约。苏联则矢口否认。

(8)美国防部最近建议,在90年代中先部署地面和空间发射的拦截导弹。由于它们速度慢,在敌导弹释放弹头前的短时间内加以击毁比较困难,在弹头释放后拦截的效率也不高,因此必有不少弹头漏网。看来美国未必会这样做。

自然资源保护与西奥多·罗斯福

顾学稼

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和防止环境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历史上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供人们借鉴、吸取。本文拟对下列三个问题作一些介绍和探讨。

一、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

美国幅员辽阔,在自然资源方面得天独厚。它有广袤肥沃的可耕地;地下矿产蕴藏量之大,种类之多,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水系的许多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既可灌溉农田,又可用于水力发电;17世纪初,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了现今美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在平原、山区和森林中,还有大量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在殖民地时代和建国之初,人们认为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没有珍惜。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在自然资源中,首先遭到破坏的是森林。移民焚烧森林开荒,修建房屋消耗大量木料。19世纪初期,纽约州的农民,以砍伐柴薪出售给城市居民为重要收入来源。有人估计,迟至1849年,美国在取暖、照明、动力等方面所需能源的95%,来自树木。(1)

1850年时,美国人口为2300万。从新英格兰向西到伊利诺伊,沿大西洋海岸一直到南部的大片地区的原始森林,均已被采伐干净,只有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远西部还有原始森林。据估计,1850至1860年间,又有大约3000万英亩森林被开辟为农地。(2)

进入19世纪后半期后,森林的破坏更加严重。汽轮和铁路的发展都使木材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被毁。当时的轮船以木柴为主要燃料。铁路的迅速发展则使许多原来没有人烟的地区的森林,被大量剥伐。铁路本身就消耗大量树木,建造车辆、车站、围篱等都需使用木材,燃料也是木柴。而需要量最大的是枕木。1890年一家杂志载文估计,每年修筑新的铁路线和更换旧枕木,共需枕木7300万根。一位历史学家估计,从70年代后期到19世纪末,铁路消耗了木材年产量的20%—25%。铁路公司本身拥有大面积的林地,并兼营木材公司。(3)

19世纪后期采矿业的巨大发展,以及太平洋沿岸市镇的兴起,使建筑材料、矿井坑木的需要量大增。这就造成了首先是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森林的破坏。60年代后期,该州林木已有1/3被砍伐。到了80年代,内华达山脉的森林开始受到破坏。(4)木材采伐中的浪费现象

颇为惊人。大树被伐倒时往往破碎,能使用的木料通常只占 1/2。

森林火灾也是林木资源被毁的重要原因。20 世纪前后,每年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火灾造成的损失平均为 5000 万美元。(5)

19 世纪末,美国 4/5 的森林已经消失。剩下的森林很大一部分则落到少数大木材公司手中。(6) 林木资源受到的破坏如此之严重,早就引起某些有关人士的注意。1877 年内政部长卡尔·舒尔兹在其年度报告中曾指出,按当时的消费情况,20 年内木材的供应必将大大落后于国内的需要量。从 1880 年开始,森林资源初次作为一个项目列入 10 年一次的国情普查。1889 年舒尔兹再次警告说:“现在头发已经斑白的人都能看到,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湾到普吉特海峡,美国将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森林”。(7)

森林与降雨量、水土保持和农业密切相关。它能涵养水源,减少土壤侵蚀,特别是地形陡峭或暴雨地区。树木发达的根系使林地的吸水能力大大超过农地,使急风暴雨不能接触地面,从而防止土壤侵蚀,减少径流和水灾。19 世纪后半期,森林受到破坏,使水土资源的状况急剧恶化,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纽约州阿迪朗达克山脉森林的消失,破坏了哈得孙河的通航能力,威胁到纽约州的经济繁荣。科罗拉多的大片森林被毁,使水库蓄水量明显减少,影响了农业灌溉用水。

由于森林被毁,每年被河水冲刷掉的土壤达 8 万吨。(8)

美国土壤状况的恶化还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者在竞争中滥用土地,使土壤肥力减退,土质变得贫瘠。尤其严重的是,很大一部分土地,落到了铁路公司、木材公司、矿产公司、土地投机公司、大畜牧场场主等手中。贪婪驱使垄断资本尽情地劫掠各种资源。以森林为例,19 世纪末,美国森林的 80% 在私人手中。三家最大的业主,即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韦尔豪泽木材公司,共拥有 10% 的私有林地。(9)

美国的矿产如煤、金属、石油、天然气等都以极为浪费的方式开采。以石油开采为例,仅 1907 年就浪费掉天然气 4000 亿立方英尺。(10) 矿产与其他资源不同,一旦遭到破坏,即不能再生。

在水力资源方面,许多可以修建水电站的地段都落到了私人公司手中。它们控制了已经建立的水电站的 60%。(11) 这些公司只顾赚钱,毫不考虑怎样防洪和保护自然景观。

美国野生动物资源遭到的破坏是令人震惊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北美野牛。这种动物的足迹曾遍及北美,其总数约 6000 万头。它是印第安人的衣食来源。野牛肉可食,牛皮可做衣服和帐篷,牛粪是燃料。

19 世纪中叶,铁路线向西延伸,铁路公司专门雇猎手屠杀野牛。军队为了断绝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也大量屠杀野牛。进入 70 年代后,用野牛皮制造皮鞋和马鞍有厚利可图。许多失业者猎取野牛为生。1873 年有 700 万头野牛被杀。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大屠杀是在 1882 年。四年后,野牛几乎绝迹。1893 年,只有黄石公园里还有 1000 头左右。一年后,偷猎者又把此数减少到 20 头。

北美候鸽曾达到 20 亿只左右。这种候鸟迁徙时,正午的阳光也会为之遮蔽。19 世纪后期,人们捕捉数量之多达到了要用火车装运的地步。最后一只北美候鸽于 1914 年在动物园中死去。

由于草地、森林被破坏,人们为了牟利而滥捕滥杀,以及缺乏保护措施,许多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在美国消失。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威廉·霍纳戴指出,人们的无知使美洲失去了对人类最有用的 95% 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12)

空气和水流的污染也是 19 世纪后期日趋严重的问题之一。内战结束后,美国到处都在开采矿藏,钻探石油,修筑铁路,兴建工厂,城市迅速增多扩大。工业废水大量排入江湖,造成的污染危害水生资源和人类健康;工厂排放的有害气体、抛撒的废料矿渣,也是严重的公害,使城市生活条件大为恶化。

二、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努力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忧虑。他们要求注意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

在这些人士中,乔治·马什(1801—1882)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等地游历时,观察到森林被毁造成的后果,使他联想到家乡佛蒙特州和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森林被滥伐的情况。因此,他写了《人与自然》一书。此书于1864年出版。

他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且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对某一种资源的过分使用必然会对其他的自然资源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须保持生态平衡。他很强调森林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地中海周围森林的毁坏是罗马帝国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书影响很大,曾四次重印,1874年又出了第二版。马什唤起了人们对美国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的注意。19世纪后期有关资源保护的文章差不多都引述过马什的观点。(13)

约翰·鲍威尔(1834—1902)是另一位在资源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人。他曾任自然史教授和伊利诺伊师范大学博物馆长。1880年出任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1867年起他率领一批科学家去西南部调查,勘察了格兰特河、科罗拉多河、落基山脉、大峡谷等地,弄清了这里的土地和水力资源情况。还对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以及摩门教徒修筑的灌溉系统进行了研究。他根据大量资料在1879年提出了《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他认为西部正在形成的大片荒地是由于农民破坏了土壤的表面层而造成的侵蚀所致。大企业和木材商人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提出了建立灌溉系统和进行资源保护的极有价值的意见。他的工作开始了人们对西部的科学的认识。(14)

博物学家约翰·米尔(1838—1914)大力提倡保持自然景观。早在1876年他就敦促联邦政府制订森林保护政策。他曾在西部各地漫游,考察冰川、森林。他发现加利福尼亚风景秀丽的约塞米蒂峡谷正在受到大量在此放牧的羊群的破坏,乃一再撰文宣传并向国会议员游说。加以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想把这里开辟为风景区,吸引游客。哈里逊总统在1890年签署立法,在此建立红杉和约塞米蒂两个国家公园。这是继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之后两个重要的自然保护区。(15)

在早期资源保护主义者中,还应提到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埃伦·理查兹(1842—1911)。她是研究水和空气的化学家,是第一位进入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读,后来又在该校任教的妇女。她在对化学、生物、营养学、海洋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后,在1892年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生态学,因而被誉为“生态学之母”。这门学科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她在对水和空气受到污染的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后,对美国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感到震惊。她认为环境的恶化将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发展。1908年,她又创立了第二门新学科——优境学。这门学科研究如何发展公共卫生体制以保护、控制和改善自然环境。(16)

美国第一位主管林业的官员富兰克林·霍夫(1822—1885)也是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一。他对气象学和降雨量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森林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力主保护森林。1876年他被委派在农业部任职,负责森林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任职后,定期提出有关森林状况的报告。他曾指出,美国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使公众无法制止私有土地上资源的破坏,但是政府可以为了公共的利益而行使土地征用权。他认为发展林业的另一个障碍是缺乏可以植树造林的公有土地。他的报告曾引起国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当时颇具影响。(17)

卡尔·舒尔兹(1829—1906)在海斯总统执政时任内政部长,是起来反对破坏自然资源的第一个部长级官员。他指责木材业巨头们不是在盗伐树木,而是在盗窃整个森林。1877年,

他向国会作报告,建议设立政府的森林保护体制,并实行类似欧洲国家的造林规划。由于代表木材公司利益的议员们的反对,国会未能采纳他的意见。(18)

在早期资源保护主义者大力宣传之际,美国政府制订过某些立法,如1873年3月3日通过的《造林法》。该法规定凡植树40英亩并保持10年之久者,均获得土地160英亩。1878年国会修改了法令,把植树面积降低到10英亩。但收效不大,国会乃于1891年取消该法。1878年还通过了《木材石料法》,该法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俄勒冈和华盛顿四个西部州,把不宜农耕但可采伐木材和石料的土地按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出售,每人可申请的限额为160英亩。此法令使木材公司得以继续破坏森林。

以上两法的出发点并非资源保护,而是为了满足西部地区的木材需要和鼓励人们去西部定居。(19)木材公司利用了这些法令,弄虚作假,雇佣了人员去申请土地,然后再把它转到公司手中。私人企业和投机者借此共捞到了大约1300万英亩土地。(20)

1877年3月3日国会通过的《荒芜土地法》。该法允许人们按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购买640英亩的荒芜土地,条件是要在三年内灌溉一定数量的耕地。在实际执行中,大牧场主和土地公司利用该法套购大片土地,却又没有按法律要求进行灌溉。

1885年时,内政部土地管理总局局长威廉·斯帕克斯鉴于根据各种法令颁发土地证的工作中的严重舞弊行为,曾一度停止有欺诈嫌疑的产权登记。但他却因此于1887年被免职。(21)

经过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宣传和努力,某些政府官员如农业部林业处处长伯恩哈德·弗恩诺、内政部长约翰·诺布尔等也一再要求保护森林和公地,国会在1891年通过了《森林保留地法》。该法第24款授权总统得从各州或领地的公地中,保留若干森林地区,以此作为国家的保留地。(22)在哈里逊总统执政时期,共有1300万英亩的林地按此法保留起来。

1891年的法令虽然规定了国家可以收回一部分森林,以保护农场、牧地和市镇不受干旱及洪水的危害,但既未考虑如何利用森林,又未拨款来管理森林。1891—1897年间,国会曾研究过27个有关保留地的管理的议案,但直到20世纪尚未采纳过一项全面的管理条例。(23)

国会曾在1897年授权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的农业部林业处维护国有森林,使其免遭损失。但森林保留地当时却属并无林业人员的内政部土地管理总局管辖。

总之,19世纪后期美国有关森林的法令并未能建立起一项能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政策,甚至不存在一项有效地利用国家森林的政策。然而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呼吁已经唤起了人们的注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为20世纪初期资源保护运动的诞生在思想上和舆论上打下了基础。

三、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

美国有组织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系统的政策始于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罗斯福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大自然和野外生活,经常旅行、打猎。他曾在西部经营牧场,熟悉那里的生活。1898年当选为纽约州长后,他一直非常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他召开过纽约州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会议,改进管理机构。(24)

他亲自过问护林工作,要求严防森林火灾,设立专职人员进行科学管理。他要求对纽约州森林资源作出详细调查,把阿迪朗达克山脉和卡茨基尔山脉加以保护,成为供人们游览的公园。他亲自检查有关锯木厂和纸浆厂的法律的执行情况,严禁把废物废水倾倒在溪流中,以免水质受到污染。为了保护鸟类,他禁止纽约州的工厂生产鸟类羽毛的装饰品。他清楚地认识到森林与水土保持的关系。他曾指出,森林受到破坏必然会造成干旱与洪灾。(25)

罗斯福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最主要的顾问和助手是吉福德·平肖(1865—1946)和弗雷德里克·纽厄尔(1862—1932),特别是前者。平肖是美国第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林业人员。他

在 1889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因美国的学校里还没有建立起林业学科,乃赴欧洲学习,回国后即从事林业工作。1898 年出任农业部林业处长。他工作热情积极,很有领导才干。他从保护森林出发,进而提出了较全面的对整个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 policy,可以说是 20 世纪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奠基人。(26)

罗斯福对平肖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他领导下的公职人员中,为美国人民作出贡献最大者,平肖名列第一。罗斯福说:“在把我们一切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协调起来,致力于采纳一项合理和有远见的政策,以实现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的伟大斗争中,他是最主要的领导人。”(27)

纽厄尔是水利工程师,他认为拯救森林、土壤、建立灌溉系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和平肖一起向罗斯福建议,由联邦政府来推动西部干旱地区灌溉系统的修筑。在罗斯福的支持下,1902 年国会通过《全国农垦法》,并成立农垦处后,纽厄尔出任负责农垦工作的总工程师。1907 年,他担任农垦局局长之职。

1901 年 9 月罗斯福继麦金莱之后出任总统,所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农垦问题。他在《自传》中说,他刚到华盛顿,尚未进入白宫,正住在姐姐考尔斯夫人家中时,平肖和纽厄尔前来晋谒,建议由国家在西部干旱地区建立灌溉系统和加强林业管理。罗斯福十分赞许,当即要求二人准备材料,以便他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使用。1901 年 12 月 3 日发表的这篇咨文用了差不多 1/4 的篇幅叙述与资源保护有关的问题。罗斯福强调指出:“森林和水的问题也许是美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28)

罗斯福的农垦政策后来体现在 1902 年 6 月 17 日颁布的《全国农垦法》中,该法又称《纽兰兹法》,因为法案的提出者为来自内华达的参议员、民主党人纽兰兹。该法规定把西部和西南部 16 个州的几乎是全部出售公地的收入,用于建立和保养干旱地区的灌溉设施。这样就使一些原来不能利用的土地成为可耕地。政府出售这批土地给农户,并向他们征收灌溉费用,逐步收回投资,资金得以周转后,又可建立新的灌溉系统,逐步扩大可耕地。

在草拟该法的过程中,罗斯福多次参加研究,以对付州权派的反对。经总统亲自向实力人物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请求帮助后,此法才得以顺利通过。(29)

此后,农垦工作颇有进展。1902—1906 年,共进行了 28 项工程,可灌溉 300 万英亩农地和向三万个农场供水,主要灌溉渠道长达 7000 英里,至于桥梁、暗渠等较小工程,数量更大。到 1909 年初罗斯福离任时,已取得明显效果。

森林保护在罗斯福的资源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上任时,美国剩下的公有土地几乎都在西部,公地上的森林仍在受到破坏,而西部的森林已不足以涵养水土。管理森林保留地的是以腐败著称的内政部土地管理总局。所以罗斯福在第一篇咨文中即要求把森林保留地的管理权限移交给平肖领导的农业部林业处。

1902 年春,众议院曾考虑过一项移交管理权限的议案。但西部地区的众议员大都持反对态度。他们代表的西部大企业差不多都是靠掠夺自然资源致富的。他们以土地管辖涉及宅地申请,还关系到林区的地下矿藏为借口,硬说森林保留地置于土地管理总局之下更为简便。结果该一议案未获通过。

罗斯福是政治斗争的老手,深知如何争取支持力量和减少“经济上的地域主义”的阻力。他在贯彻《全国农垦法》中,尽量使西部得到某些实惠。土地管理总局的贪污受贿一再被揭发,成为一时丑闻,这也削弱了来自西部的反对力量。最后,南达科他参议员艾尔弗雷德·基特里奇的态度转变,对国会影响颇大。该州霍姆斯塔克矿业公司在得到保证,州内森林保留地的木材将不运往州外,以满足该公司的需要后表示,不再反对管理权限的移交。(30)

经过三年的努力,1905 年 2 月 1 日的国会立法将森林保留地的管辖权移交农业部林业处。同年 7 月 1 日,林业处升格为林业局,平肖出任局长。两年后,森林保留地正式命名为国有森林。这一改变的意义不可低估。林地如继续留在内政部,或留在州、郡、市政府手中,

都会以各种方式较快地转入私人手中。国有制可以更好地保护森林。林木生产过程很长,有时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带来收益。这就超出了私人经营的计划范围。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31)

从1905年至卸任为止,罗斯福曾发布了300余项把某处林区收归国有的命令。虽然国会曾在1907年起来阻挠,但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32)

为了保护森林,罗斯福不徇私情,还通过司法途径将西部一些用欺骗手段盗窃国有森林的林业巨头定了罪。(33)

国有林区中可以放牧或宜于农耕的地段,从1906年夏季开始,实行林区放牧按章缴费的制度,改变了过去自由放牧,使大牧主获利甚多的状况。林业局也在保护森林的前提下,在林区采伐。这两项收入均上缴国库。1906年6月11日的《林区宅地法》规定,把宜于农耕的林间土地向前来定居开垦者开放,其办法与一般宅地申请相同。从法令通过到罗斯福卸任为止,约有50万英亩林区可耕地被提供给前来开垦的人,做到了地尽其利。(34)

在平肖的推动下,资源保护的范同从森林、土壤不断扩大到包括煤田、油田、其他地下矿藏,以及具有潜在水力资源的区域,如可供修建水电站的地点等。为了保护资源,罗斯福在1906年6月用行政命令暂停一切蕴藏着煤炭资源的公地的出售,并禁止在公地上开采煤矿。此后又扩大到其他矿产和有水力资源的地段。

但是,国会坚决反对罗斯福的计划。1905年至1907年间,罗斯福与国会在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总统要求加强国有土地的管理,并收回更多的土地,使铁路公司、木材公司、矿产公司、大牧场、电力公司等对公地进行掠夺的特权,突然受到了限制。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议员的力量,到1907年时已变得相当强大。参议员富尔顿在1907年的农业拨款法案中列入一项附加条款,取消了1891年《森林保留地法》,并规定总统不得再在西北部六个州内拨出土地建立国家公园。总统乃在签署该法案前,突击签发行政命令,新建和扩建32处森林保留地,共1600万英亩。这里有森林、矿藏和可供建水电站的水力资源。(35)

可以通航的河流也是重要资源,需要加以保护。平肖认为,每一条河流从它的源头到海口,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计划来加以治理。罗斯福根据平肖的建议,在1907年3月14日发布行政命令,成立了内地水道委员会。他在任命时强调了河流作为一项资源的价值,要求制订计划,很好地加以发展和管理,并研究河流与其他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该委员会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报告,探讨了如何扩大通航和水路运输能力,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还研究了内河运输与其他运输之间的联系和在水道使用、管理中,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如何协调等问题。这些计划虽未能为国会采纳,但该委员会向罗斯福提出的召开大型会议,全面研究资源保护问题的建议,立即得到他的支持。

1907年11月,罗斯福亲自向各州州长和有关人士发信,邀请他们参加全国资源保护大会。会议于1908年5月13日至15日在白宫东厅举行。总统、副总统、7名内阁阁员、34名州长、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70个左右全国性学术团体负责人、工商界领袖等,共约550人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会议。

白宫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会后,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建立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清查全国资源及浪费、破坏的情况。委员会成员有政府有关部门成员和国会议员。林业局长平肖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该委员会仅用半年时间就提出一份有关美国资源状况的极为完整的报告。这在世界各国中也属首创。

这一报告是提交19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资源保护大会的正式文件。参加此次大会的人员大体上和白宫会议相同,还有好些州一级的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代表。白宫会议后已有41个州相继成立了州一级的组织。大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转呈总统。总统又咨送国会。

大会还建议总统召开北美资源保护会议。罗斯福欣然赞同。1909年2月18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纽芬兰的代表在美聚会。五天的会议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原则,并建议美国总统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大会,共商资源保护问题。罗斯福乃指示国务卿培根向45个国家发函,建议在荷兰海牙召开这一会议。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在罗斯福卸任后流产。

罗斯福在资源保护的贡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他在任期内共建立了5处国家公园、4处供狩猎的大型野生动物保护区,和51处鸟类禁猎区,使美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36)

罗斯福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他任期结束时,特殊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劫掠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现象基本上被制止了,开始了有组织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时期。美国的资源保护问题历来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收回土地为例,在罗斯福的三个前任执政期间,总共才收回了4680余万英亩林地,而罗斯福执政时期,他将各类土地共23400万英亩收归国有,其中林地近15000万英亩。仅此一例,足以说明成绩不能低估。

罗斯福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他又是一个主张扩大行政权力和喜欢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威,不愿受任何约束的总统。没有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没有罗斯福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是难以克服阻力清扫积弊和制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的。他致力于自然资源保护,不惜触犯某些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其出发点虽是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在美国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是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但对于他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却几乎没有分歧的意见。经过了3/4世纪以后,我们今天回顾罗斯福的多项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仍然可以说,这些政策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是罗斯福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注释:

(1) 唐纳德·J·皮萨尼(Donald J. Pisani)著:《1865—1890年的林业和自然资源保护》(*Forest and Conservation, 1865—1890*)。见《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2卷,第2期,第342页。

(2) 同上,第343页。

(3) 同上,第344页。

(4) 同上,第345页。

(5) 雷纳德·皮特(Leonard Pitt)著:《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We Americans: A Top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册,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Glenview, Ill.)1976年版,第508页。

(6) 约翰·D·希克斯(John D. Hicks)著:《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5年第3版,第342页。

(7) 唐纳德·皮萨尼著:《1865—1890年的林业和自然资源保护》。见《美国历史杂志》第72卷,第2期,第346页。

(8) 雷纳德·皮特著:《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第2册,第516页。

(9)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纽约1920年版,第418页。

(10) 雷纳德·皮特著:《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第2册,第515页。

(11)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418页。

(12) 雷纳德·皮特著:《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第2册,第509页。

(13) 乔治·帕金斯·马什著(George Perkins Marsh)词条,《美国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第VI册,纽约1961年版。并见前引《1865—1890年的森林和自然资源保护》,《美国历史杂志》第72卷,第2期,第352—354页。

(14) 约翰·韦斯利·鲍威尔著(John Wesley Powell)词条,《美国传记词典》第VIII册,纽约1963

年版。

(15) 约翰·米尔著(John Muir)词条,《美国传记词典》,第 VII 册,纽约 1962 年版。

(16) 埃伦·亨丽埃塔·斯瓦罗·理查兹著(Ellen Henrietta Swallow Richards)词条,《美国传记词典》,第 VIII 册;并见前引《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第 510 页。

(17) 哈罗德·K·史汀(Harold K. Steen)著:《美国的林业机构史》(*The U. S. Forest Service: A History*),西亚图 1976 年版,第 9—15 页。

(18) 卡尔·舒尔兹著(Carl Schurz)词条,《美国传记词典》,第 VIII 册。

(19) 哈罗德·史汀著:《美国的林业机构史》,第 8 页。

(20) 雷纳德·皮特著:《我们美国人——美国专题史》,第 508 页。

(21) 施莱克贝尔著:《美国农业史(1607—1972)》,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1—152 页。

(22) 哈罗德·史汀著:《美国的林业机构史》,第 26 页。

(23) 唐纳德·皮萨尼著:《1865—1890 年的林业和自然资源保护》,《美国历史杂志》第 72 卷,第 2 期,第 342 页。

(24)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 290 页。

(25)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 313—315 页。

(26) J·雷纳德·贝茨(J. Leonard Bates)著:《实现美国的民主——1907—1921 年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Fulfilling American Democracy: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907—1921*),《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 47 卷,第 1 期。

(27)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 394 页。

(28) 同上,第 396 页。

(29) J·雷纳德·贝茨著:《1898—1928 年的美国——渐进主义和转变中的社会》(*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8: Progressivism and a Society in Transition*),纽约 1976 年版,第 84 页。

(30) 哈罗德·史汀著:《美国的林业机构史》,第 74 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697 页注。

(32) 威廉·D·路易士(William D. Lewis)著:《西奥多·罗斯福生平》(*The Life of Theodore Roosevelt*),费城 1919 年版,第 291 页。

(33) 乔治·E·毛雷(George E. Mowry)著:《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与现代美国的诞生,1900—1912 年》(*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 1900—1912*),纽约 1958 年版,第 215 页。

(34)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 405 页。

(35) 威廉·D·路易士著:《西奥多·罗斯福生平》,第 293—294 页。

(36) 西奥多·罗斯福著:《自传》,第 420—421 页。

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施咸荣

美国人民尚新,有创新精神。美国国内情况变化得也快,因此历史学家欧内斯特·莱西提

出,在美国时隔一代即为历史,美国的历史小说比起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来,年限也要相应缩短。英国历史小说的大师司各特给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加了一个副题:“60年前发生的事情”,暗示至少隔两代,才够得上称“历史小说”;莱西则认为,在美国只要隔一代就可称“历史小说”。(1)

二次大战后美国科技发展更迅猛,社会变化更快,反映在文学艺术里,就是新流派不断诞生,新趋势不断出现。从40年代末开始,几乎每隔10年就有一种新趋势替代旧趋势。至于战后文学中流派之多,更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战前,新批评派文艺理论在美国文坛尚能称霸数十年,而在战后,结构主义很快让位给解构主义,不久接受美学(也即读者反应论)又取而代之。随着6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还产生“女权主义批评”和“新女权主义批评”。最新的文艺理论之一是所谓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它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探索文化,很值得注意。在诗歌运动中,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战斗的黑人诗歌等等,此起彼伏,但都只能起影响于较短时期和较狭窄的读者圈子。80年代的最新倾向则是对一些不知名的诗人产生了偏爱,以致于像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这样的小诗人居然获得了1984年度有“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基金,不仅文学界觉得突然,连作者也感到意外。(2)战后的美国戏剧从百老汇到外百老汇到外外百老汇,探索与创新的实验性戏剧层出不穷,从宣扬暴力革命到抒写色情与暴虐狂,无所不包;表现手法离奇荒诞得简直出乎人的想像之外。实验性戏剧中的色情戏越来越多,猥亵程度也越来越厉害,已成今日美国剧坛的一种危机。倒是黑人戏剧保持勃勃的生机,而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有忿怒情绪的青年女剧作家,也给不景气的美国剧坛带来一些朝气。美国剧评家古索夫指出:今天的女剧作家关心社会题材,对现实世界更为接近。(3)

在小说领域里,创新与实验之作更多。由于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镇压与围剿,使美国文坛萧条静寂了近10年。到了60年代却静极而动,涌现出众多流派,如非虚构小说、超小说(surfiction)、超级小说(superfiction)、超绝小说(metafiction)、反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抽象小说、荒诞小说、新型传奇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等等。这些实验性小说中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共同点,即采用“黑色幽默”技巧,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讽喻社会的黑暗面,因此又有人把“黑色幽默”派作为60年代多种实验性小说的总称。到了70年代“黑色幽默”日渐过时,随着两位犹太小说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犹太小说在美国文坛令人瞩目。但犹太民族迅速被同化,新一代犹太裔作家写不出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老一代作家死的死(如名作家马拉默德),活着的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辛格与贝娄等,都只能根据记忆中的犹太经验和感受汲取创作灵感,而记忆宝藏越挖越少,作者往往只好向壁虚构以补不足,无怪乎他们晚期的创作在走下坡路。看来犹太文学从80年代始正在日趋没落,濒临死亡。(4)到了80年代,美国小说又有恢复传统的趋势,但不是单纯的复旧,而是各种文学流派经过互相交流、互相吸收或互相结合,再回到传统的形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实验现实主义”(experimental 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出现。

“实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

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某一派占主导地位,但它们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不可能壁垒森严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当代美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倾向在50年代初就出现,到70年代已很明显,80年代之后则成为小说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1952年,以一本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著名黑人作家拉尔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他的有预见性的《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里创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描绘变得疯狂的美国”。(5)20年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伊哈伯·哈桑总结

战后美国小说的发展时说,当代美国作家都在追求和探索“更深一层”的艺术手法,结果在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喜剧和悲剧、事实和象征,全都通过难以捉摸的形式相混合,像当代现实生活一样扑朔迷离”。(6)一度怀有“可笑的巴尔扎克式雄心”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在她后期的作品如《查尔德伍德》(*Childwold*, 1976)和《贝尔弗勒》(*Bellefleur*, 1980)中试图用意识流、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来丰富现实主义。她在1980年与《纽约时报书评》记者谈话时强调:“在我们可爱的美国文学里,现实主义早已与超现实主义结合。到80年代后,作家们都反对将作家进行分类。”

在60年代,美国的小说家们为了创新,在现代主义中进行种种实验,因此有不少评论家把这类“实验小说”概括为“后现代派小说”。到了80年代,小说有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倾向,却又有一些作家在现实主义中进行实验以求创新,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美国小说发展中的一个新倾向。

不久前靠所谓“实验现实主义”一举成名的爱尔兰裔作家威廉·肯尼迪,把自己的创作方法的特点解释得很详细。首先,他欣然同意用“实验现实主义”这个新术语来概括他的创作方法,声称“关于麦克卡弗利教授所提出的‘实验现实主义’,我认为如果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我的作品,这一术语是最贴切不过的了。”(7)

这里的“作品”指他的成名作《斑鸠菊》(*Ironweed*, 1983)。肯尼迪已出版四部小说,前三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品,出版后未受重视,于是在他的新作《斑鸠菊》里改用新的手法,一方面遵循文艺反映与描绘真实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又要“打破现实主义的框框”,在现实主义中搞创新与实验,这种实验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对艺术真实作出不同的理解;二,在表现作者所理解的艺术真实时采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一些新手法。

各种文学流派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与描绘真实性的方法。不少现代派作家曾把人的无意识世界看作真实的世界,认为作家应该反映与描绘的主要是心理现实。(8)60年代后的后现代派则强调情感现实。(9)肯尼迪在1986年致中文译者的信中强调指出:“我深信在严肃小说里描写的主体是**真实的**(重点系肯尼迪本人所加)世界和它的问题。我非常钦佩某些像卡夫卡和塞缪尔·贝克特这样的荒诞作家。不过对于这些作家,谁也不会怀疑真实世界是他们荒诞想像的基础。”他在另一场合又说,他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再创造某一时代的人物与地方”,但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是着重描写人物情感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即情感现实。他还说,一个作家要在作品中揭露和谴责社会黑暗面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表现出个人怎样能在黑暗的社会中生存下去,要挖掘出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他自己在《斑鸠菊》中就企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在生活中现实与想象是混在一起的,因此他也要在小说中描绘与反映混杂在一起的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为了生动地再现这两个世界,他什么手法都用:意识流、黑色幽默、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古老的抒情笔法、鬼魂的出现,等等。他说在《斑鸠菊》中利用鬼魂的出现来表现主人公法兰西斯的过去并不是一种新手法,英国作家狄更斯和乔伊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Marquez)都用过,当代法里尼(Fellini)的影片《8. p7 1/2. r》和伯格曼(Bergman)的影片《野杨梅》(*Wild Strawberry*)中也用过,他的新颖之处只是利用这一手法来表现人物更深一层的意识,为的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作品的现实主义。(10)

肯尼迪的《斑鸠菊》只10几万字,近似中篇小说。全书没有主要故事线索,人物也只是些瘪三、流浪汉(所谓的“反英雄”),内容主要写流浪汉法兰西斯离家22年后回到故乡奥尔巴尼市以后几天中的活动,多半是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心理活动。但作者杰出地运用了所谓“实验现实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集中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各个层次的心理活动(清醒的、半清醒的、梦幻的),想像丰富,结构严谨,文笔洗炼而富于诗意。这部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评论界与读书界的普遍赞誉,获1984年的普利策奖和全国书评界奖,翌年又获26.4万美元免税的麦克阿瑟基金奖。索尔·贝娄大力推荐此书,华裔美籍

女作家於梨华 1985 年回国访问时也推荐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斑鸠菊》的内容只是刻画一个小人物与命运搏斗失败后维护个人尊严的内疚心理,这在当代文学中原不足奇。使该书和作者成名的,主要应归功于它的艺术成就——所谓“实验现实主义”的新方法。

“新现实主义”——女权运动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

二次大战甫告结束,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夫人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从研究战后妇女的处境出发,写了《第二性别》(*The Second Sex*, 英译本出版于 1952 年)一书,广泛论述并指出争取女权的途径,这本著作产生了世界影响,尤其在美国,已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美国女权运动的杰出领袖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t)说:波伏瓦的这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命运”。美国女记者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受这部书的影响,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为 60 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制造了舆论。1970 年米列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出版,论述了西方文化对妇女的压迫,使女权运动与文化运动相结合,从而产生“女权主义批评派”(feminist criticism)文艺理论。

女权主义批评派及后来的新女权主义批评派都强调女性特点和家庭日常生活,如女作家安妮·泰勒(Anne Tyler)强调厨房里洋溢着感情生活,她的小说也从家庭日常生活反映社会重大问题。另一著名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其成名作《紫色》(*Color Purple*, 1982)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找到叫作“爱”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美德;有了爱和爱的力量,才能弥补人生的不幸。女权主义评论派还号召发掘与重新评价历史上的女作家和作品,分析现存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如认为海明威的作品贬低女性),但最重要的是以女性对人生真谛(包括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追求这一女权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创造新女性的形象。目前美国女作家们已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创造出系列觉醒了、懂得争取女性权利、维护女性尊严的新女性群像,而在这些创作中,又体现了被称作“新现实主义”的女性美学原则。

女权主义评论家在论及女性美学时,往往以美国女作家阿奈伊斯·宁为范例,常用她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为女作家的创作特征:“女人的创作压根儿不同于男人,她的创作就像生儿育女,必须出自她自己的血液,孕育于她的子宫,喂以她自己的奶汁”。(11)宁虽写小说,但其主要成就是七卷本(1931—1974)日记,用生动、优美、形象化的文笔记录她 40 多年的生活与感受。她认为,“今天的男人像一棵根部正在枯死的树,而大多数女人都模仿男性生殖器在写书作画。这个世界充满了男性生殖器,像图腾枝一样,却哪儿也见不到子宫。普鲁斯特在创作中寻找永恒时刻,我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必须在生活中寻找永恒时刻,我的作品必须最接近生活流。”(12)宁的理论与实践被女权主义评论派所推崇和传播,对今天的“新现实主义”方法有很大的影响。

60 年代开始,美国文坛曾出现一股反传统的潮流和暗流,不少评论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随着小说的死亡而过时,作家的任务在于探索和创造一种适应时代精神的新艺术。于是大多数美国作家中存在着一种脱离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倾向,还有不少作家认为今天的疯狂世界已无法理解,也无意去理解并描绘它,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把描写的重点从重大社会问题和广阔的社会画面转移到个人生活——尤其是中产阶级个人内心生活的小天地。而妇女作家早从 60 年代起就成为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如女权运动本身的趋向,把文学创作的焦点从自我的小天地转移到社会。在她们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在 80 年代回到了美国文学,重新受到重视。

女权运动中有争论,有分歧,甚至有分裂现象,其社会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把重点放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有的要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要求妇女体现女性的特殊性和敏

感性,在文化上作出贡献;要求妇女把争取女权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结合起来,此外还提出性解放、同性恋自由等要求。不少女作家本人就是女权运动的领袖或积极参加者,其作品往往反映自身的斗争经验,社会意识十分强烈,因此有的评论家称80年代女作家中出现的“新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

女作家的“新现实主义”体现女性的特点。她们身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多数是家庭制度的维护者,她们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家庭日常琐细来反映社会风貌和描写重大社会问题,笔法细腻,感情丰富,风格清丽多姿,能激起男女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因此评论家又称其为“感情的现实主义”(emotional realism)。

今天美国女作家已在各个文艺领域里吹入新的现实主义清风,给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南方文学等带来新的生机。梅雅·安吉鲁(Maya Angelou)的《自传》、女记者瑞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的政论和她写年轻女记者经历的小说《快艇》(*Speedboat, 1976*)、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的自白诗、玛丽琳·法兰琪(Marilegn French)全面反映女性觉醒、精确描绘女性本来面目的长篇小说《女厕》(*The Women's Room, 1977*)、爱瑞卡·琼(Erica Jong)描写女人性欲与独立人格的小说,都反映出女作家们独特的成就。到了80年代,美国文坛已不得不对女作家刮目相看。1983年美国的大部分文学奖都为女作家所获得,包括普利策小说奖和戏剧奖、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小说处女作奖、传记文学奖、全国书评界奖等。尤其是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书信体小说《紫色》以独创的风格描写一个惨遭后父奸污的14岁弱女子的觉醒过程,刻画了一个从只能向上帝倾吐哀衷的可怜虫转变成有思想、有才能的新女性形象,涉及了当前美国社会中诸如女权斗争、宗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尖锐复杂的问题,因而兼获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界奖三大奖。

当代文学史家也开始关注妇女文学,如80年代初出版的《哈佛版当代美国文学导论》辟专章(第八章)加以论述。1985年首次出版《诺顿女作家选集》,辑录了700年来150多位女作家的作品,许多历史上受忽视的女作家被发掘出来。诺顿英美文学选集近20年来一直是许多大学里的英语教材,享有较高声誉,《诺顿女作家选集》标志着妇女文学已越来越受今天世界文坛的注意。

南方文学的未来

所谓“美国南方文学”有双重涵义。广义地说,是指地理上的区别,也即美国南部的文学。狭义地说,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南部突然出现的文学繁荣。当时的三个重要文学批评运动——“逃亡者”(Fugitives)、“重农派”(Agrarians)和“新批评派”(New Critics)都发生在南部。还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福克纳·韦尔蒂(Eudora Welty)、沃尔夫(Thomas Wolfe)、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最重要的代表当然是福克纳。文学史家们后来称这一时期(1925—1955)为“南方文艺复兴”(Southern Literary Renaissance)。

其实称作“文艺复兴”并不确切,因为这之前美国南部并不存在独树一帜的文学,谈不上“复兴”。严格说来,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有浓重地方色彩和深刻历史感的文学流派,其思想倾向与艺术表现尽管十分复杂,这两点都是共同的。艾伦·泰特说,第一次大战促使南方作家们回顾历史和重新认识历史,从而诞生了南方文艺复兴。他们在重新认识南北战争的意义时一方面痛恨战前南方的蓄奴制,为祖先所犯的罪恶感到内疚,另一方面更清楚地看到在南北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后果:经济的落后,北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南方古老社会的解体,正如南方女作家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所说,南方正在“失去它很多的缺点和极少的优点”,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南方”。像英国名作家哈代在他的《威塞克斯小说集》(*Wessex novels*)里所做的那样,美国不少作家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南方社会解

体的变化反映出来,最成功的是福克纳,他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手法,通过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艺术世界,描绘了南方古老家族的衰败,从经济崩溃、道德堕落到子孙变得病态与畸形,甚至成为白痴。在他的影响下,刻画畸形、怪诞的形象已成为南方文学的特征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方文学的特殊繁荣,促使文学史家们去追本穷源,探索传统。因此,有的史家把产生南方文学的历史上溯到1607年,把南部的种植园文学、黑人文学以及一些出身于南部的作家如爱伦·坡、马克·吐温等人的创作都包括进去,于是所谓“南方文学”便成了美国南部的文学,地理概念甚于文学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就不存在“南方文学的未来”这一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诺布尔(Donald R. Noble)所说,只要美国有南方,就会有南方文学,而且或多或少带点南方特色。(13)

但从狭义上说,自福克纳1962年逝世后,所谓“南方文艺复兴”已告结束,作为流派的“南方文学”也江河日下。两位杰出的后起之秀奥康纳和麦卡勒斯(Carson Smith McCullers)相继去世,惟近80岁的女作家韦尔蒂还在散发余热。60年代后成名的南方作家都在另辟蹊径。最近逝世的卡波蒂(Truman Capote)当时已转向“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的创作。珀西(Walkes Percy)要求“摆脱福克纳的魔影”,致力于写哲理小说。当代最负盛名的斯泰伦(William Styron)公开宣称“南方作家现在必须脱掉沼泽与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七八十年代虽有一些年轻南方作家在勉强继承这一流派的传统,企图保持旧的特色——如哈利·克鲁斯(Harry Crews)在《吉卜赛人的诅咒》(*The Gypsy's Curse*, 1974)里刻画侏儒和无腿的哑巴等怪诞形象,认为世界上人人都是畸形的,所不同的只是有的形之于外表,有的隐藏于内心;而考麦克·麦卡瑟(Cormac McCarthy)在小说《萨特瑞》(*Suttree*, 1980)中更把怪诞转为荒诞:一个心理变态的男子夜夜潜入农夫的瓜园去奸淫西瓜——但他们的创作已缺乏思想深度和新的艺术特色。一些南方女作家如安妮·泰勒、盖尔·高德温(Gail Godwin)倒是有地方色彩,但作品的内容侧重于家庭生活,通过妇女之间及日常琐细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与其说是南方文学,倒不如说是妇女文学。

总之,随着美国的经济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南方已发生很大变化。拿珀西的话说,美国“新南方”的市中心已与纽约市中心无什么不同,作家们已把视线从古老的南方传统上移开,转向今天的新南方。他们的作品已失去“南方文艺复兴”时期这派作家的特色与韵味,最多只能称为“南部的文学”。

“纽约知识分子”的今昔

“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也称“资产阶级先锋派”,原是一伙团结在《党派评论》杂志周围的文人(14),文学评论方面的主要代表有艾德蒙·威尔逊、莱昂纳尔·特里林和他的夫人黛安娜·特里林、菲利普·拉甫(Philip Rhav)、戴尔摩·许华兹(Delmore Schwartz)、诺曼·波道瑞兹(Norman Podhoretz)、艾尔弗雷德·凯津、欧文·豪等。他们中间有不少犹太人,年轻时候思想激进,信仰共产主义,三四十年代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五六十年代还保留革命精神,是解释存在主义的权威,支持过60年代的黑人抗暴斗争、女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等正义斗争。他们的著作持正统观点,认为文学必须有社会意义和合乎道德准则的思想内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的发展起过积极的影响。但60年代以后,《党派评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原有的色彩和影响,原先团结在它周围的这些评论家死的死,活着的也都散了伙,有的去大学教书,有的埋头写回忆录,少数还在继续写文学评论的,已分裂成自由主义左派和新保守主义右派,带着各自的追随者分别团结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评论》(*Commentary*)的周围。作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个激进流派的“纽约知识分子”集团,到了80年代已不复存在了。

有没有继承者?中大西洋激进史学家学会(Middle Atlantic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保尔·伯曼(Paul Berman)说:“新保守主义者已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的真正继承人。他们仍相信思想的力量——深信只要你分析社会正确,就是有了很大成就。”这批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团结在《评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等右派刊物的周围,支持里根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与政府关系密切。1984年冬,波道瑞兹庆祝他主编《评论》25周年,国务卿舒尔茨出席了有数百个名流参加的隆重宴会,里根总统还发了贺电。

波道瑞兹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是“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一员,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他由早先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新保守主义代言人,他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变化。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84年出版的《党派评论》创刊50周年纪念专号上撰文说,在1952年一次《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专题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已没有异化感,曾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在30年后,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肯定美国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随便批评美国是一种冒失行为。

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地位近几十年来有很大提高。40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撰稿人,靠稿费谋生,往往只能花几十美分到自助餐厅买些冷食填饱肚子,去大学执教是不敢梦想的事。但近30年来,一个以知识为资本的知识分子新阶级形成了,他们不仅受重视,而且在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扩大的影响下,他们的言论举足轻重。波道瑞兹还说,知识分子已成为“优越的阶级”。

“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80年代继承者虽分左右两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左派的主要成员女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82年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集会中公开声称“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号召左派人士应该消除过去那种认为共产主义会繁荣文学艺术的陈腐想法。这与新保守派“共产主义威胁学术自由”的言论如出一辙。

两派文学评论的主要分歧是对通俗文学的看法。桑塔格60年代中期就在《坎普札记》(1964)与《反对释义》(1966)等著作中,为取消“高雅艺术”(high art)与“低级艺术”(low art)间的区别酝酿理论根据,今天她的追随者们已公开宣扬群体社会(mass society)的大众化文学比少数文化贵族享受的高雅文学更应受到重视。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则把保卫美国传统文化(严肃文学或高级艺术)视作神圣职责,他们一方面反对通俗文学,斥它们为商业化的庸俗读物与垃圾,一方面也批评像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等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随波逐流,为创新而背离了传统与文艺原则。

新保守主义文学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文学评论政治化。这派的祖师爷波道瑞兹有一理论,扬言美国文化早在60年代就已被政治化了。他说,本来应投入文学与批评的精力既然早就被转用到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因此在今天的文艺评论中掺入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晚年致力于写政论,他的追随者们也都从政治观点出发写文学评论,无怪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里昂·维塞尔梯阿(Leon Wieseltier)称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是“政策知识分子”(policy intellectuals)。

这样,在80年代,一度左右美国评论界的“纽约知识分子”集团已分裂成两派,各树一帜,而由社会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的一派目前占压倒优势,成了“真正的继承人”,但他们已失去昔日的权威,他们的言论与文章已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另一代年轻文学批评家正在成长,他们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大学里取得博士学位,在分工细、爱钻牛角尖的新学术气氛中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纯理论更感兴趣,只是他们的文章缺乏文采,理论过于深奥,因此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甚至创作界的兴趣,只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倒是一些作家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写的文学理论有的放矢,有血有肉,文章也各有风格,丰富多采,他们的文论在今天多元化的美国文艺评论界比较受人重视。

黑人文学中两股不同的思潮

80年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中存在着两股不同的思潮,不仅指导着文艺创作,而且影响着广大黑人的生活与斗争。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曾说,现代美国黑人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先是抗议的狂热,随即是较为反省地寻找自我本质,进而进一步探索文化,技艺上精益求精,最后是对世界持更广阔的看法。(15)从艾里森寻找自我本质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到探索文化与家史的《根》(*Roots*, 1976),一直到80年代一群把黑人家庭生活作为描写重点的女作家,都反映莫瑞森的这种看法。这也代表美国评论界的一般看法,因而使艾里森、莫瑞森、沃克等黑人作家蜚声美国文坛。

所谓“对世界持更广阔的看法”,就是要求黑人作家不在自己的作品里写种族矛盾与种族斗争,就是要求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步调一致,一同在作品中探索当代西方文化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自我本质的重新认识。艾里森说,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黑人,因此他对人类的处境比对黑人的处境更为关切。他之所以在小说里写黑人,只是因为黑人作为受歧视的“看不见的人”,更能说明现代人在荒谬世界中的悲惨处境,因而更是“当代人的典型”。他要求“把社会学留给科学家,并且就在此时此地,用童话里的一切精彩魔法,写出一种能表现关于人类处境的相对真理的小说”。(16)他还把自己目前正在创作的新小说(部分章节已发表)称作“超越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

80年代的黑人女作家一般也都对世界持更广阔的看法。(17)一个白人记者问黑人女诗人乔凡尼(Nikki Giovanni)她是不是认为革命已经过去,她回答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应该与你同感。这问题很叫人腻烦。”问到她对“黑人美学”的看法时,她说:“倒不是我说不出我的看法,可我对这实在不感兴趣。”恩托扎克·尚治(Ntozake Shange)说,她的职责是诚实和尽善尽美地运用她的艺术技巧。沃克在《紫色》里主要描写黑人家庭内部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博爱。女主人公西丽亚宽恕虐待过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情妇不仅不妒忌她,反而使她获得真正的爱与新生;而她丈夫最后也尊重她独立的人格,对她另眼相看。西丽亚一再遭后父奸污和毒打,在生活最悲惨的时候只知写信向上帝求救。

60年代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掀起新高潮时,黑人文艺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批激进的黑人作家提出“黑人美学”,搞“黑人艺术运动”,要求黑人文学继承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抗议文学的传统,反对黑人作家像白人作家那样在小说里描写像“看不见的人”这类懦弱的、被白人踢来踢去的“反英雄”。他们认为,今天美国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处境,决不是探索“我是谁?我的‘身份’如何?我与上帝、宇宙以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可以改善的。他们主张暴力斗争,像赖特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 1940)的主人公别格那样用暴力对付暴力。这批激进黑人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

巴拉卡原名勒洛依·琼斯(Le Roi Jones),50年代参加“垮掉的一代”,60年代参加并领导黑人艺术运动,同意黑人穆斯林的暴力斗争观点,主张成立黑人解放党(Black Liberation Party),但他很快就发现黑人民族主义是“死胡同”,于是“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逐渐懂得“黑人解放斗争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关键”。(18)他自称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黑人艺术家的任务是帮助摧毁美国”,在我国“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在长诗《一切反动派注定要死亡!!!》(*All Reaction is Doomed!!!*)中批判林彪和“四人帮”,要求人们改造世界观,并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19)巴拉卡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政论作家,也是有影响的黑人领袖,目前是左翼黑人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哈佛大学美国黑人文学系主任索拉斯教授曾为他写过长篇评传。(20)

从1983年开始,詹姆斯·格温(James B. Gwynne)主编的《垫脚石》丛书(*Stepping Stones*)开始出版,每年出版三本有关激进黑人作家的文选,已出版的有评价兰斯顿·休士(Langston

Hughes)、巴拉卡、马尔考姆·爱克斯(Malcolm X)等人的专集。这套丛书有个副题:“导向解放的文选”(A *Literary Anthology Toward Liberation*)。编者在纪念创刊周年的《解放》专集序言里说,这里所谓的“解放”是最广义的,凡是有助于反对政治、经济或精神专制的作品,都被视作对解放斗争的贡献。编者认为,今天的美国存在着不少重大问题,核心问题是种族主义和经济分配。除非正义得以伸张,美国国内将永无宁日。编者还强调,艺术、文学与生活都有一个目的。艺术与文学应该在某些方面给人们施加影响;或许文艺能触及人们的灵魂与才智,从而带来变革。

上述两股文艺思潮在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中流行,前一种目前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文坛受到普遍赞誉与欢迎;后一种是星星之火,但可以燎原。

注释:

(1) 欧内斯特·莱西(Ernest E. Laisy):《美国的历史小说》(*The American Historical Novel*),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2) 朱迪斯·摩尔(Judith Moore):《一个诗人的地位》(*A Poet's Place*),《快报》(*Express, The East Bay's Free Weekly*)1984年11月23日。

(3) 梅尔·古索夫(Mel Gussov):《女剧作家显示新的力量》(*Women Playwrights Show New Strength*),《纽约时报》1981年2月15日。

(4) 参阅艾伦·勒尔契克(Alan Lelchuk):《犹太小说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Jewish Novel*),《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11月25日。

(5) 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编:《哈佛版当代美国文学导论》(*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第三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6) 伊哈伯·哈桑(Ihab Hassan):《当代美国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45—1972*)小说部分导言,纽约弗里德力克·恩格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26页。

(7) 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1986年3月10日致《斑鸠菊》中文译者王约西的信,见北京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斑鸠菊》中译本序言。

(8) 参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长期革命》(*Long Revolution*)第七章,鹈鹕丛书1965年版。

(9) 参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新新闻报道文选》(*The New Journalism*),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1973年版。他认为新新闻报道应该解释动机,使读者觉得自己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现场中的情感现实。

(10) 美国州立圣迭戈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半年刊《国际小说》(*Fiction International*)主编拉利·麦克卡弗利(Larry McCaffery)教授在1983年8月23日专访肯尼迪,在他家中作了通宵长谈。访问记发表于1984年第1期《国际小说》上,肯尼迪对文艺的看法都引自该文。

(11) 《阿奈伊斯·宁的日记》(*The Diary of Anais Nin*),第2卷1934—1939年,收获丛书1967年版,第233页。

(12) 同上,第235页。

(13) 路易斯·鲁宾(Louis D. Rubin, Jr.)等编:《南方文学史》(*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州立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14) 在一次“什么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学术讨论会上,乔治城大学的诺曼·本鲍姆(Norman Birnbaum)教授说:“一个‘纽约知识分子’曾经是《党派评论》的作者、编者或读者。”他用的是过去式时态。见《纽约时报杂志》(*Si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r*),1985年8月25日。

(15) 《新闻周刊》(*News Week*)1981年3月30日。

- (16) 拉甫·艾里森:《影子和行为》(*Shadow and Act*),纽约兰德姆出版公司 1964 年版。
- (17) 参阅克劳迪娅·泰塔(Claudia Tate)编:《黑人女作家在工作》(*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纽约连续出版公司 1982 年版。
- (18) 阿米里·巴拉卡:《自传》,纽约弗劳莫特利克斯丛书 1984 年版,第 301 页。
- (19) 《阿米里·巴拉卡/勒洛依·琼斯诗选》,纽约威廉·摩罗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313—316 页。
- (20) 沃纳·索拉斯(Werner Sollors):《阿米里·巴拉卡/勒洛依·琼斯:寻求民粹派现代主义》(*Amiri Baraka / Le Roi Jones: The Quest for a "Populist Modern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共 338 页。

艾德蒙·威尔逊书信

王佐良

艾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在中国不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名字。事实上,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作品,本人也早在十几年前死去了。但是,他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首先是因为他介绍了许多重要作品。他的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1931*)是介绍现代主义的好书,重点论述了两个爱尔兰作家:叶芝(Yeats)、乔伊斯(Joyce);两个法国作家:梵乐希(Valery)、普鲁斯特(Proust);两个美国作家:艾略特(Eliot)、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现在看起来,这六个人除了斯坦不甚重要之外,其余五人确是现代主义的支柱。在 20 年代之末,当人们对于这些作家还在争论或根本不加理会的时候,威尔逊就能清楚地说出他们作品的优点,比较系统地介绍整个现代主义潮流,而且把欧洲大陆、爱尔兰和美国串起来讲,这就表明了他的多方面的知识,他的眼光和历史意识,他的文才。

10 年后,他在另一本著作《创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里,又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狄更斯的内心创伤和他的创作特点联系起来探讨,加深了读者对这位大小说家的了解。

其次,威尔逊是卓越的实践批评家。他当然不是没有理论,但主要是一个就书论书的批评家。英美文学批评以其实践性见长,许多作家兼写文论,形成一个悠长的传统。这些人从创作实践里得到启发,写起文论来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常有卓见,文笔也优美可读。但是这样的实践批评家是越来越少了,威尔逊却能在担任《纽约人》杂志评论员的漫长岁月里,维持这个传统的标准,写出了有见地又有文采的好书评。

他还有许多其他文学活动。例如,他也写过小说、剧本、诗歌,有些作品也曾盛销。晚年他又付出巨大的精力,去研究死海古籍。他也卷入过文学争论。如同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里的教授们,在出版美国文学名作丛书的问题上,有过一场双方都感到很不愉快的争论:他为普通读者着想,反对教授们那种要把原作者稿子上的拼法和标点的错误,也一一照印的学院习气。教授们有他们的版本学原则,而威尔逊则有作家的广阔视野。

他不让自己的眼光局限于美国之内,而经常关心欧洲大陆的文学动态;他爱好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然而又做了最新锐的作家如乔伊斯的义务宣传者;他懂得多种语言,除了在普林

斯顿大学学过希腊、拉丁、法、意等语之外,还在40岁学俄语,50岁学希伯来语,70岁学匈牙利语,临死之前还想学汉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超过一般美国作家,所著《走向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 1940*)就是关于十月革命和列宁作用的论述。他也注意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展,曾把爱因斯坦和怀特海德(Whitehead)的学说同列为“智慧与想像力的构筑品”(1)。

他是美国文学中所谓“失落的一代”的同时人,其中司各特·费兹杰拉德(Scot Fitzgerald)尤其是他的挚友。他了解巴黎咖啡店对这些人的吸引力,自己也多次旅欧,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自我放逐者”,每一次总是回到美国,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美国本土文学的成长。他较早就有了比较文学的某些观点——《阿克瑟尔的城堡》实际上是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然而他更关心在深厚的基础上研究美国本土文学的传统。他自己编写的两部书——《面熟之感》(*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1943*)与《爱国之血》(*Patriotic Gore, 1962*)就是推进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他嗜佳作如命。他自己讲究写文章,已如前述;对于别人的写作风格,也是一直注意的。第二次大战一结束,他重返欧洲大陆,到处访问作家,注意点之一是何处何人写了出色的文章。记录此行的《导游书以外的欧洲》(*Europe Without Baedeker, 1947*)是很好的游记,但其最精彩的部分是谈论作家们文章风格的那些片断。

要概括一切只能说:艾德蒙·威尔逊是一个现代美国的文化人。他的先辈是门肯(Mencken)、帕灵顿(Parrington)、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更早一点还有爱默生(Emerson)和爱伦·坡(Alan Poe),比他晚一点的有麦息生(Matthiesen)、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哈利·勒文(Harry Levin)、欧文·豪(Irving Howe)等人。他们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人物”,虽然有种种弱点,却在美国这个重物质、急功近利、有时很庸俗、然而又充满生气的社会里,关心世道人心,主持正义公平,坚韧地维护着社会文化生活的高标准、高格调,为此而同强大的反知识分子潮流抗衡。他们常是失败者,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以至哈利·勒文把艾德蒙·威尔逊称为“最后的美国文人”(2)。

威尔逊的全部书信集目前正由利昂·伊德尔(Leon Edel)教授编辑中。威尔逊的夫人艾林娜(Elena Wilson)赶先挑了若干,编出了这部《艾德蒙·威尔逊关于文学与政治的书信》,于1977年出版。

这本书的编辑体例也值得一谈。书信按年代排列,分为若干时期。每一时期之前有一个大事表,表中关于事件的叙述尽量引用威尔逊自己的话。同样,在介绍重要的收信人的时候,也是精选威尔逊有关此人的话。这样,编者尽量少出面干预,使得全书从本文到注释几乎都是威尔逊的原话——例外只有书前的说明、前言和序文,分别出自艾林娜·威尔逊、利昂·伊德尔和丹尼尔·阿伦(Daniel Aron)之手。阿伦(《站在左边的作家们》(*Writers on the Left*)一书作者,哈佛教授,曾于1982年左右来过中国)的序文,同后来哈利·勒文写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悼念文章一样,都对威尔逊的为人、作品及其社会作用,作了中肯的分析。

书信是一种亲切的体裁。只是有些文人写信时也是着眼于发表的,因此不免有故作姿态之处。威尔逊的信却不属此类。他往往是执笔疾书,直抒胸怀,因此写得随便、亲切,有时候也直率,甚至愤怒。总之,露出了真性情,这样也就更值得一读。

他对朋友极热情,但对他们的行为、作品之类说真话。如果称赞,也常伴有批评,甚至指出错误。例如,在一封给阿尔弗列特·凯津(Alfred Kazin)——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论著《在本土上》(*On Native Grounds*)的作者的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阿尔弗列特:……我还在读你的书,我想我之所以对它热情不衰,不是因为你把此书献给了我;你知道我对于献给我的东西往往是有戒心的。总论部分尤其好,这类文章是特别难写的。这本书,再加上你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它可能是你至今写得最好的一篇——使我感到你真是功成名遂了。

这里“献给他的书”是凯津的重要新作《同时代人》(Contemporaries),可见两人的互相仰慕。但威尔逊又写道:

在你写的一篇论福克纳的文章里,德斯边因少校两次误作德斯边因市长了。

(1962年5月6日)

如果说凯津比他年轻一点,是后辈,那么对于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前辈,如文学史家范·魏克·布鲁克斯,他也是一样又热情又直率的:

我读了你的《山影》(Shadow of the Mountain),感到是一种享受,同你其他的书一样。……但它有三个小错,我现开列如下,因为我知道你是力求完美的。

(1962年1月2日)

范·魏克·布鲁克斯、艾德蒙·威尔逊、阿尔弗列特·凯津三人,都是有志于唤起美国作家和读者对美国文学的自信心的重要批评家。这些信件所透露的,不是别的,只是美国文化人之间频频通气和互相关照的动人情景。

用同样坦率的精神和直截了当的口气,威尔逊不怕打破人们心里的偶像、偏见,不怕触犯学术界的陋习、陈规。请看:

我从纽约买了《肯庸评论》的亨利·詹姆斯专号,玛丽刚读了它。我只翻了几页,但玛丽证实了我的看法,即这个专号像是完全由同一个人写的。兰塞姆的身上真是缺少一点什么,否则他为什么老要编这些专号,谈这些一看就明白的题目——亨利·詹姆斯、象征主义等等——早被人家写绝了的题目,找一些对这些题目毫无见解的庸才来写文章,而不是去看看有哪些真正值得一读的人写了什么,想写什么。我遇见的人都对此不满。《南方评论》的叶芝专号也是一塌糊涂。它与其说是纪念叶芝,不如说是让《南方评论》大出其丑,因为评论叶芝的人与叶芝之间的差距是太大了。

(1943年10月22日,致阿仑·泰特[Allan Tate])

40年代是“新批评”盛行之时,兰塞姆(Ransom)正是新批评派的领袖人物,《肯庸评论》、《南方评论》正是他们的主要理论刊物,当时以及后来以新派自居的文学研究者几乎是每期必读的。而艾德蒙·威尔逊一笔戳破了它们的纸糊门面!

他对于美国以外的类似现象也不放松:

《秘密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叫我感到沉闷,老式的心理分析太多,堆积了一大堆,却不给人以真实感。李维斯专挑二流作品来大夸一顿,真是出色地表现了他的缺乏文学趣味。

(1970年3月17日,致普里契特[V. S. Prichett])

这里,又是一箭双雕,即奚落原籍波兰的英国19世纪末年著名小说家康拉德,更奚落鼓吹康拉德的小说艺术的英国批评家F. R. 李维斯(Leavis),又是一个所谓新派文学理论的大名人!

当然,威尔逊并不都正确,可能兰塞姆、李维斯都会作出反驳的。但是,我们是在谈一个作家的私人通信。如果他在写信的时候还故作公允之态,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那么不仅书信不值一读,人也不值一谈了。威尔逊书信的好处,正在于他不随波逐流,敢于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文学界有时也颇多乌烟瘴气,来这样一阵清风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威尔逊也有过自信的时候,结果之一是陷入了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关于如何翻译普希金作品的激烈争论。两人本是好友,纳博科夫从苏联出来辗转到达美国之后,威尔逊还曾帮他找工作和出版机会。但是,当纳博科夫将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出版的时候,威尔逊却对译文很有意见。结果,闹出了“美国人说俄国人俄文差,俄国人说美国人英文不成”的局面。文学翻译大概是最容易引起文人争论的题目了,威尔逊未能免俗,而且——直到最后,在1971年3月8日,他在回答纳博科夫表示和解的信中,仍然说:

我在修改我评纳博科夫译普希金一文中的俄文错误的文章,但同时又举了不少你的败笔。

但威尔逊并不总是同人争论的。在多数情况下,他给朋友的是温暖的阳光,所追寻的是一场有意义的讨论,一场充满智慧和风趣的谈话。书信里也多这方面的反映,例如:

艾萨亚·柏林(Isaiah Berlin).....刚在我家度了周末。他是一个奇特的牛津教员。8岁离开俄国,因此有一种俄英双重性格。这一配合不常见,但完全令人倾倒。我们整夜作着精彩的谈话,谈了不知多少题目,但又都谈得有内行知识,有真正的智慧,还有闪耀的机智。他走了以后,我忽然感到,由于过去几乎不认识他,这一次我是把我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股脑儿搬了出来,放在他的头上,而且还装作临时想到的样子;很可能,他对我也是这样的。

(1949年6月6日致妈曼·柯斯特勒[Mamaine Koestler])

这里,既写来访者,也写主人本人,两个自命不凡又颇会说话的人碰在一起,才有上面这个有趣的场面。

由于威尔逊的交游和见闻之广,书信里涉及到的当代美、英、西欧的文人很多。他有一种本领,能够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作家的小影,或指出其人的特点、长处、毛病:

我曾碰见过劳伦斯(D. H. Lawrence)一次,觉得他缺乏教养,有点歇斯底里。他的作品也给我同样印象。

(1966年4月4日致西西尔·连恩)

我如约去见一个很神气的老头,他是这里大学的希伯来语系主任。他同一位同事一起接见我,在一间到处都是书的房间里,连坐下讲话的地方都没有,除了书之外,只有一张特大的写字桌。他的头发乱蓬蓬,像奥登(Auden)一样;一只眼睛半开半闭,必是由于终年紧盯古代手稿之故。他很有风趣,但在指定了一位教师同我一起读希伯来文之后,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

(1954年3月,无日期,致艾林娜)

关于桑塔亚那(Santayana):我没有读过多少他的哲学,但十分欣赏他的其他著作。他自己说他只在不在哈佛教哲学之后才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以后他的文章也更好了。因为他主要是一个作家。有一次他对欧文·埃特曼(Irvin Edman,他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说:“你没说最明显的一件事,即我是错过了机会的诗人。”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也是很出色的,无论是评论思想、观点,或者文化。去年冬天我读了他的小说《最后一个清教徒》,觉得写得很好。我大学的朋友不少人同他书里的主人公相似,有许多共同点,真没想到桑塔亚那这位西班牙人对这类人了解得如此之深。

(1956年9月25日,致诺曼·坎普·斯密司[Norman Camp Smith])

我又碰到了伊夫林·华(Evelyn Waugh),谈的中心题目是他的新小说(《重访勃莱兹海特》),它在美国可能还未出版。此书一部分毫无价值,还显得滑稽,而这并非作者本意,所以必然令他感到悲哀,倒给了喜欢说坏话的伦敦文学界一个大开玩笑的机会。他极为势利,到了令人难信的程度(由于娶了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出身的老婆),喜欢卖弄他所知的所谓大家族的内情,而他的贵族朋友则告诉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搞错了,这就使他狼狈不堪.....

奥登刚才路过此地,到德国去了,将在那里调查轰炸造成的心理影响——他现是美军中的一个上尉。我上次到伦敦时,那里的人都在说他坏话,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斯本德(Stephen Spender)对我说他绝不可能再回英国,那将是世上最难的事了。可是几星期后,他在那里出现了,而且一如斯本德所说,不但毫无一点不好意思,而且高傲得很。他抱怨英国的房子冷,英国生活如何苦,并且对人说伦敦并未受到轰炸。英国人全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为了礼貌才按捺住自己,没说出心里的一句话,即他这个调查轰炸对心理影响的人自己没有尝过轰炸滋味,多么可惜!他又对他们说——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我喜欢这故事,因为英国人最会把别人贬低,所以看见一个移居外国的英国佬回来把当地伙计们收拾一番,我就感到太妙了!

(1945年7月4日,致伊利莎白·休林[Elizabeth Huling])

以上牵涉到英国大小小说家 D. H. 劳伦斯, 希伯来大学的一位老学者, 美国名哲学家桑塔亚那, 英国名小说家伊夫林·华, 英美当代重要诗人奥登, 一个个都活跃纸上, 有时靠素描, 有时靠讲掌故, 另有时靠尖锐的、毫不客气的议论。

那么, 在畅游欧陆名城、访问了许多作家之后, 这位美国文化人踏上本土的口岸, 又有什么新的印象, 新的观感?

他仍然眼光锐利, 能抓住新鲜的光、色、感觉, 把它们立刻放在纸上:

这一次回来, 有一种奇怪感觉。由于是从欧洲径直回到美国, 没有做点心理准备, 结果我感到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外国, 发现了我离开时未注意到的许多事情。人们像是都大得出奇, 同欧洲人一比, 显得缺乏焦点, 缺乏味道(虽然味道在欧洲有时是很不好的)。过去曾叫我发生兴趣的许多事情, 现在显得沉闷不堪了。人们似乎希望我们起一种伟大作用, 但我看不出我们在提供灵感和卓见方面做了什么。我们唯一的伟大贡献是原子弹。我怀念起伦敦来——那些可爱的小饭馆, 塞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 他的香槟和他在摄政王公园的屋子……

(1945年9月11日, 致妈曼因·配吉特[Mamaine Paget])

几个月之后, 威尔逊又来了更深沉的感触:

对杜鲁门的信心正在下降。美国刚刚开始适应它的国际地位, 还没有真正的政策。这里的人有的听俄国人的, 有的听英国人的, 我都讨厌。这个国家似乎正在经过一个十分奇怪的阶段, 不同于我记得的任何过去时期。我们的孤立已经烟飞云散了, 同时许多其他东西也跟着消失了。眼前进行着的尊崇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式的宣传, 在我看来, 正是表示这个传统在死亡——正像在维吉尔和贺雷斯赞美罗马理想的时候, 罗马已开始死亡一样……

(1945年11月5日, 致妈曼因·配吉特)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不久, 世界躺在废墟里, 美国正处在国力的峰巅, 而威尔逊却想到古罗马由盛而衰的转折。以后他还要看到更多的变化: 冷战, 肯尼迪被刺, 越战, 等等。关于越战, 这本书信集里几乎没有任何反映, 也许是留待将来的信函全集了。美国、欧洲、世界都在变化, 而威尔逊本人, 慢慢地由一个英锐的青年变成一个心脏病患者, 行动不便了, 所欠的所得税还不清, 老朋友或死或散, 人生的忧患更深了。但是他没有放下笔, 编好了第27本书之后, 还在间间断断地写信, 一直到1972年5月27日——这是本集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 是写给《纽约人》的主编的。6月12日, 他终于死去。他的有些著作会存留下来, 但也许只在他的几千封书信里, 人们才寻到——这位文化人对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的真正的、多方面的反应。它们不仅是好的散文, 而且能比报纸、杂志以及调查报告之类更使我们看清: 美国高层文化是哪些人在构筑, 他们的光荣和失败又在哪里。

注释:

(1) 艾林娜·威尔逊编选:《艾德蒙·威尔逊关于文学与政治的书信》(*Edmund Wilson, 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1972*), 纽约法拉·斯屈劳司·吉卢出版社1977年版, 第703页。

(2) 哈利·勒文:《关于现代派的记忆》(*Memories of the Moderns*), 伦敦与波士顿费勃出版社, 1981年版, 第184页。

“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李道揆

小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牧师家庭。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兰旅馆(Lorraine Motel)遇刺身亡,时年39岁。他的一生短暂而不平凡。

金的外祖父亚当·丹尼尔·威廉斯博士(Adam Daniel Williams)和父亲先后担任过亚特兰大市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Ebenezer Baptist Church)牧师,是当地黑人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袖。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金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亚特兰大,是一座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盛行的城市。黑人不再是奴隶,但过着贫穷、屈辱的二等公民生活。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使金从幼年时期就产生了要改变黑人状况的强烈愿望。

金天禀聪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13岁进入布克·华盛顿中学(Booker T. Washington High School),15岁进入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攻读社会学。校长梅斯博士(Benjamin Mays)是一位布道者、神学家,活跃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公开反对种族压迫,抨击白人教会是“最保守的和最虚伪的机构”,他的讲道富有精神和智慧的力量。受了梅斯博士的影响,金在17岁时选择了浸礼会牧师为终身职业。以后金回忆说,“我终于认识到上帝把责任加在我的双肩上了。”1947年金被任命为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助理牧师,时年18岁。

1948年春,金毕业于莫尔豪斯学院,同年秋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克鲁泽神学院(Crozer Seminary)攻读神学,于1951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奖学金。同年秋,金进入波士顿大学著名的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55年春通过论文答辩,获神学博士学位。

在波士顿攻读期间,经友人介绍,金认识了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的、来自亚拉巴马州农村的科雷塔·斯科特(Coretta Scot)。金一见钟情,二人于1953年6月18日结婚。科雷塔从此成为金的事业的忠实支持者。

自从选定以牧师为职业以后,金就开始探索在一个白人统治、种族歧视盛行的国度里如何实现黑人自由的道路。这一探索长达六年之久,于1953年在波士顿大学最后完成。

在克鲁泽学院,金潜心学习和研究哲学、神学和美国奴隶制度史。他阅读和研究从柏拉图到洛克、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等人和当代美国神学家的著作以及关于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道路的主张。金摒弃布克·华盛顿的黑人接受种族隔离制、学习技术和手艺以自救以及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黑人“回到非洲去”等主张,他认为这些主张都太消极。他不喜欢资本主义,但不赞成马克思的学说,认为它不符合基督教的原则。金对于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他颂扬战争和夺取权力的意志感到沮丧,但又以为尼采对基督教鼓励“奴隶道德”、“奴性”和软弱无能的批评或许不无道理。金感到“爱你的敌人”、“转过另一面颊让人打”只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需要用一种更现实的态度去解决。

金不同意“社会福音”派神学家瓦尔特·劳申布什教授(Walter Rauschenbusch)把上帝王国同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等同起来(劳申布什主张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化主要资源),但很

赞赏他提出在地球上建立基于爱、合作和团结的“基督共和国”的理想。金认为劳申布什的学说为教会关心社会提供了神学基础。金认为：教会既必须为“来世的”王国工作，又必须为“今世的”王国工作；任何仅仅强调人的灵魂而不强调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宗教是“精神上垂死的、等待埋葬的宗教”。

然则如何才能实现“基督共和国”的理想呢？改变黑人的状况能同暴力相联系吗？金对美国奴隶制度和奴隶起义的研究，使他确信：少数对拥有强大武装的多数进行还击是不现实的，甚至是自杀，在道义上也是错误的。如果爱不是社会变革的有效手段，又如何才能使有意义的变革成功呢？这个问题困扰着他。

正在此时，金在费城听了访问印度归来的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Mordecai W. Johnson）关于甘地生平和其学说的演讲。约翰逊讲了甘地如何把精神力量——爱和真理转化成为社会改革的强大工具；认为甘地的非暴力道德力量可以改变美国的种族关系。金听后很受鼓舞，一下子买了好多本关于甘地的书，潜心进行研究。早在莫尔豪斯学院，金就接触到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非暴力抵抗说（civil disobedience）。在对甘地进行研究之后，他认为甘地把梭罗的学说通过非暴力的罢工、抵制、抗议游行等形式加以应用，并且是以爱压迫者和对神圣正义的信仰为基础的。金十分高兴，认为甘地的非暴力消极抵抗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正是他一直寻求的理论上的方法。金这时确信，有了对人类无私的爱，破裂的社会可以重新粘合起来，上帝在地球上的王国——基督的使命，可以建立起来。金成了非暴力抵抗的信徒。

升入四年级，金已是一个新教自由主义派，相信人天性善良和人的理性的天然力量，基于爱的非暴力抵抗可以唤起压迫者的良知。但是此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教授（Reinhold Niebuhr）的新正教（Neo-orthodoxy）学说——“新神学”风靡美国神学院。尼布尔批评新教自由主义对人性的虚假乐观主义；认为历史证明人性是邪恶的，认为邪恶的人可以完善自我和世界是荒谬的。暴力和非暴力抵抗，并无根本道德上的差别；对待纳粹极权主义的威胁，和平主义是不负责的，几乎就是共谋。尼布尔对新教自由主义的批评使金的思想陷于混乱。如果新教自由派对人性的看法完全错误，那么反映原教旨主义的新正教说对人性的看法就正确吗？

1951年秋，金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金进一步研究哲学、神学、各主要宗教教义和宗教心理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把黑格尔的伟人是“世界精神”的代表的英雄史观纳入了自己的历史观。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受到启发：发展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世界历史的道路是走向普遍正义。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合题论，即高一级的真理寓于调和正题（thesis）同另一个与正题相矛盾的反题（antithesis）的合题（synthesis）之中。据此，金认为对立的事物可以调和起来处于合题之中。这使金认为新教自由主义（人性善、理性的力量、爱的力量、非暴力主义）同尼布尔的新正教说（人性恶、非暴力和暴力并无根本的道德上的差别）的矛盾，可以调和起来处于合题之中。现在金认为：真正的和平主义，如甘地所说的，不是“不抵抗邪恶，而是以非暴力抵抗邪恶”。用金自己的话说：真正的和平主义，是以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邪恶，相信受暴力之害比对人施加暴力要好；诉诸压迫者的良知，爱的抵抗可以实现人的心灵的转变，并且使人向普遍正义靠近一大步。

以上是金在经过六年探索后作出的分析。这一分析也使他反对任何战争。到此，金形成了以非暴力和对于人的存在的复杂性的理解为基础的“合题”神学和积极的社会哲学：理想——基于爱的“基督共和国”；实现理想的方法：非暴力抵抗。金确信，基于爱的非暴力抵抗是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道路，终身奉之不渝。

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一些大学和教堂聘请他去工作。金的导师和教授们力劝金应大学之聘执教，认为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学者。金本人也有在大学任教的愿望。但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Dexter Ave. Baptist Church）聘请之意甚为殷切。

虽然到白人种族主义特别严重的亚拉巴马州去工作,对于金和他的妻子并非愉快之事,然而出于为黑人服务和改善种族关系的责任感,金终于接受德克斯特教堂的聘请,担任牧师,并于1954年9月开始工作。

在黑人民权运动史上,1954年的一件大事是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案作出了公共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的裁决。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长期进行法庭斗争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南方各州极力抵制最高法院的裁决,拒不执行。亚拉巴马州也不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1955年又作出让步的裁决,允许南方各州以“审慎的速度”实行布朗案的裁决。这种情况使金感到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必要。

蒙哥马利市有居民九万人,其中黑人占五万。蒙市是州的首府,曾经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联邦的第一个首都,白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种族隔离盛行。金发现大部分黑人接受现状,黑人领袖不团结。金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为黑人办事,建立各种委员会帮助黑人,并当选为蒙市有色人种协进会执委。金在德克斯特教堂头一年的工作很成功,声名日高,不少外地教堂纷纷邀请他前去讲道。

1955年岁末蒙市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把金推上了民权运动的历史舞台。

12月2日,市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罗莎·帕克斯夫人(Rosa Parks)在公共汽车中拒绝让座给白人,被警察逮捕和控告违反市公共汽车关于种族隔离的法规。对此,黑人领袖们一致同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向法院控告市公共汽车法规违反宪法;5日在全市开展黑人群众性直接行动,抵制乘公共汽车。占市公共汽车乘客75%的黑人,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和白人司机(司机中无黑人)凌辱黑人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群起响应抵制的号召。5日那一天,无一黑人乘坐公共汽车。轰动全国的蒙市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开始了。

为了领导抵制运动和黑人今后的斗争,5日下午黑人领袖们(主要是牧师)开会,建立了蒙哥马利改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推选金为主席,并要金在当晚群众大会上讲话。当晚黑人踊跃参加霍尔特教堂的群众大会,座无虚席。金发表了讲话,说明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名副其实的公民权,是抗议,是为了纠正社会对黑人的不公正待遇。他号召黑人团结,以非暴力抵抗把抵制运动进行到底。金最后说:“如果我们勇敢地抗议,然而又保持尊严和基督教的爱,将来写历史书时,有人将不得不说:‘曾经生活一个种族——黑种人,他们有道德的勇气站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从而给历史和文明的动脉注入新的意义。’”金讲完话后,群情振奋。会议通过了向市当局和汽车公司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保证汽车司机对黑人有礼貌;二、乘车先来先就座,黑人从后座往前坐,白人从前座往后坐;三、在黑人乘客占多数的线路上立即雇用黑人司机。

市当局和汽车公司拒绝了三点要求,并采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抵制运动:诽谤离间金同其他黑人领袖的关系;伪造同黑人领袖达成停止抵制运动的协议;以开车超速为借口把金投入监狱;以违反州禁止抵制的劳工法为由起诉和审讯金和另外88名黑人领袖和积极分子,等等。金接到的恫吓信和电话日达数十起,金住宅被炸。金等人被捕和受审,一时成为全国新闻和电视报道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和市当局的压制,使金认识到他们不会自愿地给黑人自由,黑人必须坚持斗争,不能妥协。黑人领袖和黑人群众团结一致,月复一月地坚持抵制运动。1956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蒙市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法违反宪法。12月20日最高法院裁决下达到蒙市,公共汽车公司被迫取消种族隔离法规。抵制运动于是停止。不甘心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于圣诞节后在蒙市搞起恐怖活动,炸黑人教堂和住宅,向黑人开枪,三K党游行,一时气氛紧张。但市当局怕事态扩大,突然改变态度,对金等89人的上诉案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金交500美元罚款,市撤消对其余88人的控诉。金接受了这个方案。历时一年的蒙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的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蒙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的抗议运动在黑人民权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它是黑人在整个南方第一次以非暴力直接行动进行的抗议斗争,突破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局

限于法庭斗争的传统斗争方式。它把黑人牧师作为民权运动领袖的作用提到新的高度。它唤起了南方黑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金来说,它是非暴力抵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这次斗争中,金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声名大振,一跃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重要领袖。

蒙市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仅仅打破了蒙市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蒙市其他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依然如故,整个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依然如故。不仅如此,白人种族主义者还在极力抵制在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在国会阻挠民权法的通过。南方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依旧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漫长历程。

在蒙市抵制运动期间,贝阿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曾向金建议,建立南方的民权组织,团结各种抗议力量,推进南方的民权运动。金很同意拉斯廷的建议,蒙市抵制运动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攻。更使他感到建立组织的迫切性。经过一番筹备,1957年8月,金邀请了115名南方的黑人领袖在蒙哥马利开会,建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金当选为主席,并担任此职直到逝世。

SCLC的宗旨是在南方各州展开非暴力直接行动,争取黑人的自由。第一步是开展黑人选民登记,使黑人取得选举权,通过投票把黑人和同情黑人的白人选进国会、州议会和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把白人种族主义分子赶下台,特别是改变国会成员的构成,以打破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同北方保守分子的联盟,推动民权法的通过。SCLC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很快发展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有影响的组织。1960年1月,金辞去德克斯特教堂牧师职务,迁往亚特兰大,全力领导SCLC的工作。

从1957年到1962年,金及SCLC的注意力放在开展选民登记运动上,但成效不大。这期间北方的民权组织在南方展开了静坐抗议和“自由乘客”运动,SCLC都予以支持。而南方的民权运动只取得零星胜利,并无重大突破。1962年金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这里有必要提到金对非洲和印度的访问。1957年1月,金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回到祖先的国土”,使金感到美国黑人的斗争是摆脱种族压迫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金从此十分关心非洲事务,并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保持密切联系。1959年初对印度一个月的访问和考察,更坚定了他对非暴力抵抗的信仰。

1962年9月,SCLC在伯明翰市开年会。SCLC在该市的会员团体在一些商店开展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遇到严重困难,要求SCLC到该市领导运动。金接受了这一要求。

金考虑到,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当选为该州州长,伯明翰是种族隔离的堡垒。在该市开展抗议运动必将受到当局的武力镇压,这可以引起全国新闻界的注意,使国人的良心受到谴责,从而迫使联邦政府介入。若无联邦政府的支持,是难于在南方取消种族隔离的。

1963年是林肯颁发《解放公告》一百周年。金曾寄希望于肯尼迪总统。他著文劝说肯尼迪总统以总统行政命令颁发第二个解放公告,遭到拒绝,肯尼迪害怕得罪南方的国会议员。

1963年4月2日,金在伯明翰发动了反对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运动。市当局采取高压政策,把许多示威者投进监狱。州法院发出禁令,禁止金等人示威。金在记者招待会上痛斥禁令是“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掩饰下的暴政”,率领群众游行,被捕入狱。

金从监狱中寄出《伯明翰狱中书柬》,义正词严地逐条驳斥各方面对伯明翰抗议运动的攻击,特别驳斥了对他们“不守法”的指斥。金写道:“法律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人们有法律和道义的责任服从正义的法律,有道义的责任不服从非正义的法律……一切种族隔离的法律都是非正义的法律。”

示威继续下去,市当局的镇压变本加厉。5月2日至6日,大批警察毒打示威的黑人中小学生,放出警犬撕咬他们,用高压水龙冲击他们,3000人被捕。警察血腥镇压儿童和青少年示

威者的情景经电视和报刊传遍全国千家万户,举国舆论哗然。7日,4000人举行了更大的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界开始同金谈判,于5月11日达成了市中心区商店90天内取消种族隔离、60天内雇用黑人、两周内成立白人黑人种族委员会的协议。但是第二天,白人种族主义者就炸了金的弟弟的住宅和金住的旅馆。愤怒的黑人涌向街头,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为防止事态扩大,肯尼迪总统于5月12日宣布调遣3000名联邦军队进驻伯明翰市郊,并要求维护已达成的协议,局势才平静下来。州最高法院被迫宣布温和派鲍特韦尔(Albert Boutwell)为合法当选的市长,罢了镇压示威的警察局长和另一名市政专员的官。随后新市长扩大了取消种族隔离的范围,包括公立学校在内。伯明翰黑人的抗议运动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较量,终于取得胜利。这是金领导的第二次成功的抗议运动。

这是一次比蒙哥马利斗争影响大得多也深远得多的胜利,被认为是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在伯明翰胜利的影响下,约900座南方城市的黑人在1963年进行了非暴力直接行动,从纽约到加州有100万人举行了声援示威。结果南方261座城市取消了种族隔离。

伯明翰斗争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肯尼迪总统在6月11日向全国发表了关于民权的电视讲话,宣称:现在是美国取消种族歧视的疾苦和实现其光辉诺言的时刻了,“我已要求国会……对这命题作出种族歧视在美国生活和法律上没有其地位的承诺”。八天后,肯尼迪向国会提交了他的民权法案。

美国四大民权组织的领袖和著名的黑人工会领袖金、法默、威尔金斯、怀特利·扬和兰道夫(1),为了对国会施加压力,推动新民权法的通过,决定1963年8月28日在首都举行盛大游行和群众大会。尽管肯尼迪加以劝阻,游行和集会仍旧如期在首都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5万黑人和同情的白人在林肯纪念堂举行群众大会。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金说:

我有一个梦想。有那一天,亚拉巴马州……将变成这种状况,在那里小黑人男孩和女孩将同小白人男孩和女孩手拉着手,像兄弟姐妹一样走在一起。

这是我的希望。我将怀着这种信仰回到南方。有了这种信仰,我们将能够从失望的大山开出希望的宝石。有了这种信仰,我们将能够把我国刺耳的噪音转变为充满兄弟情谊的美妙交响曲。有了这种信仰,我们将能够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坚持自由,懂得有那一天我们终将得到自由。

当我们让自由的呼声响彻大地时……我们将能加快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够一起歌唱古老的黑人歌曲:“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这是一次显示黑人争取自由的决心的大会,对新民权法的通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会见了金和其他黑人领袖。

1963年对于金来说是繁忙的一年。他旅行了27.5万英里,作了350次演讲。这一年也是他获得极高荣誉的一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1963年的“风流人物”,成为获得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然而金的成功也招来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他的更大仇恨,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他的干扰和诽谤,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则称他为“汤姆叔叔”,指责非暴力运动解除了黑人的防御,批评他的“爱你的敌人”的哲学。

1964年7月,国会终于通过了结束所有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的公民权利法,这是民权运动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极力抵制民权法的实施,种族主义暴行层出不穷。这一年的夏天,北方黑人长期积累下来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纽瓦克、哈莱姆、费城、泽西城和芝加哥都发生了黑人的抗暴斗争。

这一年,为了回答白人种族主义者发出的“黑人还要什么?”的叫嚣,金出版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一书。阐明了伯明翰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回答白人种族主义者说,“我们

要绝对的自由和平等”，黑人已对妥协不感兴趣，关于奴隶制美国历史上的妥协太多了。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金对于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的认识有了重要的发展。金指出，即使法律上的歧视明天就可以结束，如果黑人依旧贫困，就仍然不可能享有应有的权利，因此必须消灭黑人的贫困，争取黑人在经济上的平等。金提出国会应制定“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权利法案”。这样，金的思想就从争取黑人的社会平等到政治平等，进而意识到必须争取经济上的平等。

这一年，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这一荣誉的第三位黑人（另二位是南非的黑人）。这本来是美国人的荣誉，只因他是黑皮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为此气得发狂，更加紧了对金的诽谤和骚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抗议信竟然雪片似地飞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这一年是总统选举年。金虽始终未明确表态支持约翰逊总统竞选连任，但极力公开反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许多黑人投了约翰逊的票，使约翰逊以绝对优势当选。

这次总统选举，使金再次感到黑人选票的重要作用，必须在南方继续开展争取黑人选权的斗争。当时在南方11个州平均有57%的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中5个州达到72%，在亚拉巴马州则高达80%。在金看来，伯明翰斗争的成功经验，说明也可以采用直接行动唤起国人的良心，迫使国会制定保障黑人投票权的法律，规定派遣联邦官员到南方监督和进行黑人选民登记，使黑人能取得投票资格。

金和他的班子选择了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市开展一次选民登记运动。塞尔马是第一个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诞生地，保持着严格的种族等级制，黑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南方农村小城市。

金和他的班子同当地黑人领袖经过准备以后，1965年1月18日（选民登记日）开始游行示威，口号是“给我们选票”。市当局大肆逮捕示威者，到2月5日，被捕者达3000人。金被保释后，曾去华盛顿会见约翰逊总统，谋求总统的支持。总统表示将向国会提出投票权利法。金回到塞尔马后继续组织群众示威，警察继续镇压。金于是决定3月7日（星期日）组织群众游行到州首府蒙哥马利向州长华莱士请愿，要求州长制止警察暴行和给予黑人投票权。州长下令禁止往蒙哥马利游行。游行仍按计划进行，在途中遭到州警察的袭击，重伤17人，轻伤70人。这就是“血腥的星期日”。消息传开，全国为之震惊，北方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示威，声援塞尔马黑人的斗争。约翰逊总统也谴责了警察的暴行。金于是向全国宗教领袖发出紧急呼吁，请他们到塞尔马来参加3月9日的“牧师向蒙哥马利进军”。全国各地的400多名牧师、犹太教教士、修女和学生，日夜兼程赶到塞尔马。游行队伍走到塞尔马市边界，为州警察所阻，返回塞尔马。当晚前来声援的白人牧师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被白人暴徒打死，全国哗然。事态日渐严重。3月15日约翰逊总统亲临国会，向国会发表了由电视转播的讲话，提出了《投票权利法》。两天后，蒙市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同意从塞尔马到蒙市的游行，州官员不得干涉。但州长华莱士给总统打电话，表示州不能保护游行者的安全，遭到总统的申斥。总统下令征调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并派出大批宪兵、警官和联邦官员到塞尔马。3月21日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从塞尔马出发，向蒙市进军，25日25000人的游行队伍进入了蒙市。同年8月，国会通过了《投票权利法》。法律授权联邦政府派出官员到南方监督和进行黑人选民登记，并规定了对剥夺黑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权的州进行惩罚的条款。此后，南方黑人选民登记的人数和参加选举的人数激增，黑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人数大为增加。《投票权利法》的制定，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又一重大胜利。这固然是全国黑人斗争的结果，但金领导的塞尔马斗争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在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利法》时，金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北方城市黑人区的贫困问题。认为SCLC应在北方城市开展非暴力直接行动反贫困运动，改善黑人的经济状况。1965年8月洛杉矶市瓦茨区（Watts）黑人的大规模抗暴斗争更加强了金的决心。金选择了芝加哥市作为试验点。1966年1月金率领SCLC工作人员到芝加哥安营扎寨。但是近八个月的艰苦工

作,并未取得什么进展,金的芝加哥运动失败了。

芝加哥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该市黑人对非暴力抵抗不感兴趣。金协助建立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不赞成非暴力行动,并提出了“黑人权利”的口号和不同白人合作的主张。为此,金在1966年出版了《我们从这里往何处去?》一书,宣传以非暴力直接行动在北方消灭黑人贫困的主张,并且批评“黑人权利”的口号。但金的主张显然不为北方贫穷的黑人所接受。1967年夏季,波士顿、辛辛那提、纽瓦克和底特律相继爆发了黑人抗暴斗争。

为了使黑人放弃暴力和回到他主张的非暴力抵抗道路上来,金设想了在首都华盛顿开展“穷人运动”的计划,即以较长期的非暴力行动迫使国会通过《经济权利法案》来消灭黑人的贫困。

1968年2月,金和其顾问及助手完成了这一计划的细节。运动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黑人和其他种族的穷人将在华盛顿安营,游行,举行群众大会;第二阶段,在首都开展静坐抗议和示威,打乱政府工作,引起逮捕,抗议和示威将持续三个月,迫使国会通过《经济权利法》;第三阶段,如国会仍无反应,则在全国各大城的某些工业或商业中心开展全国性抵制,迫使商人压国会满足黑人的要求。第一阶段将于1968年4月22日开始。金的顾问拉斯廷曾说金是在开展一场反对美国经济权力结构的阶级运动。金自己则表示:“白人美国必须认识,不剧烈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黑人就不能得到正义。”这种改变将重新分配经济和政治权力,将结束贫穷、种族主义和战争。但是,未等到4月22日那一天,金已遇刺身亡,这个计划也随之夭折。

前面已经提到,金是反对战争的。越南战争的美国化和逐步升级,使金感到不能保持沉默。他认为“种族主义、贫困和战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1965年8月第二周,金在记者招待会和电视节目中敦促美国政府停止轰炸北越,明确声明要同河内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升级,将使“整个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他表示愿作调停人,把美、苏、中、越请到谈判桌上来。金的表态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总统则在幕后施加压力,要他保持沉默。

9月初,金在应总统之请会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后对记者说:美国必须“认真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他的意思是中国不仅应该被“接纳”进联合国——这是美国政府激烈反对的,而且应参加越南的和平谈判。

1966年和1967年,金继续发表反对越南战争的演说。当时,年轻的黑人左派、黑人温和派和保守派、工会领袖、白人自由派政客、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攻击金对越南战争的立场。

因反对越战而受到的指责和压力,开展反贫困运动遇到的困难和反对,以及不时传来的要暗杀他的恫吓,使金心绪不宁。他似已预感到他会突然死去。1968年2月4日,他在艾比尼泽教堂对黑人会众说:“我常常想到我的死……如果我的日子到了,如果你们要找某人赞扬我……就说我是争取正义乐队的指挥,就说我是争取和平乐队的指挥。”

两个月后,金果真遇刺身亡,怀着尚未实现的梦想与世长辞。

金牧师把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事业,并为此捐躯。60年代是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高涨和取得重要进展的年代。这些进展固然是美国黑人的各民权组织、广大黑人和主持正义的白人以各种方式共同奋斗的结果,然而金牧师的贡献却是不可抹煞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金牧师不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而是以白人、黑人、各种族人民在爱和正义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共建美好的生活为理想的。

金的思想是随着斗争而不断前进的。他从争取黑人的社会平等到政治平等,进而意识到必须争取经济的平等。他不仅关心美国黑人的命运,而且对非正义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都不肯保持沉默,即使招来八方的非议和攻击也在所不惜。

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金博士公开主张美国政府完全改变对华政策,他的远见和勇气令人钦佩。

金博士只活了39岁。但是,他作为一位反对种族歧视、争取黑人平等自由的英勇战士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高尚品德和他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献身精神,将永远为各国人民所记忆和尊敬。

注释:

(1) 美国四大民权组织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金)、种族平等大会(法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威尔金斯)和全国都市同盟(怀特利·扬)。兰道夫是卧车侍者兄弟会主席。

编 后

《美国研究》终于创刊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学术性季刊。它的目标是,逐渐成为全中国所有从事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

对今天在上世界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美国,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是毋须多加说明的。随着中国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美国感兴趣,并渴求加深对它的了解。但是,就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来说,我们却还是刚刚开始。希望这本刊物能为开拓中国的美国研究有所贡献。

对美国的研究应该是全面的。所以,我们将致力于刊登研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章。不论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还是科技、文化、艺术、思潮,我们都希望能平衡地介绍于中国读者之前。我们恳请一切致力于研究美国不论哪一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惠赐鸿文,也欢迎广大读者能给我们建议与批评,使我们刊物的水平不断提高。